经典红安

中共红安县委宣传部编

经典红安

中共红安县委宣传部编

二〇〇五年三月

经典红安

中共红安县委宣传部编

*

开本:850×1168mm　1/32

8.5 印张　180 千字

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楚天印务总公司印刷

湖北省内部图书准印证:(2005)

鄂省图内字第 011 号

工本费：15.00 元

经典红安

总策划：张鹤桥

策　划：董卫民　王　玲　周　谨

编委会

主　任：周　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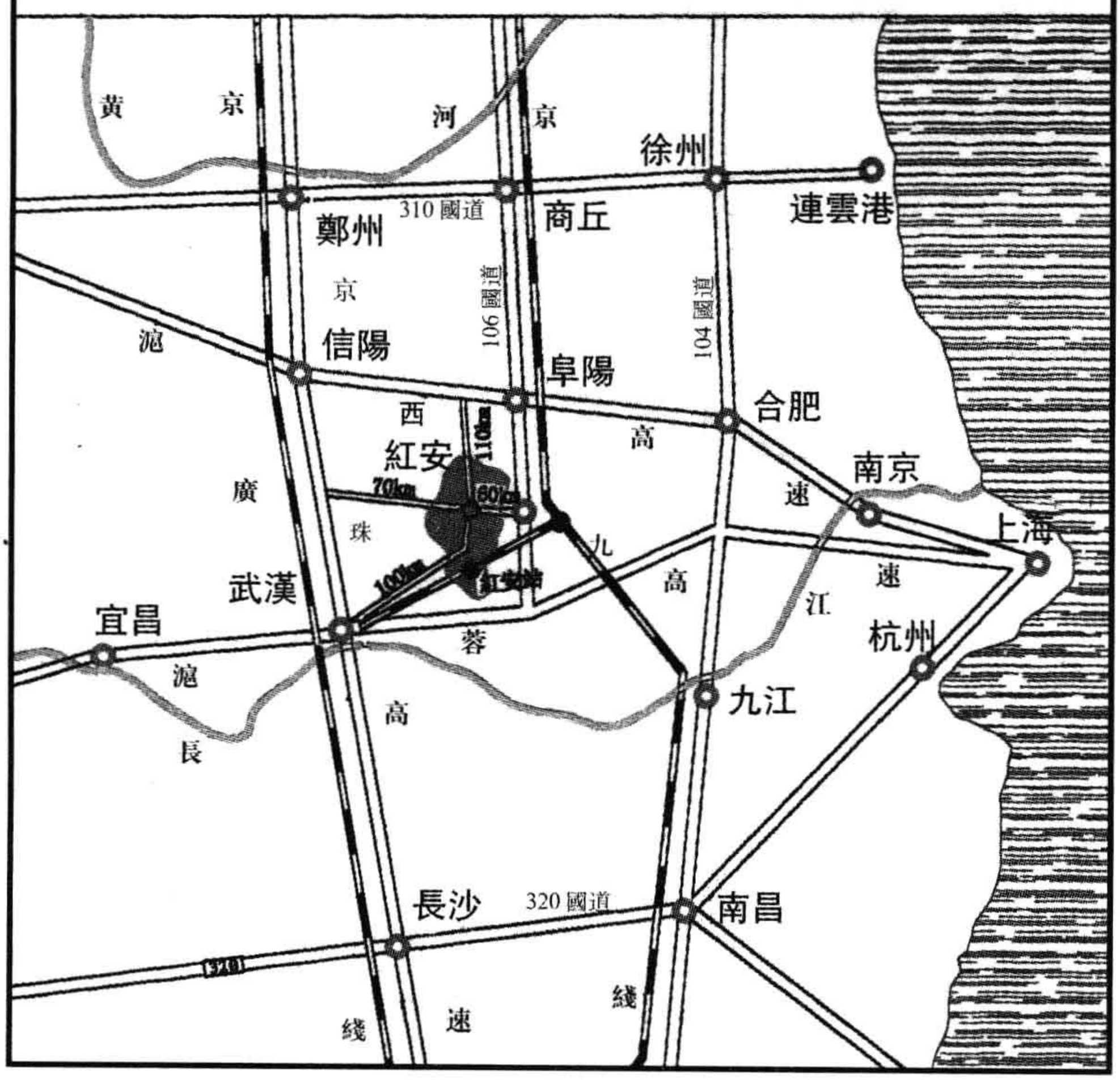
副主任：方向明　张盛潮　李琅环　张发喜　徐达德
　　杨　柳　阮　霁

成　员：周　谨　方向明　张盛潮　李琅环　张发喜
　　徐达德　杨　柳　阮　霁　余永第

主　编：李琅环

副主编：杨　柳　余永第

红安县区位示意图


黄
京
河
京
徐州
連雲港
310 國道
鄭州
京
商丘
信陽
106 國道
104 國道
阜陽
合肥
西
高
紅安
南京
速
廣
珠
九
上海
武漢
高
速
宜昌
江
杭州
蓉
高
九江
長
320 國道
長沙
南昌
線
速
線

前　言

红安，是一部经典，书写共产党人领导劳苦大众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浴血奋斗，“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经典。读着这样的经典，我们震惊，我们泪流满面……

红安，是一种精神，为救国救民而“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一图两不图（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精神。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光荣，我们热血沸腾……

红安，是一种召唤，召唤后来人秉承先烈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响应这样的召唤，我们信心百倍，阔步向前……

当今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新世纪伊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倡导“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实现这样的目标和理念，需要精神力量，需要从历史经验中获取动力和精神财富。

让我们翻开这本书，阅读经典，感悟传统，聆听召唤，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编　者

目　录

感悟红安

光辉的革命业绩　宝贵的精神财富 …… 彭希林(1)

丰功伟绩

董必武的革命生涯 …… 黄召猛　郭中军(18)

李先念的非常之路 …… 朱　玉　程振声　何光耀(32)

峥嵘岁月

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

…… 王树声　詹才芳　陈再道(42)

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 徐向前(57)

故乡的战斗 …… 秦基伟(71)

将星灿烂

红安籍将军简历 …… (77)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 所国心　董　滨(98)

陈锡联夜袭阳明堡 …… 陈晓东(119)

秦基伟鏖战上甘岭 …… 陈晓东(123)

王近山智取襄阳 …… 陈晓东(129)

旋风司令韩先楚扬威海南岛 …… 佚　名(133)

圣地寻踪

千里跃进　将军故乡 …… 李琅环(135)
巍巍丰碑耀千秋 …… 黄解林(140)
董必武故居 …… 黄　文(145)
李先念故居 …… 黄　文(147)
七里坪长胜街 …… 蔡兴忠(149)
中国最早的革命法庭 …… 钟　天(152)

碧血丹心

血染的土地 …… 余永第(156)
夫妻烈士王鉴、夏国仪 …… 阙和荣(158)
戴克敏全家满门忠烈 …… 熊邦国(164)
戴醒群视死如归 …… 熊邦国(171)
张行静大智大勇 …… 孟晓慧(175)
晏春山舍身跳崖 …… 樊丽玲(179)
程训宣至死不渝 …… 熊邦国(182)
“蓝衣先生”张南一 …… 周少怀(186)
开肠剖肚秦绍勤 …… 周少怀(189)

人杰地灵

一条文脉贯古今 …… 陈良品(191)
武脉传承　雄才辈出 …… 杨　柳(199)
史坛巨子冯天瑜 …… 尼　吟(209)

地理名胜

天台山揽胜 …… 吴光德(211)
初探九焰山 …… 胡晨钟　陈红建(214)
走进两河谷 …… 艾国安(219)

革命故事

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 江　河(222)

天台有幸埋忠骨 …… 辛向阳(225)

一个永远没有揭开的秘密 …… 江绍革(230)

奉献不止

军长不当　回家种地 …… 陈晓东(233)

解甲归田的红军团长方和明 …… 阙成良(238)

将军与山村小学四十五年不了情 …… 周晓东(241)

将军之子程平东扎根老区

…… 江作苏 陈新民 张小燕 任 浩 张发喜(243)

物华天宝

又忆农家红苕香 …… 吴光德(250)

红安花生成名记 …… 吴　勇(253)

红安著名小吃 …… 杨　柳(257)

后　记

感悟红安

光辉的革命业绩　宝贵的精神财富

彭希林

红安，原名黄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23年红安建党到1949年解放，英雄的红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奋战了26个春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我们及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艰苦的革命历程

黄安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亲自点燃的。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董必武由上海回到武汉，以一年前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为基地，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指导革命运动。在董必武的亲切关怀下，黄安许多青年学生陆续进入武汉中学，以及与该校有密切联系的省立第一师范、政法大学、女子师范、启黄中学、共进中学、中华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学习。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董必武、陈谭秋的教育培养，他们中的先进

分子董贤珏、王鉴、雷绍全、张培鑫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仆、王文凤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冬，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召集黄安籍党员学生开会，亲自组建了黄安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党的黄安工作组。随后又将工作组派回黄安，把革命的火种直接撒播到黄安大地，从而揭开了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序幕。

大革命时期，黄安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全县 10 个区 210 个乡均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入会民众达 5.6 万余人。在农民运动中，广大农民怀着满腔的怒火，向直接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先后逮捕惩办了长水会会首、紫云区区董吴芾村和县咨议局长李介仁等 40 多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斗争最激烈的七里、紫云、高桥等区，地主阶级的基层政权被摧毁，农民协会实际上成为农村革命政权。与此同时，党为了保卫农民运动的成果，推动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先后组建了三堂革命红学和农民自卫队、农民自卫军等农民武装，并领导他们同豪绅地主阶级及其武装红枪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城内外到处张贴着国民党的通缉令，悬赏捉拿参与领导黄安农民运动的 92 名共产党员，其中第一名是黄安革命的播火人董必武。

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又一批革命者站起来。1927 年 8 月，以郑位三、戴克敏、吴焕先、陈定侯、戴季英为首的中共党员在七里坪秘密开会，重组了黄安县委。新县委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在县北领导农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同年 9 月，黄安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率领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和七里、紫云、高桥、桃花等区数万农民群众，举行了“九月暴动”。第一次向广大农民

提出了党的土地革命的口号，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复辟活动。随后又联合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和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群众，在黄麻特委的统一领导下，于11月13日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4日攻克黄安城，全歼城内反动武装，活捉国民党黄安县长贺守忠及其他反动军政人员，把土地革命的红旗胜利地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随后，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黄安城宣告成立。

12月5日，国民党军十二军教导师向黄安城发起突然袭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奋力突围。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刘光烈等200多名将士不幸战死，解放了21天的黄安城又重陷敌手。12月下旬，鄂东军余部72人在黄安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由副总指挥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和黄安县委负责人戴季英率领，有计划地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木兰山周围开展游击活动。

鄂东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黄安县进行血腥屠杀，数十名共产党员和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根据县委留下的指示，吴焕先、王秀松、赵赐吾、田开寿、詹献庭、李先念、熊邦山等10多名革命骨干，分别在七里、紫云、高桥、桃花、二程等区，领导广大群众坚持斗争。

1928年4月初，盘踞在黄安北部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军教导师同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撤回河南。工农革命军乘机返回黄麻起义区，举行“二次暴动”，消灭和驱逐了上戴家、檀树岗、长塘边等地的地主武装“清乡团”和民团。5月，黄安县委和第七军领导人在紫云区檀树岗乡清水塘村举行会议，决定开辟柴山保，并以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的光宇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等地为活动中心，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

的依托。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黄安县委和红军一起，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斗争，打开了柴山保地区的局面，开创了鄂豫皖地区第一块红色区域——黄（安）麻（城）光（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春，红军在地方革命武装赤卫队、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歼灭了仙居、高桥两区的“清乡团”，拔除了对黄安革命危害最大的仙居区熊家畈、涂家湾地主围寨。随后，地方革命武装又一鼓作气，将“铲共会”、“仁义会”、“红枪会”、“黄枪会”、“金枪会”等地主武装消灭或驱逐出境。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黄安地方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县委、县农委（后改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各区、乡、村党政组织相继建立，雇农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袭击队、特务队等地方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日益高涨。黄安成为鄂豫皖地区建立最早、最完整、最红火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夏至1932年春，黄安军民全力以赴，配合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会剿”和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将黄安南部和黄陂北部合并组成陂安南县，李先念担任该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2月23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军民的积极配合下攻克黄安城，夺取了黄安战役的胜利。鄂豫皖中央分局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伟大胜利和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宣布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红安革命斗争转入极端困难时期。敌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在“血洗黄安”的口号下，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庐舍为墟。仅平头岭一次，即有两千多名红色群众遭枪杀。敌

人的血洗火烧吓不倒英雄的黄安人民。一些在反“围剿”中被打散或因伤掉队的黄安籍红军战士，纷纷冒死归队，加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继续参加反“围剿”斗争。许多中青年要求拿起刀枪，为死难的亲友和群众报仇，县委将他们吸收进来，以独立团为基础，扩编成1500余人的县独立第七师。在县委的领导下，县独立第七师配合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及其边界地区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郭家河、九龙缠顶、潘家河等战斗的胜利。二程、仙居等区的党组织，还组织了小股便衣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斗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黄安的革命形势更为严峻。县委和鄂豫皖省委、鄂东北道委经常活动的地方——七里、紫云、仙居等区，这时也处在敌重兵的分割包围之中。为了配合重建的红二十八军打击敌人，长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县委根据红二十五军西征前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留下的指示，以其主要精力，大力发展便衣队，积极开展“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便衣队在县委和各区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至1936年春，先后恢复了3个白色区、27个白色乡的群众工作。便衣队亦由原来的两个发展到22个。后来，便衣队虽然在敌人的移民并村和倒林搜山中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县委及所属七里、紫云、仙居、二程、城区等5个区的区委，仍保存有10多个队共140余名队员。各便衣队在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敌人的反复“清剿”，夺取了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黄安县委的推动下，黄安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黄安县非常时期宣传委员会，农民、青年、妇女抗敌后援委员会，各界人民抗敌联合会，文化行动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和组织相继成立。“一切为了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一批批青年奔向

鄂东抗日斗争的大本营七里坪，奔向抗日战场。

1938 年 10 月 27 日，黄安沦陷。日本侵略军的奸、掳、烧、杀，给黄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共黄安县委（工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黄（安）麻（城）经（扶）中心县委和鄂东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黄宏儒、吴彩藻、郑维忠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在日伪据点的缝隙中，先后开辟了（黄）陂（黄）安南、（黄）安麻（城）、（黄）安礼（山）三块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党组织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原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将李愈友、杨鼎新等一批有声望的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推荐到抗日民主政府和参议会中任职，同时将数十名愿意抗日的国民党乡、保长留任原职，使党的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与此同时，各根据地还组建了独立营、独立连、县大队、区中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在本地执行保卫根据地任务的同时，积极配合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军分区部队，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对黄安及其边县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5 年 8 月，陂安南、安礼、麻城县抗日武装配合军分区部队，收复了伪黄安县政府驻地、境内最大的日伪据点——河口镇，生俘汉奸、伪县长韩子钊和伪县大队副大队长涂子敬以下官兵 300 百余人。日军 20 余人逃往黄陂县城。至此，黄安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国民党黄安县大队与蒋军密切配合，侵占了黄安东南大部分地区。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陂安南、安麻、安礼三县党组织就当地武装冲突等问题，主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并释放了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但国民党当局毫无和谈诚意，一边谈判，一边进

行武装挑衅。地方革命武装根据自卫原则，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还击。其中，安麻地方武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即将黄安、麻城、经扶三县边界地区国民党乡保队的200多个碉楼一扫而光。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按照党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分路举行突围，胜利地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

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军出动一个正规旅，对黄安和邻近地区进行反复“清剿”，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焰；以特务头子高维钧为组长的“黄安县清乡行动小组”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一面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面进行政治诱降，气焰极为嚣张。

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在白色恐怖下，复员回乡的中共党员、原一军分区后勤处长徐锡煌等，于1946年7月在天台山重建了黄安县委（后改为工委），并成立了游击队，挑起了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担。1947年9月初，黄安工委及其游击队与刘邓大军会合。10月初，县游击队配合中原独立旅攻克黄安城，歼灭国民党少将、湖北省政府军事观察员邹晓轩以下100余人，活捉高维钧和省保安总队及黄安县保安团官兵400余人。随后，恢复了黄安县委，建立了黄安县爱国民主政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大队、区中队相继建立，七里、紫云、金牛、三角、大有、龙山、高桥等区的工作局面逐步打开，广大群众积极投入重建解放区的斗争和支援刘邓大军作战，全县革命形势迅速好转。

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黄安革命斗争复又进入游击战争状态。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县委决定撤销区级建制，将党政干部和区中队统一编入县大队。后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了三个武工队。在以后的岁月里，县大队

配合军分区部队，夺取了张大包等重大战斗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到1949年3月，县境内敌乡公所及其武装全部被歼。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先遣队进入黄安县境，黄安县大队同先遣队一道开进黄安城，黄安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由北郊的王亮村迁入城内。至此，黄安全境获得解放。

从黄安建党到全县解放历时26年。26年来，黄安人民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历程。26年来，黄安党的组织一直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革命的红旗始终未倒。为了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业绩，1952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中央伤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决定将黄安县正式改名为红安县。

巨大的历史贡献

在26年的艰苦斗争中，红安人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一、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开辟和保存了一块赖以生存发展的坚实基地，即黄安革命根据地。在这块基地上，先后诞生了5支革命军队：

第一支是黄麻起义胜利后由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地区创建的第一支革命军队。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路，麻城县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路。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吴光浩兼第二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军党代表。刘文蔚为第二路党代表。全军共300余人。

第二支是1930年4月在紫云箭厂河由红三十一、三十二、

三十三师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下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共5000余人。

第三支是1931年11月7日在七里坪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方面军总兵力近3万人。

第四支是1932年11月30日在紫云区檀树岗重新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下辖两个师和一个特务营。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全军约7000人。

第五支是1938年2月在七里坪由红二十八军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高敬亭为司令员，林维先为参谋长，肖望东（不久由戴季英接任）为政治部主任。全队共3100余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安这块革命基地还是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主要立足点。红军、新四军、解放军先后在这里发起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31年11月10日发起至12月23日结束的黄安战役。这次战役是徐向前亲自指挥的，共歼敌1.5万余人，活捉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一部，为鄂豫皖工农红军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

这块基地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鄂豫皖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常驻地。先后驻扎的党政军机关有：中共鄂豫边特委，鄂豫边革命委员会；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红一军军部；鄂豫皖特委、红四军军部、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鄂豫皖省委、

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军部、红二十八军军部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驻扎过鄂豫皖特委、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等指挥机关。

在这块基地上，鄂豫皖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在紫云区聂家祠堂创办了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彭杨军政学校，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培养了1000余名连级以上的基层党政军干部。抗战时期，中共湖北省工委和临时省委先后在七里坪附近的秦氏祠堂等地举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又称“抗日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党员训练班，共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他们中大部分于1938年3月随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其余参加了鄂豫边抗日战争的准备与发动工作。

党中央对红安这块革命基地非常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8年12月，中央在写给湖北省委的信中，称红安是“工作有数的好地方”，是“湖北的海陆丰”。1983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在为《红安县革命史》题词中，称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这是红安革命前辈们的光荣，是红安全县人民的光荣。

二、组织了数以万计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县委的组织领导下，红安人民前仆后继，踊跃参军参战，多次掀起了拥军参军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红安参加红军的工农群众约6.5万人，参加新四军、解放军的约6000人。总的状况是：在全县的工农群众中，青年人几乎都参加过革命队伍，打过仗；中老年和妇女、儿童绝大部分做过革命工作。正如当年流传的歌谣所唱的那样：“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三、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革命战

争把勤劳、勇敢、朴实的红安人推上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舞台，使红安成为一片英雄辈出的红土地。从红安输送到革命队伍的数万人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人才。经过 20 余年的浴血奋战，他们中绝大部分同志牺牲了，其中包括 11 名省军级干部。80 多名地师级干部，400 多名县团级干部。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县健在的红军老干部只有 600 多人。这些同志都是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战争年代，他们东征西战，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殚精竭虑，再建功勋。他们中有 2 人任过国家主席；有 3 人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 5 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有 12 位中共中央委员（其中 5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 4 位中顾委委员；有 3 位中纪委委员。此外，还有 10 人任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有 12 人任过大军区司令员或政治委员；有 17 人任过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或顾问；有 24 位兵团级干部，130 多位省军级干部。他们中有一名军事家；有 8 人被授予上将军衔；有 10 位被授予中将军衔；有 43 位被授予少将军衔。共有 61 名将军。一个县出了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了这么多将军，出了这么多高级干部，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四、为革命献出了 14 多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红安在大革命前有 48 万人，到 1949 年解放时只剩下 34 万人。26 年间，红安人口减少了 14 万。据有关资料介绍，这 14 万人或是战死在疆场上，或是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死人最多的是 1932 年冬至 1933 年春，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天台山由原有的 2483 人死得剩下 183 人。紫云区由原来的 6.5 万人杀得剩下 1.7 万人。

据当年上海一家报纸报道，这期间红安惨遭国民党军杀害的红色群众达 10 万人。建国后，县民政局对全县的烈士进行了普查，迄今已查清并登记在册的烈士达 2.2 万余人。一个县有这么多人为革命献身，有这么多烈士，这在全国是少有的，实在是可歌可泣。

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争年代，红安人民同心同德，紧跟党走，不懈奋斗，不胜不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简而言之，主要是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战斗作风，高尚的思想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是红安人民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磨练、凝结而成的，是红安精神的集中体现。

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信念就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坚定的信念是坚信不疑的看法。红安的革命者坚信什么？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必定胜利。当革命处于轰轰烈烈的高潮时期，红安人民能以“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热情投入革命战争，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当革命处于白色恐怖的低潮时期，红安人民不怕杀头，不怕灭九族，不怕连累诸亲六眷，聚集在党的旗帜下，坚持战斗，靠的是什么？靠的仍是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红安人民正像夏明翰烈士所说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九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程昭续被捕后，敌人用刺刀顶住他的脖子问：“你是要头还是要共产党？”程昭续果断地回答：“头是我爹娘给的，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

众的，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敌人收回刺刀，后退了几步，接着又把枪口对准他说：“你要共产党，共产党给了你几多好处？”程昭续哈哈大笑，说：“老子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领着劳苦大众干革命，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不是图个人的好处！如果图个人的好处，凭老子的本事，负责比你们这些狗杂种混得好得多！”敌人恼羞成怒，用刺刀把程昭续捅死，并将他的头割下来，在七里坪悬首示众，后又送到程昭续的家乡熊家咀村，在该村门口的一棵槐树上挂了7天7夜。党在领导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周折，犯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1931年秋至1932年春，在鄂豫皖红军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中进行的大“肃反”，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次“肃反”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红安早期革命领导人，党的优秀干部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高建斗等一大批同志在“肃反”中被诬陷，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逮捕、杀害。在这种情况下，红安人民除了对错误的“肃反”政策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抵制外，革命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把我们的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跟共产党走，不革命，人民就没有出路。还有一些在“肃反”中被关押过的革命干部，后来也回忆说：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你关也好，杀也好，只要我未死，我还是要革命的！

革命的信念是革命力量的源泉。红安革命斗争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红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第二，顽强的战斗作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无论做什么工作，尤其是打仗，不仅要吃大苦，

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消灭一个民团，铲除一处反动枪会，击溃一支敌正规军，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三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伤亡。然而，红安革命者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什么饥寒交迫呀，苦累不堪呀，统统不在话下。

那时，红安地方武装作战，流行最广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另一句话是“不消灭敌人，不是英雄好汉”。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撇把子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扑向敌群，勇猛拼杀，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革命者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第三，高尚的思想品质。品质是检验人们思想认识和品德行为的准则。红安革命前辈们的高尚品质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闪光、最难能可贵之处，莫过于他们所具有的革命的生死观。在决定个人生死的紧要关头，他们中的许多人总是把生存的希望让给同志，让给群众，以自己的牺牲去换取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的生存和安全。张南一、秦绍勤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第四，无私的奉献精神。红安革命前辈们参加革命，不仅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而且都舍得弃家不管，舍得掉脑袋。在革命岗位上，他们不图地位高低，不计个人得失，舍生忘死，一心一意为革命作贡献。这种行为把它概括起来，就是“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一图两不图”（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红安人民无私奉献精神的生动体现，是红安精神的核心和主要特征。

先讲“一要三不要”。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红安人民群众总是宁肯自己忍饥受饿，把已到嘴边的粮食省出来，一把又一把地放进“拥军袋”里。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人民军队吃饱长劲，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参军打仗，子弹没长眼睛，上了火线，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群众非常清楚，可他们偏要把自己家中最聪明能干的后生交给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让他们到战场上与敌人拼杀。是群众不疼爱自己的亲人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个不希望儿女们活得好好地为长辈们尽孝送终呢？是为了钱吗？也不是。因为那时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发钱，而共产党的军队成年累月却见不到一个子。到革命大发展时，部队经常打胜仗，才偶尔分点伙食尾子。共产党员分得这一丁点钱，还不知怎么使用它，放在身上是个包袱，很多人索性把它交给连队，交给组织。是他们为自己的亲属和后人谋点福利吗？更不是！因为革命者当时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每年给他们的家属和后代补助百儿八十块钱。

过去，人们都认为红安人民之所以全力支援革命，参加革命，是因为红安这个地方太穷了，是生活所迫，“逼上梁山”。这个观点既对又不完全对。说它对，是因为红安大多数革命者确是苦得无法生存才投身革命，穷则思变，不无道理。说它不完全对，是因为也有相当多的革命志士尤其是红安早期革命领导人，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那么困难，有的还很富有，这些人参加革命并非生活所迫。他们参加革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的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戴克敏、赵赐吾、何德润、王秀松烈士，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再说“一图两不图”。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红安革命前辈的共同特点。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纪委委员徐深吉将军曾对我们说：“那时，我们随时都准备牺牲，准备葬身大别山、大巴山，或是倒在长征路上，根本没有想到几十年后，

能成为将军，能戴个官帽。”这是红安革命老前辈们的共同心声。战争年代，革命前辈们把党的话看得高于一切，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只要让他革命，今天当营长，明天下连队当排长、连长也是乐意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徐朋人，1929 年就担任鄂豫边特委书记，1931 年张国焘来后，排斥他，打击他，撤了他的书记职务，让他去当特苏税务局长，尽管他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接到通知的当天他就走马上任了，对个人的安排毫无怨言。

有这样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已故全国政协主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身上。1937 年西路军失败后，历尽艰辛把西路军余部 400 多人带出祁连山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由新疆回到延安，被总政治部安排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委降到营长，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李先念却欣然受领，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毛泽东主席知道后，找李先念谈话，询问有关情况，并开了句玩笑：“这样对待李先念太不公平了。”李先念说：“公平，公平。让我带这一批人回到大别山，我相信要不了几年，就会形成一个师，一个军。”1939 年 1 月，经中原局组织部长朱理治推荐，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同意，李先念带领 160 多人的游击大队回到了大别山。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和努力奋战，李先念以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率领部队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鄂豫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统一和发展了鄂豫边抗日武装，建立了威震中原的新四军第五师。1945 年 10 月，新四军第五师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第二次会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原军区，总兵力约 6 万人。李先念成为统领这 6 万将士的军区司令员。

红安精神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讲的仅是其中的四点。它凝聚着革命前辈的心血，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它是革命前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激励我们战胜艰难险阻，践行“三个代表”，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力量源泉。

（本文系彭希林同志所作的传统教育报告，有删节。）

丰功伟绩

董必武的革命生涯

黄召猛　郭中军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三月五日，已沉疴不起的董必武于病榻之上为自己赋《九十初度》律诗，抒写了他的革命情怀和感慨。董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立党、建军、治国的元勋。他的丰功伟绩名垂千古，他的英名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董必武，原名贤琮，字洁畬。1886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1905年春，董必武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学习期间，他经常光顾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在那里，董必武结

识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刘静庵。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诗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猛醒？中国的出路在哪？有许多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在日知会时，董必武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报，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思路理清了，董必武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

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立即赶到武昌，到军政府军务部出任秘书工作。1913年，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积极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此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在湖北无法立足，1914年1月，被迫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孙中山在日本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丧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1920年夏，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数月后张又退出小组）三人开始筹建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随后刘伯垂、包惠僧、赵子健参加。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在它周围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1921年初，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组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吸引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将武汉中学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于他们的活动的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和陈谭秋被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8月，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1922年初，改组为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区委执行委员。由于区委在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工作深入，党的组织迅速壮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董必武根据党的指示，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随后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927年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黄麻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惨遭杀害，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董必武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后，遵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苏联回国。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创办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党校，董必武先后任党校教务长、副校长、校长。

1934年10月，董必武以半百的高龄参加了长征。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此，董必武特意置酒庆贺。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不仅在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金山、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时都艰难地随大部队前进，而且常把分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用，自己徒步行走。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董必武回忆这段长征经历曾说：“十三个月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

统一战线的开拓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大中城市，如西安、兰州、桂林、洛阳、长沙、广州（后在韶关）、平江、南昌、贵阳和新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和输送革命干部，为八路军、新四军等运武器弹药、

军需物资、工业原料和工厂设备，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著名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积极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在军界、政界、文化界和工人、学生中进行宣传联络工作；护送革命青年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学习或工作；接待各界人士、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创办了《新华日报》，宣传党的主张，动员人民抗日，抨击投降言行，刊登抗战消息。1938年10月25、26日，汉口、武昌相继失陷，“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迁至重庆继续工作。它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战斗旗帜，依靠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顽固势力，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直接领导工人工作、青年工作，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团结广大工人、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也从中培养了许多干部，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秘密入党，成为群众中的先锋战士。在日军向武汉进逼的形势下，动员了不少工人、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敌后去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在武汉时期，有大批青年由京沪、平津、东北以及其他地区，背井离乡流亡到武汉。为了吸取进步青年到革命队伍里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汉口设立了招生委员会，地址就在办事处。长江局机关和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担负招生的具体工作，负责接待和组织输送。1938年八九月份，武汉形势逐渐紧张，党组织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动身前，办事处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并送上火车。我党许多“三八式”的老干部有很多是在武汉参加革命的，有些同志至今还说，当

年是八路军办事处帮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国民党统治的武汉、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年。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1943年，董必武将满58岁。“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党中央决定给董必武提前祝寿，以“祝寿”活动作为突破封锁、广泛交友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董必武六十大寿，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二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1月3日，他给中共中央发了感谢电。

中央委员会：

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谢之致。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尚的光荣。我党二十二年来伟大的发展，光辉的成绩，已博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扬，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功。我自愧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董必武

1945年初，全国各界对出席首届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组成之事都很关注，经过中共的斗争，国民政府把董必武作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其他成员还有团长宋子文、副团长顾维钧，成员王宠惠、李璜（中国社会党）、胡芳、魏道明、胡适（无党派）、张君励（中国社会党）、胡霖。顾问施肇基。通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偕秘书陈家康、章汉夫于4月12日在珊瑚坝机场乘中航飞机飞印度转往美国。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隆重开幕。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

董必武在整个会议期间的处世待人表现出中共的宽宏大量，有理有节。他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都会与顾维钧商量。到美国的当天董必武就与顾维钧就有关几个国际和国内事务问题交换意见。董必武是代表团中最年长的一位，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董必武都很尊重。

国际社会对中国代表团作为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的代表终于成行极为关注，对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更加注目。董必武非常珍视这样的机会，积极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除参加大会外，还出席了组织和程序第三小组委员会及大会安排的其它活动。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出席并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尽管当时国共矛盾日益尖锐，但董必武以大局为重，在坚持原则的大前提下，尽量尊重体谅其他代表，减少矛盾，求同存异。在有关联合国宪章讨论中通力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董必武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面参加会议，一面在旧金山、纽约做了许多工作，瞻仰旧金山孙中山先生铜像，会见华侨，到从事洗衣业的劳苦华侨组织——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会员大会上作报告，为该会以及华侨办的金星广播公司题词留念，代表中国共产党以一万美元捐助《华侨日报》；与美国共产党交流管理外国党员生活等事项；专程到纽约郊外看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争取史沫特莱的帮助；多次接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和新闻记者。会议期间，董必武广泛联系华人社会，宣传中共的实绩，还访问了旧金山市华侨居住区、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孙逸仙公园，出席了华侨组织举办的宴会酒会。同时，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英勇抗战，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董必武带去了英文印刷品《中国解放区实录》，向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新闻记者及各国朋友广为散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必武出席了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办的演讲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全面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

进步的基本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的政策。董必武胸襟坦荡地对海外华人说，中国共产党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团结、强大、繁荣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根据这些政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加倍努力，使我们能在抗战最后胜利后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新中国。”董必武的这篇演讲稿后来在当地《华侨日报》全文刊载，对海外侨胞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6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大会指导委员会以中国抵抗侵略最先，特准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签字国。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宪章上签字。这一宝贵历史记录至今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董必武的毛笔字潇洒飘逸，别具一格。

身在美国，纵观世界风云，关注国内局势，董必武感慨万千，写下了数首律诗，其中一首是：

竟是平生一快游，空行万里总悠悠。
乘风破浪非虚语，障眼浮云在下头。
欧陆暂无锋镝苦，东瀛将南寇仇囚。
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幽。

法制建设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董必武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必武同志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树立了一座丰碑。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董必武历来就注重法制，在他看来，法制就是一个国家得以维系的最根本的社会规范。法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制度就是一个国家里面——不仅国家里面而且社会组织中——大家都要遵守的一定的秩序，制度有的是成文的，有的是不成文的。为此他举例说，我们军队，从红军、八路军到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都规定有一定的制度，否则就成为乌合之众，无法打仗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也就是党的活动的准则和制度。法制这个东西是人定的，不是天生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我们的法制体现了我们国家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利于人民的，而过去的法律则大多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他认为，法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不能没有法制，没有了法制，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说：孟子说得好，“上无揆道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董必武同志曾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说，依法办事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必须有法必依。凡属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当然，在法制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的规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或变通执行的办法。因而他一直提倡普及法制教育，教育人民守法，首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守法，加强培养法律工作者，使人人都能重视法、遵守法，树立法律的权威。

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的内涵得到了薄一波同志

的高度评价，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中，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我们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董老历来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主张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早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董老就指出，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们公共生活所必须，而且法令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定出来的，秩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透了我们党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他还批评了一些党员同志犯了法，自以为是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还有一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他说，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领导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受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令。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这是因为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觉悟分子犯罪是决不能宽恕的，是应当加重处罚的。不然的话，就不能服人。他认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同志又指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犯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可见他的法律平等思想是始终如一的。

建国后，为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董必武可谓煞费苦心。他亲自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民主区域自治纲要》、《惩治贪污条例》等等，初步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董必武在担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严于律已，大公无私，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他强调在执法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以法律为准绳，量刑适当，既要反对判罪太重，又要反对判罪太轻，严格控制死刑的审核标准，以免殃及无辜。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董必武把他一生献给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受命主持党史编写。“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搞的“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在极左环境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诬陷、迫害。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得他们免遭诬陷、迫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朱

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真是喜出望外，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董必武与世长辞了。在董老逝世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联合国宪章”的创建者之一。

李先念的非常之路

朱玉 程振声 何光耀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六十六年的革命岁月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马背上的将军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佃地主的几块山冲薄田为生。9岁读私塾。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人称“小李木匠”。

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率领300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1932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1933年7月，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李先念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8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率领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他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地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长。1940年1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依靠边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造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1300多万，建立了8个专区和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

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10月中原军区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中原军区6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1946年1月，为争取国内和平，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十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

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6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对突围方向、时机作了全面部署，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1947年8月，李先念又和刘伯承将军一起，率领部队大举反攻，在短短几个月中，又重新解放了中原的广大地区，将国民党军驱逐到长江以南去。

湖北解放后，他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湖北省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

将军下马管经济

1954年5月，正值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季节，担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奉命去中央工作。陈云、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传达中央关于他担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的决定，主要负责财政、银行、商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领导工作。当时，陈云协助周恩来分管国家经济事务，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两位老领导、老战友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李先念意识到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精神上感到有很大压力。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经到了北京，打电话叫他去中南海见面。一见面，李先念就向毛泽东提出，财政部长干不了。毛泽东说，你干不了，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一句话说得李先念哑口无言，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

李先念上任后，他坚持每天黎明起床批阅文件和读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凡属财贸工作的重要问题，他都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请示，以便得到指导和帮助，更好地把财贸工作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溶为一体。他特别注意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学习。陈云的实事求是精神，管理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李先念说陈云是教会他管理财政工作的老师。

集中大家的智慧，慎重作出决策。李先念非常重视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博采众议，充分发挥个人所长。同他一起工作的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学识渊博，业务精通，经验丰富，是财贸战线的行家。李先念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纳他们的正确主张。多年和李先念一起工作的段云曾回忆说：“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地掌握了这一方面的大量知识。”王丙乾也说：“他位高不自居，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这种抓住问题不放，力求弄通弄透，广开言路的工作作风，激励和推动着大家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解决问题，开拓前进。”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李先念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经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很快由外行变成内行，成为一位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者，被毛泽东誉为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之一。

全力辅佐邓小平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2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负责人会议，明

确副总理分工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指定的第一名副总理是邓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此后，李先念和协助周恩来一样，协助邓小平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全力支持他同江青集团作斗争，推进全国整顿工作的开展。在“四人帮”企图阻止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和出访美国时，李先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坚决主张邓小平出席和出访。在为召开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李先念积极提供情况，参与和协助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一起在周恩来病榻前商定国务院各部委的人选。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要了解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一个年度的计划及长期发展的设想。李先念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作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周恩来、邓小平及时让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这一指示。随后中共中央作为1975年开展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

为了对整个经济工作进行整顿，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和方针政策，6月16日至8月11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加强集中统一，并对调整计划体制、企业和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提出了设想，对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建议。

李先念虽然不分管文化、教育科技工作，但他仍然关注这方面工作的调整和整顿。在“四人帮”发动对电影《海霞》批判时，他和朱德等一起调看此片，一致表示肯定和赞赏，并建议放映这部电影招待国际友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在得知毛泽东讲“老九不能走”后，他立即到水电部去传达，严肃批评那些轻视、诬蔑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和错误看法，重新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钱正

英回忆说："那次报告，水电部礼堂座无虚席，听报告时屏气静息，听完报告反映强烈。"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进行全面整顿工作，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地发难。他们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毛泽东觉察后，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他们反对经验主义，搞宗派，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以个人名义发文件等问题上的错误，特别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李先念同邓小平、叶剑英等一起，就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质问。这是多年来批评"四人帮"最严厉最尖锐的一次会议。

重拳粉碎"四人帮"

当全国各项工作在整顿中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出了波折，一场错误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在中国大地刮起，刚刚出现的曙光，又被一层乌云遮住。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通过对各方面工作整顿，比较系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策。当然要遭到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疯狂反对。于是1975年11月就爆发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党心、民心，引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激起了人们对"四人帮"极大的憎恶和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强大群众运动。李先念非常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他不仅通过新闻报道和

有关文件了解情况，还把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叫去，询问全国各地和北京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李先念从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反对“四人帮”的强大力量，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促使他下决心参与除掉“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党集团认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到了，疯狂发难，密谋策划。华国锋警觉到江青集团的严重危险。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紧急到李先念住处共商大计。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李先念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并急速地去了西山叶帅处。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以防有人窃听谈话，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他与陈锡联两次谈话的情况。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他搬回了中南海，每天晚上用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李先念在中南海还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

筹划粉碎“四人帮”，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

9月29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同“四人帮”就毛远新去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提出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意见，唇枪舌

剑，寸步不让，狠狠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这次会议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

1976年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办大型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人就到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也表示赞成。于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李先念和叶帅、华国锋、汪东兴等领导同志一道采取特殊的方式逮捕了“四人帮“成员。

10月6日晚，按照事先的安排，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按照约定来会议厅休息室等汪东兴电话。会议刚开始，汪东兴来电话，李先念亲自接，随后要纪登奎通知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于是，各自乘车去玉泉山5号楼。当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逮捕，准备进行隔离审查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出席会议的11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致拥护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主持军国大事

1977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出：要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

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积极大胆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他坚决主张并亲自指导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引进工作。还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左”的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1979年3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他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他去许多省市视察企业、港口、工程项目、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在外事工作方面，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此后，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

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根据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在海峡两岸的交往方面，他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李先念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

李先念同志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峥嵘岁月

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

王树声 陈再道 詹才芳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鄂东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斗争。起义武装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建立起鄂豫皖边区最初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黄麻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黄麻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广大人民群众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酝酿着一触即发的革命风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黄安、麻城两县逐渐有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活动。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在武汉读书的一些进步青

年，其中有些在董必武、陈谭秋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以后，他们的活动逐渐加强，深入工农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发展了一些先进的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入党。是年秋冬，两县分别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之后，更大力地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开办贫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加强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黄麻两县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均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且猛烈地发展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一切权力归农会”、“劳农神圣”等口号，响遍了城镇和乡村。

农民运动兴起之后，首先就以暴风骤雨之势，向直接压在农民头上，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冬和一九二七年春，两县先后逮捕惩办了吴惠存、李介仁、丁枕鱼、王子历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数十名。麻城的革命群众还粉碎了反动县长刘芳、商会会长李舜卿等组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在这些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广大农民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怀着千百年的深仇大恨，拿起了锄头、扁担、刀矛、土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向封建地主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猛烈冲击。斗争最激烈的黄安的高桥、七里、紫云等区，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地主的权力都被打倒，农民协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农民们革命情绪高涨，他们兴奋地说：“盖子揭开了，革命就要革到底！”

在镇压土豪劣绅的同时，两县农民还与地主阶级掌握的反动武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早在一九二六年冬，黄安县的共产党员吴焕先等，在箭河一带利用红枪会的旧形式组成了三支群众性的武装，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黄麻两县的地主阶级，为了抗拒农民运

动，纷纷扩大反动武装，向革命人民发动进攻。黄安西南部的高桥等区的革命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党的组织被迫转入隐蔽斗争。正在这个时候，部分外逃的土豪劣绅，以光山县新集（现河南新县）为中心，勾结附近各县反动红枪会数万人，向黄麻北乡的革命人民发动了疯狂进攻，侵入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大肆烧杀抢掠，并于四月底包围了麻城县城。在此紧急情况下，两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抵抗，麻城党组织并派人到武汉搬兵。当时中共湖北省省委委员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政府的负责人，在他的支持下，湖北省各界曾组成“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会同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武装学生三百余人驰援解围，并令原在黄安剿匪的部队一个营火速前往，协同作战。这一有力支持，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农民的志气。当学生军接近麻城城郊时，反动红枪会仓惶北撤，革命武装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乘胜反击，一直追到新集附近，沿途摧毁了方家湾等反动据点，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取得了很大胜利。“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在这次行动中，作战勇敢，纪律良好，积极帮助当地党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两县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一些共产党员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桂步蟾等，又先后返回黄麻工作，在领导发展当地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与地主反动武装的斗争，黄麻两县党组织深深体会到掌握武装的重要，同时也大大激励和锻炼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在斗争中，两县先后建立了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军，并在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群众中，普遍组织起农民义勇队，在黄、麻两县与光山交界地区东西两百多里的高山上，形成了一条人民群众的革命防线。每当敌人进攻时，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便从四面八方涌来参战，英勇地配合农民自卫军打退

敌人的进攻。五月间，黄安北乡三千余武装农民，在木城塞抗击反动红枪会达七昼夜之久，最后党动员广大群众配合农民自卫军大举反攻，将敌击溃。六月二十日，麻城北乡又遭反动红枪会疯狂进犯，当地群众在杨泗寨、癞痢寨、破寨岗等地与敌激战三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其中破寨岗一战，守寨农民自卫军百余人在六千余群众的配合下，击败万余会匪的进攻，追杀四十余里，毙俘反动会首十余名，群众为纪念这次胜利，将破寨岗改名“得胜寨”。

正当黄麻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进一步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时候，汪精卫又继蒋介石之后，于“七·一五”叛变了国民党革命。曾一度成为革命中心的武汉，一变而为反革命的营垒。国民党下令清党，到处解散农民协会，收藏农民自卫军的武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且宣布“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黄麻两县潜伏和外逃的豪绅地主更乘机而起，勾结光山的反动红枪会，从四面八方向革命基础较好的区乡大举进攻，妄想扼杀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

在此紧急关头，黄麻两县的党组织和基本群众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过去混入党内的一些阶级分子和投机分子，变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是经过斗争锻炼并与群众有着联系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则更坚定地和群众一起投入火热的斗争。受过革命洗礼的基本群众是毫不动摇的，特别是那些经过激烈阶级斗争和武装锻炼的人民，更是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不放手，他们说：“农民协会还是要！”“不打不能安身！“两县党组织经过整顿之后，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继续领导着以农民自卫军为骨干，以农民义勇队为基础的农民武装和广大群众，抵制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粉碎了国民党的收编诱降和麻城农民自卫军内奸分子的叛变阴谋，打退了反动红枪会的多次进攻。其中八月十七日的北界河战斗，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安农民武装一

部和麻城的上万群众的配合下，打垮恶霸头子王芝庭率领的反动民团数十人和红枪会数千人的进攻，毙敌百余名，活捉了王芝庭，缴枪十五支、马六匹、刀矛无数，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凶焰。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和限制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坚决相信和依靠农民，放手发动和武装农民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批驳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热情地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强调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政府和农民武装，坚决镇压土豪劣绅。现在回忆当时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两县党的组织，大力地推动和武装了农民群众，并领导这些革命的武装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掌握的反动武装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的阴谋破坏和武装进攻。就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险恶形势下，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仍然坚定地站在惊涛骇浪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领导革命群众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尽管这时两县党组织对革命斗争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思想的认识还不太明确，但是他们顽强的奋战却为以后黄麻武装起义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和一块发动起义的革命基地。

二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及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在

九月间传达到黄麻两县，给正在坚持斗争的革命人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的胜利，亦给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两县党组织迅速制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计划，积极领导广大群众举行秋收起义，自九月二十六日起，便到处集会、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不分昼夜地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形成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但是，由于两县党组织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进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然而这次起义的意义是很大的，它给当地农民树起了党的土地革命的旗帜，进一步地发动了群众，组织了群众，武装了群众，严厉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复辟活动，基本上肃清了黄麻北乡七、紫、乘、顺等地区的反动势力，为更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准备了条件。

十月间，湖北省委鉴于黄麻两县当时尚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和很好的群众运动基础，遂派王志仁、吴光浩等到黄麻地区，建立了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等县的武装起义。特委要求黄麻两县党组织更加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更进一步整顿农民自卫军和加强群众武装，继续发动起义，并于十一月初在七里坪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这时，两县农民自卫军共有枪三百余支，以刀矛土枪武装起来的农民义勇队及其它形式的农民武装达三万人以上。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声势浩大的起义壮举开始了。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一部以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悍农民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于当天夜间十时浩浩荡荡向黄安县城进发。黄安七里、紫云、高桥、

二程、桃花、城关等区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响应，配合作战。十四日四时，攻城部队在城内人民配合下，一举攻入城内，全部消灭了反动警察武装，摧毁了反动县政府，活捉伪县长贺守忠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数十人，把土地革命的红旗胜利地插上了黄安城头。

黄安县城的解放振奋了广大人民，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城内庆祝胜利。全城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到处贴满鄂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和鼓舞革命斗志的标语。十八日，黄安城内举行了万人大会，庄严宣告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诞生。大会选出曹学楷等九人组成农民政府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农民政府宣布了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为内容的施政纲领，并发出通电和告民众书。曹学楷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是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作起委员了，这证明了我们革命力量的强大，同时也证明了现在是劳苦人民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了。"他的话激动着每个到会的群众，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四起，充满了起义胜利的喜悦。

农民政府成立后，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举行了隆重的检阅仪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路。潘忠汝为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为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在检阅仪式上，潘忠汝响亮地号召大家："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奋斗，打出我们的一条大路，直到打出我们的江山。"

黄麻起义在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以有力的行动回击了反革命的屠杀和进攻，大大鼓舞了当时广大

群众的斗争。在鄂豫皖边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兵政权，用实际行动向当地人民指明，要获得解放和土地，不但必须而且能够自己起来夺取和掌握政权，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黄麻党组织在鄂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于坚决执行了党的武装革命的总方针，而且组织严密、动员深入、行动迅速、斗争坚决，因而保证了起义的迅速胜利，把当地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

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等地的敌人。当时敌中央社惊呼："黄安自被农军盘踞，其势比前更加蔓延，……组织工农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这个初生的红色政权，立即调动军队向起义的人民进攻。十二月五日夜，敌十二军一个师突袭黄安县城，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搏斗，但终因众寡悬殊，被敌攻陷。部队虽然最后突出重围，但却遭受严重伤亡。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和许多优秀的革命志士光荣牲牲。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县城复陷敌手。接着，该敌即对黄麻起义地区疯狂进行"清剿"。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委员刘文蔚等，亦相继被捕英勇就义。起义地区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

黄安失利的教训说明，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当时总的形势是敌人强大，我们弱小；起义虽然取得胜利，但对敌人的反扑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同时还不懂得红色政权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建立在农村，因而没有及时

主动地把领导中心和起义武装的主力转移到农村，以游击战对付敌人的反扑。结果敌人的大举进攻一到，便使领导机关和新建的革命武装遭到重大损失。但是黄麻党组织和人民，并没有被这次严重挫折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吸取了黄安失利的教训，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探索着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继续挺胸向前。

十二月下旬，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在黄安北乡之木城寨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决定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枪转移到敌后游击。接着即在黄安北乡闵家祠堂集合了七十二人，长短枪五十三支，通过敌人层层封锁，胜利地转移到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木兰山位于黄陂北部，当时那里没有敌正规军，仅有少数地方反动武装。党在当地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同时与它靠近的黄安高桥、二程等区，党有着很大的力量，可以随时得到支援和掩护。工农革命军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暂避敌锋，向这一地区转移，是个正确的抉择，也是开始农村游击战争，探索坚持长期武装斗争正确道路的起点。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到木兰山后，即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经过短暂休整，便在木兰山周围开展了积极活动。到处宣传、发动群众，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反动武装。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旧历元旦），攻克封建堡垒罗家岗，当即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没收当铺，号召群众无偿取当。一连三天，前来分粮取当的人群络绎不绝。革命军的声誉大振。

敌人发现工农革命军在木兰山活动后，即调动部队前来围攻。第七军机智地冲出敌人的包围，东进黄冈、罗田游击。但是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第七军到处受到敌

人追击“堵剿”，活动异常困难，遂于三月初重返木兰山。在这一个多月中，第七军日夜与强敌周旋，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但是大家坚韧地克服着各种困难，紧握着武器继续坚持斗争。吴光浩同志不断地教育大家：“我们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工农的出路；丢了枪，就不能胜利，不能生存！”

第七军返回木兰山后，为了便于活动，将部队编为四个队分头游击。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返黄安，廖荣刊率一个队东进麻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打击反动势力，准备接应部队重返黄麻老区。其余两个队分别由吴光浩、汪奠川率领在黄陂活动。这四支部队，采取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方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短短二十天的时间内，先后在武汉的路上镇压了麻城福田河的反动团总彭汝林、黄安公安局长曹“屠夫”等。四月初，敌十八军与十二军发生冲突，黄麻地区的十二军部队撤回河南。戴克敏、徐其虚率领的一队于四月五日（清明节）消灭了紫云区上代家的民团，缴枪十余支。随后，第七军按预定计划乘机全部返回黄麻老区。

在工农革命军转战木兰山期间，黄麻两县的土豪劣绅纷纷建立“清乡团”，和国民党匪军一起，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村庄被血洗，无数的革命战士和群众遭到剖腹、挖心、剁手、活埋等惨无人性的屠杀，甚至老弱妇幼亦难幸免。但是经过激烈斗争锻炼的黄麻人民，依然采取各种方式顽强地坚持斗争。群众日夜盼望着工农革命军打回来报仇恨，他们坚信：“共产党是不会失败的”。到处传说着“工农革命军就要打回来了”。当第七军返回后，群众一见就热泪盈眶地向战士们控诉敌人的罪行，要求讨还血债.群众的控诉，激起了部队指战员的复仇怒火。第七军随即向土豪劣绅“清乡团”展开猛烈反击；广

大群众亦揭竿而起，闻声响应，每逢作战，人群就象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配合。数日之间，消灭和驱逐了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一些地主武装。农民们高兴地把这次胜利称为："二次暴动"，并且编出歌谣，到处唱着："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不久，敌十八军又加紧发动对革命人民的进攻；到处安设据点，实行严密的控制和"清剿"。虽然当时形势十分险恶，但第七军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掩护下，顽强地坚持着斗争。为了摆脱强敌的跟追，部队经常活动于鄂豫边界，利用两省军阀行动不尽一致的空隙和矛盾，跳来跳去辗转游击。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光山南部的柴山保地区条件好，该区地处两省三县边界，当时无敌正规军驻扎，湖北的反动军队越界活动，一般是朝发夕归，不常驻留，而且这个地区与黄、麻两县的七里、紫云、乘马等区毗连，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当地贫苦群众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影响下，积极要求革命，他们说："七里坪、乘马岗打了土豪，不交租又分田！我们为什么替土豪劣绅拼命?"工农革命军到这里活动，既可以利用敌人的空隙得到较好的休整，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工作；又可以保持与黄麻老区的联系，支持老区的人民的斗争。于是五月间，当地党组织和第七军领导人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展柴山保地区的工作，以便在黄、麻、光三县交界的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光裕山之间，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是第七军发展里程上的重要关键。

从黄安突围，经过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到返回黄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是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所经历的又一次严重考验和锻炼。强大的敌人在占领黄安城后，企图以更残

酷、更大规模的屠杀来扑灭革命的火焰。当时第七军虽仅数十人枪，却怀着革命必胜的雄心壮志，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了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因而保存了革命力量，鼓舞了群众斗志，扩大了革命影响，积累了斗争经验，挽救了当地革命的危局，并在经过近半年的游击活动之后，重返黄麻老区，提出了开辟柴山保的计划，向着边界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入柴山保之后，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措施。

这支革命武装进入柴山保不久，即在河南湾击溃了紫云区清乡团和国民党军一个营的进攻，俘敌两名，缴驳克枪三支。这一仗虽然缴获不多，但政治意义很大。它树立了革命军的声威，震慑了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以开展边界地区的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后，第七军一方面在老区群众的支援下开辟新区工作，一方面又利用新区的有利条件支持老区人民的斗争。部队时聚时散，往返跳跃，南北配合，取得不少胜利。同时每当战斗空隙，即全力进行群众工作，到处宣传革命主张，组织发动群众。而且纪律严明，公买公卖，借物送还，损物赔偿，派饭给钱，给了群众以深刻的影响。群众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队伍！"

为了在柴山保地区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党组织决定派曹学楷等负责地方工作。首先深入群众，扎根串连，建立党的组织和秘密农会，发动抗租抗债等斗争。对上层分子，除少数反动豪绅必须严办以外，争取一些较开明的分子保持中立。对红

枪会则派人打入内部，争取会众，进行改造。对当地以吴文路为首的一股土著武装，则利用他们和军阀部队的矛盾，争取他不与革命为敌，这些措施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因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以后，党和工农革命军获得了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群众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并且初步地组织起来；上层分子逐渐分化；红枪会变成了革命的红枪会，柴山保变成了一块红色区域。同时，还争取了驻紫云区来家河之敌十八军一个连七十三人，携枪七十五支哗变来归，其中多数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余则以给路费遣送回乡。

随着工作的发展，党和军队的力量也发展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七月间，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辖四个大队，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原第七军参谋长汪奠川在木兰山时牺牲），陈定候为政治部主任。十月间又重组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鄂东特委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这时，柴山保地区的工作更加深入；整个光山南区及与其邻近的东区、西区的工作也逐渐开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工作也有很大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许多被迫离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纷纷返回黄麻老区，加强了革命力量。这样，红军和当地党组织、革命群众汇成一股巨流，使新老区的工作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党和红军在黄、麻、光三县边界开始站稳脚跟。

这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成为照耀各地革命斗争前进的灯塔。鄂东特委从黄麻地区一年多来的斗争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敌人统治薄弱和群众、地理条件有利的边界地区，实行固定区域的武装割据，才能胜利发展。同时，邻近的豫东南和皖西党组织又都在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

义。因此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并通过中央巡视员于十二月十五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要求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造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说明鄂豫边的党和红军对于利用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一九二九年，鄂豫边的武装割据地区日益巩固和发展。三、四月间，红三十一师乘蒋桂军阀混乱之机，向外扩大游击，消灭了黄安县的禹王城、高桥河，麻城的西张店等地多股反动民团，缴枪一百四十余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割据地区也进一步扩大。黄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的部份地区，建立了区一级的工农政府和游击队、赤卫队。中心区城已初步分配了土地。红三十一师也迅速扩大，发展到四百多人。部队党政工作有了加强，此外还创办起小型医院、修械所和被服厂。

五月、鄂东北特委（原鄂东特委改称）又召开了各县县委和红军师委的联席会议，改选徐朋人为书记；并根据党的“六大”决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形势与任务、扩大游击战争、政权建设等八个决议案。在党的这些决议指导下，鄂豫边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业已紧密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同时，豫南、皖西的党组织亦先后在商城南部和六安、霍山地区领导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和豫东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并于一九三0年三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了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实行了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胜利地实现了创造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的武装割据的夙愿。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更大发展的新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发展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最后夺

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的道路，即以农村为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黄麻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走上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之前，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当这支革命军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过程，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便打开了一个日益蓬勃发展的局面。今天回顾这段道路曲折的革命斗争，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革命斗争不断胜利的唯一真理，跟着毛泽东同志前进就一定胜利！

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徐向前

一

围攻与反围攻，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当时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敌人，总是把弱小的红军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因而红军作战采取了反围攻的形式，“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从诞生那天起，就和敌人的围攻作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鄂东北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组织秋收起义的决议，领导了黄安、麻城地区工农起义，占领黄安县城，建立起工农政权，同时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严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这支幼小的工农武装成立不到一月，就遭到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围攻。当时由于缺乏依靠农村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对可能到来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结果在敌人突然袭击下，经过激烈战斗突出重围之后，几百人只剩了七十多人。但是这支红色武装，发扬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继续挺胸向前，并从挫折中开始懂得必须依靠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春，转战于黄陂的木兰山和黄冈的大崎山等地，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围击。四月间，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起义地区，接着便在黄、麻、光（山）边

界，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势，开始实行“武装割据”。七月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从此这支红军的游击战争，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割据地区里，群众逐渐组织起来，建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红军作战有了坚强依托和得力助手。一九二九年间，红三十一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兵力由一个团到数个团的三次“会剿”，并乘周围军阀不断混战之际积极出击，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发展了自己，扩大了割据地区。同年夏到次年一月，党又在商（城）南和六（安）霍（山）工农起义的基础上，相继组成红十一军的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创建了豫东南和皖西红色区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一九三0年三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红军统一了领导，集中改编为红一军，鄂豫皖区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是年五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大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兵力大为减少。红一军乘机大举出击，驰骋于京汉线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攻克过霍山、英山、罗田、云梦、光山、罗山六座县城，和花园、杨家寨、信阳等车站，歼灭了敌人成连成营以至成团的正规部队，迅速壮大了自己。到十月间，全军已达五千余人，军事、政治、后勤工作，有了进一步加强；作战形式也逐步向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这就为粉碎以后敌人大规模的围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军这一时期所以取得这些重大胜利，是由于它的行动符合了毛泽东同志的“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这一论断。但是，这时正是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它的方针，不是利用当时极为有利的形势，很好地发展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而是要在敌我力量仍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

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因此曾命令鄂豫皖区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基于这一目标，地方武装大量被编并；地方党、政、群众团体出现许多“左”政策。虽然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当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利用良好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但是在这一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不是有阵地的波浪式的推进，而是偏重在敌人占据的城市周围和交通沿线活动，以致占领许多地方不能巩固，根据地周围的游击战争遭到削弱，内部许多反动势力也未乘机加紧肃清。这就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的原则，使革命根据地在大好形势下，未能得到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好的巩固和发展。不过这一错误路线，很快就被纠正了。

毛泽东同志说：“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鄂豫皖区红军三年来的斗争，就反映了这个规律。过去的各次围攻，都是在敌人内部暂时稳定的时候发生的。一九三0年十月，随着蒋、冯、阎等军阀混战的结束，蒋介石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暂时稳定了反动统治之后，便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鄂豫皖区连续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斗争，从此也相继展开。

二

鄂豫皖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开始于一九三0年冬，迄于一九三一年春。围攻前，敌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

之下，专设“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调集兵力九个多师。其计划：第一步造成“圆箍式”的包围；第二步控制我要路、集镇；第三步分区“清剿”。十月间，敌即在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逐步推进。

我军得悉敌之围攻情况，先向南线敌人反击。十一月上旬，红一军猛攻姚家集、黄安，两地敌军遭我沉重打击，仓皇退走；下旬，奔袭黄安东南的谢店，消灭了立足未稳的夏斗寅十三师一个营；接着转向敌人侧后，打敌弱点，三十日夜袭新洲，又全歼郭汝栋二十军一个混成旅。待何成浚慌忙调兵堵击，我已突然东去攻克罗田。以上几仗，给了敌人的围攻当头一棒，树立了我军声威，胜利地揭开了反围攻作战的序幕。

十二月初，敌全力向鄂豫边中心区围攻。此时红一军已转向皖西，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游击，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一面以蔡申熙同志率领的由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红十五军，突击敌人弱点。后因敌人大举深入我腹心地区，特委乃率十五军转至外线，准备会合红一军，转移敌之合击目标。我鄂豫边区地方武装，则结合广大群众，对深入之敌展开广泛袭扰——摸岗哨、割电线、除奸细、散传单，瓦解敌军，截捕敌之零散外出人员和马匹辎重，先后歼敌数百名，缴枪五百余支。敌人陷入我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海洋里，心惊胆战，行住不安，终于黯然退走。

在东线，十二月中旬，红一军由罗田出发，远程奔袭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的敌人，先后歼灭范绩熙四十六师两个营及反动民团千余；继出麻埠、独山，直逼六安城下。敌忙调兵一旅分三路反扑，其中路一个团，被我大部歼灭，其余两路也被击溃。接着我军回头西向，又在商城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歼其一团，缴山炮一门。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攻，

又被我痛快淋漓地粉碎，根据地周围敌军乃均转守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红一军、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同时在皖西成立了教导第二师。此时特委鉴于敌取守势，便确定以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消灭，并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敌人孤立据点。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红四军主力于一月下旬，围攻麻城磨家楼夏斗寅部一个营。敌以四团兵力前来解围，经三日激战，被全部击溃，我缴枪千支。接着，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新集，经我围攻并进行坑道作业，于二月十日炸开城墙，我军乘势冲入，把麇集在该地的千余反动武装一网打尽，拔除了根据地一个心腹大患。其他地方武装，也相继打下敌人围寨二十余处。下旬，我军乘胜奔袭京汉路之柳林车站，歼灭袁英新编十二师一个营，援兵两团大部被歼，敌旅长侯祥甫也被活捉。

以上各次战斗，打得敌人手忙脚乱。驻花园、小河溪一带之岳维峻三十四师向我反扑，三月上旬进到双桥镇。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从五十里外奔袭，一举歼其一团，占领外围阵地。岳维峻着慌，亲率两团，在飞机掩护下拼命反扑，战斗极为激烈。待我迂回部队抄敌背后配合正面猛攻，敌乃全部溃乱。我军和赤卫队将敌团团围住，纵横穿插，捕捉俘虏，满山遍野，红旗挥舞。不到一天，敌三十四师全部覆灭，岳维峻也当了俘虏。敌人的第一次围攻，遂告完全破产。

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鄂豫皖区红军歼敌一万三千余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次反围攻所以能获得如此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当时特委和红军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力军的运动战和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反围攻作战的指导原则。

三

第一次围攻被我粉碎后，敌人紧接着布置第二次围攻。一九三一年三月下旬，蒋介石限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围攻兵力增加到十一个师，并改用“追堵兼施”的战法。即以三个师组成“追剿部队”长驱直入，寻我主力作战；其余八个师分布四周扼要固守，堵击“清剿”。我之反围攻作战，仍然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

四月下旬，当敌正布置对鄂豫边区合击之际，我军主力即迅速东进，反击皖西敌人堵击部队五十七师和警卫旅，经过五日激战，于独山等地全歼敌人一个团零一个营。此时，敌之“追剿”部队，分别自光山、罗山、黄安向新集、七里坪合击。我十师二十八团和警卫第二、第三团，结合地方武装，对敌展开侧击、尾击，并在七里坪以北檀树岗给以痛击。敌人合击一无所得，并不断遭受打击，五月二日西绕宣化店退回罗山、潢川。

敌“追剿”部队结束了对鄂豫边的合击，待转向皖西时，我军主力却已突然乘胜西向。五月九日于泐湾，给敌北线堵击部队李韫珩五十三师以惨重打击。二十八日我军又南下，进击黄安、宋埠间敌人供应线上的桃花据点，守敌萧之楚部一个营在我军猛攻下伤亡殆尽；黄安敌一个旅驰援，被我预伏部队大部歼灭。

一个月来的反围攻作战。我依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付敌人“追剿”部队。红军主力则寻找有利战机对敌堵击部队实行各个击破。这样使得敌人的“追剿”不过是趟提心吊胆的“武装游行”，各级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被歼六千余人。蒋介石梦想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的第二次围攻计划，又告失败。

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四月，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区来。五月十二日，鄂豫皖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第二次围攻粉碎后，四军领导同志便同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并在以后成为党的叛徒的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大争论。

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在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四军领导同志建议：在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时，恢复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区反围攻。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巩固苏区”，一再否定了四军的正确建议。直到七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四军领导同志的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但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七月中旬，军部率六个团南下，八月一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前情况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我军西克罗田，南占浠水，并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何成浚除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并派十军军长徐源泉率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各一个旅前来截击。于是

我位于广济、英山的部队南北夹击，九月一日，与敌战于洗马畈，歼敌近千。至此时仅一月，我连克四城，消灭敌人七个多团，缴枪四千，俘敌旅长以下五千余名。黄、广、英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正当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竟借口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四军除执行分局批示外，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但是，张国焘无视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同志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已，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

四

一九三一年秋，随“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抗日反蒋空气弥漫全国。敌人内部不少地方派系，也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机反蒋。而在八月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又遭惨败。这时，鄂豫皖区经过两次反围攻的胜利，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已发展到三万人，并于十一月七日，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辖第四、第二十五两军），战斗素质进一步提高，已在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建立了许多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二十多万；群众拥军参战的热情更形高涨，当时在黄安就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一

切，为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但是，丧心病狂的蒋介石，无视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和要求，虽在国家命运千钧一发之际，仍然不放弃对革命的进攻。早在九月间，刘峙部队数师以及南京警卫师等被调来。敌人兵力增至十五个师。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上的重大变化，敌人的围攻计划受到严重影响，而给了我们主动打破敌人围攻计划的良好机会。因此，我军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便开始出击。为蒋介石卖国政策进一步激怒了的根据地军民，决心以反围攻的实际行动，痛惩卖国贼！

我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首先围攻黄安，将守敌赵冠英六十九师压缩城内，转入围城打援。十二月中下旬，麻城、黄陂两处援兵均为我击溃。城内守敌待援无望，二十三日乘夜突围，我军将其全歼，生俘师长赵冠英以下五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战后群情振奋，青壮年踊跃参军，原黄安独立团遂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在亚港地区击溃敌二、十二两师的五个团。随后南围商城，再行吸打敌人援兵。二月二日，猬集豫南之敌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二十余团沿潢商公路南援。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严重打击；我则连战连捷，士气高涨。于是我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困守商城之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接着围攻固始，并占领淮河要地三河尖，给戴民权匪部以沉重打击。

三月，皖西之敌四十六师图犯我麻埠、独山等地。我军闻讯，立即由豫南兼程东进迎击，二十二日渡过淠河，将敌军六千余人团团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同时集结主力待机打敌援兵。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所部被围甚急，忙调驻霍山的警一旅驰援，但迅速被我军击溃于骑龙铺；接着以四十六师留驻六安的一个团和警二旅再行增援，除被歼灭两团外，其残部和青山镇突围的敌人又被我围困于韩摆渡。

苏家埠，韩摆渡两地敌军经我近月围困，粮食断绝，飞机空投无济于事。我军乘机加强政治攻势，敌军士气更为沮丧，携械投诚者络绎不绝。陈调元智穷力竭，频频向蒋介石告急。四月底，敌以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七、十二、五十五、五十七等四个师十五个团共两万余人，自合肥大举增援。五月二日，当敌进入苏家埠东之戚家桥我预定地区，我军立即发起猛攻。此时恰值河水暴涨，敌军在我突然打击下阵容大乱，人马拥挤，自相践踏，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经过两日激战，除少数漏网外，援兵全部就歼，厉式鼎也被活捉。困守苏家埠、韩摆渡敌军，至此已山穷水尽，遂被接受最后通牒，于五月八日全部投降。这一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我以三个师十多个团的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先后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毙伤俘敌三万，生俘两万，缴长短枪两万余支，机枪五十挺，炮四十三门，击落敌机一架，为我鄂豫皖区空前大胜利。

战后，我乘胜北克淮河重镇正阳关，继下霍丘，东面前锋抵近合肥。接着主力横扫豫南固、潢、光外团敌军，再歼张钫两个旅。

此时，鄂豫皖区红军和根据地获得了猛烈发展。主力部队已组成六个师，达五万人。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

城，建立起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威震江淮；信阳、安庆、合肥等地敌人，均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反围攻中，“围城打援”战术，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这种战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某一据点采取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相当持久的围困，主要是为在运动中给敌人以速决的歼灭性的打击创造条件；而要点的夺取，则是这种运动、速决、大量歼敌的必然结果。当时，红军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战斗力日益提高；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敌人一些城镇据点陷于孤立；而形势也容许我军可以用较长时间对其进行围困，逼敌就范。此次反围攻，就在这些具体条件下，实际上遵循了上述毛泽东同志的原则，取得了巨大胜利的。但是这时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贯彻和张国焘路线的出现，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而且在军事上提出了与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相反的、极为片面的所谓“坚决进攻”的战略。这一错误方针，在当时有利形势下虽然还未充分暴露其危害，但终于带来严重恶果。

五

鄂豫皖区第三次反围攻的空前胜利，使敌人大力震恐。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之后，便调动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向鄂豫皖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攻。蒋贼坐镇武汉亲自指挥，并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二十四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区布成包围形势，陈继承、卫立煌、徐庭瑶三个纵队为其主力；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企图“聚歼”我军于长江北岸。

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

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但是，张国焘这时却为第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冲昏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早在二月间就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

六月二十五日，红军胜利出击京汉线。归来之后，方面军领导同志因部队已转战七个月之久，亟需休整，建议进驻适当地区待机。这一建议如被采纳，认真进行反围攻的准备，使红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那末第四次反围攻的结果将会有所不同。但是张国焘竟加以拒绝，坚持“不停顿的进攻”，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围攻麻城。

围攻麻城作战始于七月上旬。我军于外围先后歼敌三十一师之九十二旅和另一个团。敌人乃收缩外围据点，依城凭坚固守。我军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敌人得以从容部署围攻。还在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纵队便陷我霍丘，东、北两线敌军开始步步推进。八月上旬，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在此紧急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

机反攻，却令疲惫的红军仓促应战。这就使我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撤麻城之围后，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十二师先行出发拒敌，十二日于黄安西冯寿二湾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第十师击溃。待我主力赶到，敌已据地固守。我因强攻不利，星夜转移七里坪打击陈继承纵队。我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又给敌第二师以惨重打击。以上两次战斗，共毙伤敌十师副师长王劲修以下五千余名。但是当面敌人恃众固守，战局形成对峙。我军遂又北转，九月三日于胡山寨迎击进犯新集之敌。敌人遇我军主力，仍然采取凭坚固守待援的战术，战局复成对峙局面，而南面敌人又跟踪逼近，于是我军乃转战皖西，但未得手。十月初经英山、罗田地区西向，于团陂歼敌一个骑兵营；继出河口，击溃敌堵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一个旅。至此，我军已苦战两月，虽多次击溃敌人，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十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被迫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应该指出：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然而，张国焘此时已由恃胜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并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只是张皇失措，盲目西进。这就使得第四次围攻终于未能粉碎。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以及张国焘路线的指导下，“左”倾的形势估计、错误的战略方针，是这次反围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

但是，围攻没有被粉碎，这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挫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大规模围攻，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并未达到他彻底摧毁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聚歼红军的狂妄目的。

在党长期培养教育下和从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色，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堵截，战胜了种种困难，经过长途英勇转战，于当年底进入四川北部，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又汇成一股革命巨流，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大发展了革命力量。留在鄂豫皖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英勇斗争，直到全国解放，大别山上的革命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这正如无数革命实践所证明的：尽管反动派穷凶极恶，尽管历史道路是艰苦曲折的，但是革命必然胜利这个客观规律，绝对不可抗拒。

六

鄂豫皖区的四次大规模反围攻，有着许多经验，也有着严重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要获得发展和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正确的路线会使我们充分发挥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从而获得胜利；机会主义的路线，不但不能克服不利因素，而且还会把有利因素变为不利因素，使群众的英勇斗争不能获得应有的结果，使已经获得的胜利遭到破坏。我党我军铁的史实已经证明：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鄂豫皖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就是由于当时的主观指导，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了毛泽东思想，因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威力得以充分发挥，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第四次反围攻，虽然情况严重，主要还是由于机会主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结果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从这“三胜一负”之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

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

故乡的战斗

秦基伟

每当我从报纸上、广播中，看到或听到有关我的故乡——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七里坪的消息时，我仿佛又闻到了故乡那肥沃土地的气息，看到了那金黄色的麦浪和一望无际的稻田。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使我最难忘的，还有解放黄安城、活捉赵冠英的那次战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又以主力三个师，包围了黄安城。盘踞在黄安城的敌人是赵冠英的六十九师及反动民团武装，共万余人。

敌人在城外修建了许多核心工事，林立的碉堡，星罗棋布的各种火力发射点，蛛网般的交通沟、密密层层的鹿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我军经过了十多天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一部分敌人被歼灭了，其主力撤退到城里，企图以城墙为屏障，进行顽抗，等待援兵。在这期间，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城内的敌人，也趁增援之际，向外突围，均被我围城部队迎头打了回去。

敌两次增援失败后，仍不甘心，于是又开始了第三次增援。一天拂晓，敌人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的阵

地，到下午三点多钟，其全部兵力已进至离黄安城仅十余里的地方，逼近到我打援部队固守的最后一个山头。

情况非常紧急。被围困在黄安城内的赵冠英，也得意忘形起来，并开始突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总指挥部驻的地方，已经清楚地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而且愈来愈近，逾来逾密集。很明显，如果不立刻把增援的敌人打退，如果让它和城内的敌人汇合在一起，整个战役将对我们十分不利。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手枪营接到了总部的命令：马上做好战斗准备，配合主力打退敌人的增援。

我在总部手枪营二连当连长。我们手枪营，都是些精明强干、打起仗来像小老虎一样的小伙子。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外加一把大马刀。手枪营的战士很多是黄安人，谁都想刀磨得风快，一接到命令，都巴不得能生出两只翅膀，一下子飞到敌人面前，把敌人消灭掉，然后转回来打黄安。

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二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因此战士们一见总指挥在前面，便嚷开了："快跑，总指挥又出发了！""加油，赶到总指挥前面去。"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的背后。山的前面，我打援的十一师正在与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我们来到靠山顶，跟着总指挥带的参谋便命令我们在山坡上荫蔽。这时候，我才看到总指挥带的参谋和警卫人员都荫蔽在山坡上，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的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

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我们隐蔽在山坡上，谁也不说一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总指挥。按照我的心愿，真想跑上去，一口气把他拖下山来。可是我知道，不能这样做。

枪弹越来越密，我转到总指挥的一边，爬上山顶，想看一下地形。来到山顶一看，只见敌人已攻到了半山腰，并且正拚命向山上攻击。烟火笼罩着整个山坡。我不安地看了总指挥一眼，他仍若无其事地站在山顶上观察着前方。我赶快爬了回来，向各排长传达了情况。战士们听说敌人攻到了前山腰，更为总指挥的安全担心。正在这时，总指挥放下望远镜，转回头来，对他身后的参谋说："命令二十八团和手枪营，准备冲锋。"说完，又转回头去观察。

战士们早急得不行了，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把敌人消灭掉。掌旗员拉掉了旗套，战士们抽出马刀，在我们右侧的二十八团，也同时展开了所有的红旗。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喊着杀声，向敌人冲去。忽然，总指挥的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鲜血。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一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总指挥负伤，激起了我们对敌人无限的愤怒。我们手枪营从正面，二十八团从右面，十一师从左面，像决了堤的洪水，呐喊着朝敌人压过去。顿时，满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淹没了枪声，震荡着山谷。我们连的百多支驳壳枪，像一把无形的铁扫帚，哗哗一扫，敌人便倒了一片。敌人慌乱了，战士们紧接着便冲进敌人群里，跳进敌人工事里，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与敌人混战在一起。一个荫蔽在工事里的敌人，正瞄准我们的掌旗员射击，立刻被一个矮胖胖的战士发现了，他举起驳壳枪，一枪打去，敌人一缩头，他便一步窜了过去，举起马刀，把敌人砍死在工事里。另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用手枪逼着一

个机枪射手，拚命地向我射击，我们的一位班长，一枪把敌人的军官打死，机枪射手扔掉机枪就躲藏起来。

敌人开始动摇了，溃逃了。我们不放松一步地追赶着，无数面红旗在迎风招展，驳壳枪上的红穗子、马刀上的红绸子也在飞舞着，冲锋的呐喊声惊天动地。一个敌人，像被打懵了的狗，吓破了胆的鸡，东一头西一头地向松树丛里站。一个战士，伸手抓住他的衣服，缴下他的枪，向我们的后方指了指，又继续向前追去。另一个敌人，跑着跑着，转身想向一个战士射击。那个战士几步窜过去，一刀把他的枪砍落在地上。掌旗员高举着红旗，哪里敌人多就向哪里前进。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杀向哪里。有的同志负伤了，包一包伤口，又继续追击。有的同志子弹打光了，捡起敌人丢下的枪继续向逃跑的敌人射击。逢山爬山，遇河涉水，一口气追出十五里，收复了我们的第一道防御阵地桃花镇。，

敌人的第三次增援彻底被击溃了。企图突围的敌人，也被打退到城里。

又经过了几天的围困，敌人已接近了粮尽弹绝的地步。敌人多次增援，也被粉碎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通知："我们的飞机要来黄安城轰炸敌人，散发宣传品，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这消息立刻使所有的人都振奋了。我们红军当时只有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原是敌人的一架高级教练机，一九三0年春，它在宣化店上空被迫着陆，被我们俘获。那时候，我们听说飞机的翅膀和其他一些地方损坏了，因此大家也没把它放在心里。现在忽然听说它要出马炸敌人，整个部队都欢腾起来了。有的战士高兴地说："他娘的，过去它黑天白日跟着腚瞎嗡嗡，斯侮我们，现在也叫他们尝尝我们的'鸡蛋'吧！"有的指着黄安城的敌人骂道："等着吧。不投降，就'慰劳'你们'鸡蛋'吃。"

在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高兴得简直坐卧不宁。有的人兴奋地向飞机喊着："同志，辛苦啦，下来休息一会再下'蛋'吧！"有的人嘱咐似的说："同志，要下准啊！叫他们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有的人把帽子、手帕丢上天空；有的人竟跟着飞机跑起来。大家都站在山头上，目不转睛的盯着飞翔在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过去，当我们听到飞机声音的时候，感到是那样刺耳，可是今天听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是那样悦耳和舒心。

我们的飞机在黄安城上空盘旋着，敌人却愈来愈多地涌向几块空地。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落下几颗炸弹。顿时传来了一片隆隆的爆炸声，黄安城烟雾弥漫着。烟雾消散以后，还可见到有些敌人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直楞楞地望飞机出神。

赵冠英在外援不济，突围不得，又遭到我飞机轰炸之后，动摇了。为了作最后的挣扎，保全他个人的生命，他又用冲出去"官升一级，士兵升官"的欺骗办法叫一部分军官和士兵组成了"敢死队"，在我围困了他整整二十七昼夜之后，从南门突围了。

敌人一突出城，便与我围城部队展开了肉搏战，除了少部分敌人突出了包围，绝大部分又被我迎头打了回去。我围城部队尾随着退回城去的敌人，攻进了城门，与敌人展开了巷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手枪营又奉命配合兄弟部队追歼逃出包围圈的残敌。

战士们听说敌人逃跑了一部分，生怕里面有赵冠英，大家绑紧鞋带，紧紧朝敌人追去。沿途的赤卫队员和老乡们，也自动地拿起了长矛、梭镖、铁铲、木棒，高喊着："活捉赵瞎子！"从四面八方向逃跑的敌人包围着、追击着。到处是追击敌人的人群，到处是活捉赵冠英、活捉赵瞎子的喊声，到处是举枪投降的俘虏……我们二连一直追到高桥，才全部消灭了逃跑

的敌人。仅我们一个连就活捉了二百多俘虏，与我们追歼逃敌的同时，黄安城也被解放，全歼敌万余名。

第二天，有几位老乡，抬着一个身穿大褂，负了伤的大烟鬼来到总指挥部。一位老乡掀开盖在这个大烟鬼头上的东西，指着他的一只死羊眼说："他就是赵瞎子，他就是赵冠英。就是跑到天边，剥了皮，我们也认识他。"

原来赵冠英在突围时，叫他的秘书装扮成他的模样，骑着他的大白马，给他当替死鬼。可是哪里想到一突围他就负了伤，那不争气的秘书又不甘心当这替死鬼，一被俘就揭了他的底。虽然他使尽了所有的伎俩，左藏右躲，更衣换装，可是仍没有逃出天罗地网。

赵冠英身子缩作一团，不断地眨着那只死羊眼，结结巴巴地说：

"是，是，我就是赵——瞎——子，我就是赵冠英。请红军先生和父老们开恩、留命。"

黄安城——我的故乡，解放了。

将星灿烂

红安籍将军简历



上将

陈锡联（1915—1999），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营教导员、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解放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韩先楚（1913—1986），湖北红安人。1929年入团，1930年由团转党。曾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团长、三四四旅副旅长、新三旅旅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三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军长。解放后，任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十九兵团司令员，中

南军区参谋长，副总参谋长，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秦基伟（1914—1997），湖北红安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0年入党。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副旅长、师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鲁豫军区第九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王建安（1907—1980），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七兵团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解放后，曾任八兵团、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郭天民（1905—1970），湖北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红军时期，曾任排长、副连长、教导大队长、师参谋长、师长，江西军区、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鄂豫军区、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司令员。建国后，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长、院校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诚汉（1917—　　）湖北红安人。一九三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北军区遂宁军分区司令员，副军长、军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周纯全（1905—1985），湖北红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师政委、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军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解放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政委，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富治（1909—1972），湖北红安人。1931年入党。从红军时期至建国后，曾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组织部部长，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政委，太岳军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第八纵队司令员，军区代司令员，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活动，犯下严重罪行。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对他的《悼词》。

中 将



王近山（1915—1978），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团，1932年转党。曾任连、营、团、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军长兼政委，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飞（1905—1984），湖北红安人。1927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红军大队政委，团政委，抗大六分校校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旅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参谋长、司令员，晋豫联防军区司令员，西康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副院长，军政大学副校长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昌毅（1914—1999），湖北红安人。1929年入团，同年入伍，1931年转党。历任排长，连指导员，科长，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旅长，纵队副司令员，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海军基地、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天焕（1912—1986），湖北红安人，1928年入团，次年转党。1930年入伍。历任营教导员，科长，师、军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副政委，兵团政委，公安部队副政委，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谋部警备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第二炮兵政委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天云（1913—1980），湖北红安人。1929年入伍，同年入团，1931年由团转党。曾任班、排长，营长，副团长，团政委，团、旅、师长，军分区、纵队副司令员，军长，志愿军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仁初（1909—1969），湖北红安人。1927年入伍，1932年入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营长、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营长、团长、旅长，滨海军区参谋处处长，鲁南支队支队长，鲁中军区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志愿军军长，

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胡奇才（1914—1997），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团，次年转党。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师政委，山东纵队支队司令员，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辽东军区、辽西军区司令员，副军长，工程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徐斌洲（1912—1985），湖北红安人，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由团转党。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委、师政委、军政委，军事学院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国务院农机部、八机部、一机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徐深吉（1910—2000），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过农民暴动，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副团长、旅长、师长，晋冀鲁豫军分区军政大学副校长，冀南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詹才芳（1907—1992），湖北红安人。1927年入团，同年由团转党。参加过黄麻起义。历任营长，团、师、军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冀东军区司令员，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军长，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

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少 将

程儒珍（1900—1963），湖北红安人。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任黄安县农民自卫军中队长，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工农革命军第7军、红11军31师副官、红1军部副官处副官，红4军经理处科长，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西北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129师386旅771团供给处处长、青年纵队供给处处长、东进纵队供给处处长、385旅供给部部长、冀东军区供给部部长、东野9纵后勤部部长、46军后勤部部长、湖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韩卫民（1902—1981），湖北红安人。1926年，参加工会和反帝大同盟组织，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任乡苏维埃主席，区农民协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和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先后任红4军11师32团宣传队队长、36团教育参谋、11师通讯股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14团参谋长，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参谋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独立第7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袁克服（1907—1982），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入团入党。历任黄安县第3区游击队党支部书记、共青团第3区区委青工部长、黄安县指挥部指挥员、红4军12师34团政委。袁克服离开主力部队后，担任过鄂豫皖团省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独立第1师，师长。1935年，与张国焘另立中央行为作斗争被撤职，抗日战争时间，历任129师政治部民运部股长、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处长。解放战争，袁克服到东北，历任6纵18师政委、43军副政

委。建国后，袁克服到北京，担任总干部部抚保部部长。1957年起，担任陕西省军区政委长达22年。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金世柏（1908—2000），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他历任25军73师交通队排长、指导员、红31军政治部组织干部。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被派往南江、宝兴担任县委书记。藏民独立师副师长。抗战时期历任129师386旅771团政治处股长、386旅政治部科长、军分区政委，3分区54团政委，太岳军区供给部政委、华北军区15纵供给部政委、62军后勤部政委。建国后，担任成都军分区后勤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厚福（1909—1975），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本地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东北道委第3路游击师连长、特务营政委、红28军营政委、光山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第3路游击师师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他担任黄安县区委书记、新四军游击大队队长、豫鄂挺进纵队1团团长。新四军5师14旅旅长、特务旅旅长、第1军分区司令员、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罗厚福担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罗厚福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李世炎（1909—1990），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任连长，红28军手枪团分队长，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9团营政委，14团、7团政委，新四军2师4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李世焱担任华东野战军10纵30旅政委、12纵36旅政委。建国后，担任安徽省军区第二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耿锡祥（1909—1990），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任城区袭击队队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红

四方面军通信队线电班副班长。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台长，延安军委3局2科副科长兼通信材料厂厂长，军委3局1科科长，主管电台工作，解放战争，耿锡祥任新华总社电务处处长，建国后，他历任南京军区通信兵部副主任、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电子工业小组组长兼三机部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四机部监察组副组长、四机部政治部主任。1961年晋升为少将。

黎锡福（1909—1976），湖北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1师1团排长、12师34团连指导员、34团副营长、红30军88师264团营长。参加了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介休游击第5支队副支队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纵57团团长、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4纵13旅副旅长、南阳军分区司令员、13军39师师长。建国后历任云南宁洱边防区司令员、副军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邹国厚（1908—1999），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红1军1师3团机枪营班长、红4军11师33团排长、连长、31团营长、副营长、副团长、红31军91师277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团长、新7旅副旅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后任冀南军区第6分区司令员、新4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豫皖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参与开辟桐柏解放区。建国后，任河北军区刑台军分区司令员，河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河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绍华（1910—1978），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任

红31军91师排长、交通队长、连长。1935年任红31军91师271团1营营长，后任师侦察科长、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通信股股长、771团团长、抗大上干队副队长、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徐绍华到东北，历任吉东军区警备旅副旅长、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东满军区独立1师副师长、东野7纵19师首任师长、44军132师师长。建国后历任高级步兵学校队列部部长、华北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

贺　健（1910—　　），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红9军特务营连指导员、27师81团连长、营政委、80团副团长、团政委。抗日战争调到八路军115师，任晋西独立支队2团营长。25军副军长，1952年25军撤消番号，他担任鲁中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到1959年，他担任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后任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

熊应堂（1911—1996），湖北红安人。1928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曾任红四方面军四军11师师部手枪营班长，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特务队分队长，军委通讯队副排长、排长、指导员，川陕根据地通江县军事指挥长，川陕省军事指挥部独立团1营营长、团长、红四方面四军10师29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熊应堂历任副旅长、旅长、师长、25军参谋长、副军长。建国后，熊应堂担任过25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同时兼20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程悦长（1911—1961），湖北红安人。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程悦长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副排长、排长、红31军93师连指导员、连长、93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93师医院政委、师供给部政委。抗日战争时期，程悦长任129师386旅

772团卫生队指导员、营教导员、新1团政委。1940年起，程悦长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4旅16团团长。解放战争时，任一野6军17师师长、师长兼政委及迪化军分区司令员，6军军长，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部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殷国洪（1911—），湖北红安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1师262团连指导员、红30军88师268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西路军失败后，殷国洪随部队在山里打游击，弹尽粮绝，最终被俘。逃脱后重新找到了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3团特派员、冀南军区9旅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第3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参加了响堂铺战斗、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2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冀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10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桐柏军区第1军分区副政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政委。1961年晋升为少将。

卢燕秋（1913—1964），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担任红9军25师75团参谋、排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冀鲁边区支队连长、支队参谋长，胶东军区营长、山东纵队副团长，东北民主联军4纵警卫团团长、12师34团团长、12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41军154师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衡宝等战役。建国后，任军参谋长。195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副军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参谋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张天恕（1913—1985），湖北红安人。土地革命战争时，在红四方面军历任连指导员、营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担任129师

385旅769团2营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政法处处长、东北军区保安旅副政委。建国后，1951年张天恕入朝作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军第18师师长兼政委。回国后，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郑国仲（1913—1992），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军，在红1军任过排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9旅旅长，纵队副司令员，11军副军长，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训练基地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

况玉纯（1913—1989），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4军10师30团营部书记、团政治处秘书长、30军88师政治部秘书长、89师264团营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兵站站长、骑兵团教育股股长、政治处主任、政委、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9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7纵21旅旅长、独立1旅旅长、第3军分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17军49师政委。建国后，历任师政委兼中共独山地委书记，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后方工程建筑部副部长、营房部政委、部长、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秦光远（1913—2002），湖北红安人。193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独立第1师军医、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军医、分院主任、红4军医院主任、红4军卫生部副部长。参加了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卫生队队长、旅军医处处长、旅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冀东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9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

东北野战军12纵卫生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21兵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荆江分洪工程部队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工程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文化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64年，秦光远晋升为少将。

陈美藻（1914—1989），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4军11师政治部主任、10师30团政委、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营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山东军区特务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1旅政委、华东野战军8纵24师政委、10纵政治部主任、第十兵团28军政委。主持过第28军全面工作，建国后，历任渤海军区政委、山东军区干部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定灼（1914—1987），湖北红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4军11师30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32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军司令部科长、10师30团政委。参加了长征。1团团长、冀南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第2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独立5旅旅长、晋冀鲁豫军区10纵29旅旅长、桐柏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司令员、第四野战军58军173师师长。建国后，历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司令员。1959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武汉军区副参谋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

江　波（1914—1987），湖北红安人。1928年参加黄安县游击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红四方面军10师交通队指导员、12师36团营政委、11师31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参加了长征。历任129师358旅教导队教导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7团营教导员、留守兵团政治部直属政治处总支书记、新4旅供给部政委、西北野战军17师供给部政委、6纵后勤部副政委。建国后，历任军后勤部政委、第一通信学校政委、军委高级通信学校政委、陕西省军区副政委。1961年晋升为少将。

刘福胜（1914—1994），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军31军91师271团政治处主任、93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31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93师277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营教导员、冀南军区东进纵队1团政委、青年纵队3团政委、新4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0团政委、冀南军区后勤部政委、冀南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10纵30旅旅长、河南军区南阳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担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赵鹤亭（1914—1990），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1军骑兵连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骑兵排长、八路军东进纵队骑兵大队教导员、特务营营长、冀南军区特务团团长、第1军分区副司令员、第3军分区32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2纵5旅副旅长、鄂豫军区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50军148师副师长、代师长、师长。回国后，赵鹤亭历任50军副军长、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马忠全（1914—1995），湖北红安人。在红四方面军红4军担任过连长、营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在129师769团担任连长，不久升任3营营长，8旅旅长，二野10军30师师长。建国后，任海军鱼雷快艇学校校长，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北海

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闵学胜（1914—2003），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4军11师1团连长、31军73师279团司令部侦察股股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129师386旅772团营长、团参谋长、18团团长、新四军5师3旅旅长。解放战争，闵学胜历任冀南军区参谋长、冀南豫军区独立3旅旅长、17军51师师长。建国后，闵学胜担任铁道兵4师师长。1952年入朝，历任志愿军铁道兵4师师长、志愿军铁道兵新建铁路指挥所副司令员。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他历任铁道兵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勤部部长、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戴克林（1914—1990），湖北红安人。13岁参加童子团，16岁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历任宣传队长、卫生队长、连指导员、连长、副营长。在河西走廊恶战中负重伤，一路乞讨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支队连长、侦察参谋、第一支队支队长。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59师师长，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任师长、副军长、安徽军区参谋长。1961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戴克明（1915—1986），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黄安县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支队供给处会计科科长、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伊川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分区1纵8团政委，鄂豫军区潢川军分区4团政委、河南军区潢川军分区副司令员、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任江西军区宁都分区副政委，第5步兵学校政委、校长、湖北省

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程启文（1915—1994），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在红11军31师3大队当传令兵。不久，到师政治部当勤务员。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25军政治部宣传员、巡视员、73师217团总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程启文随同党中央代表郑位三同志，从延安来到红安七里坪寻找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28军，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总务科科长，第五支队特务营教导员、江北指挥部独立第4团副团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警卫大队队长。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来（安）六（合）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程启文到东北，任独7师副师长、39军152师副师长。建国后，历任55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副院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

罗应怀（1915—　　），湖北红安人。12岁参加黄麻起义，14岁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12师34团1营2连打旗兵兼连部勤杂班班长、副连长、连长、团长。参加了长征。建国后，罗应怀在福州、成都、北京三个军区担任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甘思和（1915—1988），湖北红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四方面军军需处勤务员。团委书记、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干事、12师35团组织科科长、红31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后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机要秘书、总务处处长、冀南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第9军分区副政委、华北军区14纵41旅政委、14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炮兵政委、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胡正平（1915—1994），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次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历任排长、指导员、副营长、营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胡正平作为红军干部，被派到山西青年抗战决死第三纵队，担任7总队的总队副、游击第4支队支队长。山西牺盟总会人民武装自卫大队政卫4支队支队长，32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61军178师师长。建国后，历任第2步兵学校校长，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汪运祖（1915—　　）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4军1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12师34团参谋。10师师部通信队队长、11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留守兵团385旅770团营部书记、团供给处股长、供给主任。385旅供给部生产科长、经济建设处处长、385旅特务营营长、385旅供给部副部长、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卫生部供给部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江苏省军区政委、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

何德庆（1916—1993）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11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31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12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385旅政治部宣传队队长，营政委、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1纵3旅7团政委、晋冀鲁豫军区3纵7旅副旅长、3兵团司令部军政处处长。建国后，历任3兵团后勤部副政委、川东军区后勤部政委、后勤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志勇（1916—　　）湖北红安人。早年加入共青年。1931年，参加了红军，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红4军12师34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和青年干事、红9军25师74团参谋、红9军参谋，25师侦察科长。他经历了西路军的失败。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团当特派员，经历了皖南事变的收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张志勇到东北，担任过补训4师政委、170师政委。建国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担任空6师政委。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历任空军航空工程部副政委。国防科技委训练基地工程部部长、后勤部部长，国防科技委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反导弹基地担任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涂锡道（1916—1989），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特务队队长、支队长、交通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指导员、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民运干事、山西沁县干部团团长、太南军分区政委、太西地委军事部部长、129师卫生部模范医院政委、八路军卫生学校政委、抗大总校3大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政府军工局副局长，军械部副部长、总军械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张竭诚（1917—2001），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25军军部交通队排长、红15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八路军115师344旅司令部参谋，689团代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二支队5团团长、3师独立3团团长、东野2纵6师18团团长、副师长、6师师长。参加抗美援朝，任39军117师师长、39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副军长、代军长。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历任39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詹少联（1917—2003），湖北红安人。1927年任乡儿童团团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少共区组织部长。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11师32团1营当传令兵，1934年任红25军224团卫生队看护长、223团卫生队看护长，团医务主任。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红26军78师32团卫生队队长、78师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卫生部医生，师卫生部医务科长、模范医院院长、白求恩医院院长、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卫生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6纵卫生部部长兼政委、3兵团卫生部副部长兼12军卫生部部长。建国后，任军委卫生部干部处处长、医疗局局长、兽医局局长，海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

谢正荣（1918—1977），湖北红安人。12岁参加黄安县游击队，当勤务员。任黄安县独立营通讯副班长，参加红军后任班长、红25军73师230团排长、副连长。1935年2月到陕北瓦窑堡，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甘肃庆阳红军大学步兵科第2团连指导员，后历任山西五台县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5大队营政委、6大队1营营长、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独立旅第1团团长，4纵11旅31团团长，11旅旅长，第十九兵团64军191师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64军191师师长、副军长。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64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50军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省国防工办党组书记兼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世忠（1918—1992），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25军223团2营通信班长，218团连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华中野战军9纵73团团长、华东野战军2纵教导团政委、4师副师长、21军62师政委。建国后，担任过军参谋长、军事学院

高级兵团战术教授会主任、福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吴振挺（1916—1994），湖北红安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河口县独立营排长，独立团连长，副营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陕南游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手枪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二团政治教导员，第四团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十四旅三团副政治委员，一纵一旅二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一总队政治部主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军事工程学院兵工程系政治副主任，洛阳工程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程部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焱清（1910—1996）湖北红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二二0团排长，红二十八军第五十团连指导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三0团连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连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七大队营政治教导员，第九大队政治委员，第二分区十九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辽军区第二十一分区副司令员，独立第八师副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永顺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湖南省兵役局副局长、局长、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

江腾蛟（1919—　　），湖北红安人。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县区儿童团大队长，鄂豫皖苏区陂南县儿童局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十五团连指导员，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辽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一五五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三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所国心　董　滨

红安，过去叫黄安，它位于大别山的东段。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战火纷飞中，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大本营。当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里，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从这里走出了二百二十三名将军，因而，人们誉称红安为“将军县”。

为红安籍的将军们——干杯

198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由北京始发的专列开进了一个远离首都的车站。车上走下一群着将校军服的X国人……

翌日，在武昌东湖侧畔的珞珈山宾馆举行了欢迎宴会。

这位X国的国防部长被誉为“中国通”。他在讲话中说：“两天前记者曾问我，此次来中国，为什么执意要来武汉？”他用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随即话锋一转：“因为我是一个国防部长。因为武汉地处中原，自古乃是屯兵重地。还因为这里有一个将军的故乡，一个叫红安的县里出过二百二十三位将军……”

“中国通”果然名不虚传。“将军的故乡”，红安也当之无愧！他在掌声中端起酒杯：

“我钦佩中国的将军，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因此，在这里我提议，为在座的周世忠将军——为二百二十三个红安籍将军的代表，干杯！”

乐队奏起《军队进行曲》。周世忠副司令员端起酒杯，向这位国防部长致意。他不仅想到了二百多个同乡籍的将军，也想到与了红安有着近似血缘关系的我军一代将帅：徐向前、陈赓、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李德生……在那先后持续了二十二年的战争中，红安以山田里的米粒、森林中的浆果，哺育了他们。而他们凭借这块土地，聚集起四十八万红安儿女，开辟了鄂豫皖苏区，组建了红四方面军。

这都是历史了。

战争结束以后的三十多年中，红安人把自己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来访的外国人，告诉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戴着柳盔帽的越南人、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夹克衫里揣着《格瓦拉日记》的玻里维亚人……从五十年代以来，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带着满腔虔诚来到红安，拜访心目中的“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贫穷的富翁

“狼坡”……“熊窝”……“鹰嘴石”……

古老的乡曲中一串古老的音符。

这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村名，记载着从这块土地上走过去的人们。上溯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间，最先来到这里垦荒种地，建立村庄的人们，一年四季，与风灾、干旱、洪水和饥饿抗争，他们无暇考虑为村子命名，许多村名是自然得来的：有的以劳

动生息在此地的整个氏族的姓名命名，如张家湾、王家大屋；有的就是这个地方过去的主宰者，如猴湾、野猪岗；而更多的村庄的名称里，常常饱含着勤劳山民的希望破灭时的痛苦和辛酸，如洪水冲、埋人沟、望天畈……

几千年来，红安人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性格和顽强精神，与大自然抗争，在饥饿中生存、繁衍下来。红安人那种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仿佛一种遗传基因，它即使不在儿子身上，也一定在孙子或曾孙身上苏醒过来，孕育出红安人那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在红安县北的山村里，至今恪守着一种习俗，就是无论谁猎到什么野味，都要举行全村的庆祝活动，叫做祭山。各村举行祭山的方式虽不相同，但其结果都是一样：全村老少共同把猎物吃光。其理由是，既然你的猎物是山神的礼物，那么，所有的乡亲就都可以到你这儿来作客，而当人家有猎物时，你同样也可以去参加。而上方寺村主持这项活动的“祭主”，竟是一个五二年回乡的老红军张祖富，上方寺的人不分老幼都叫他张大爹。

上方寺，是天台山下一个被葛藤包围的小山村。十六间红松为梁、青石垒墙的小屋，都只有一扇窗子，窗棂上盘绕着沿墙而上的葛藤的枝蔓。葛藤，果可入药，根能充饥……对上方寺的群众来说，在红军时代、建国之初和大跃进年月里，都曾经成为他们的主粮。山里人时时受到大自然的抑制，自然的力量威慑一切，山民们老是在期待某一种变化并思慕另一种生活。正是这种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魂牵梦萦，使山民们得以忍受艰辛的现实生活，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许，张祖富正是秉承了山民这种剽悍的性格，才不无遗憾地从城里回到山里并凭着他精湛的枪法，成为天台区各村寨“祭山”会上的显赫人物。

“我喜欢打野猪。你们晓得么，在你面前的不是只山兔，而

是一头真正凶猛的野兽。那有多带劲呃！”“我打野猪，是用嗥叫声来诱惑它们的。我会学野猪叫，学得很象，你们听了，简直会把我当作真野猪来打呢！”说着，他用两手在腰间拍了拍，开怀大笑。

五九年至六二年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饥饿时期”。这三年中，张祖富有一大半时间蹲在山里狩猎。每当他从山上捎下“来人抬吃食”的口信后，全村就象在庆祝一个盛大节日。男人、妇女和孩子一起忙活起来。

队办食堂垮了，但那张大饭桌——用一劈两半的粗大云杉原木拼成的桌面，仍然那么结实。现在即将在它上面进行的，是颇带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大聚餐。劈好的柴棒被搬到三脚大铁架旁，三脚大铁架是支锅用的，上面悬着两只粗重而结实的铁钩。接着，人们用茛帚和细沙擦洗一口能盛三担水的大锅，直到把锅擦得锃光发亮。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啦！”

“来啦！来啦！来啦！”

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一齐沿着山路跑去迎接张祖富进村。这时的张祖富就是一位将军下达着命令，指挥人们将野猪拉到小河边，退毛的，剥皮的，开膛的，烧火的，有条不紊地忙活开了。

大锅里的水煮开了。月桂叶和花椒随着沸水翻滚。这时，张祖富把一大筐猪肉哗啦啦倒进锅里。隔不多久，星星点点的油花就浮到汤面上。接着，就有一两块野猪肉升腾而起又翻转而下。……一股鲜美的香味弥漫开来。最后，张祖富精神振奋，站在大锅旁，拿着一把铁勺，为每个乡亲分配一份野猪肉羹。当他最后一次从锅里捞起残汤碎骨，倒进一只搪瓷碗时，正在忘情吃喝野猪肉羹的人们，都会停止咀嚼，面带愧色地望着这位老人……

种　　籽

在红安这五光十色的林带里，有一种树叫火松，红安人称他“将军树”。

“将军树”的名称来自一位将军，他叫曾昭科，当过少将师长、省水利厅副厅长。一九五七年冬，他带着四百多名省机关下放干部来到天台山，开辟一个新林场。

临行前，曾昭科的老旅长、省长张体学对他说：“当年，我们在那里打仗，让人家搞了‘三光’。如今，我们要还上这个帐，红安的山不绿，你就莫给我下来！”

曾昭科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带领人们住茅棚、挤火铺，三九天上山刨鱼鳞坑。两年后，天台山上添了一片新绿，站立起两百多万棵幼树。

“十年树木”，一棵树苗种下后，需要长期的等待，曾昭科却没有这个耐性。他掏出自己全部积蓄，托人从苏联买回来十箱火松种子，火松是速生树，五年能长到十米，而普通松树长这么高，需要四十年。这十箱种籽在曾昭科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他满心喜悦地等待着春天下种的时节。

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曾昭科被打成右派，因为他竟敢挡“钢铁元帅”的驾，对来林场砍树炼钢的人抄起了枪！

他被撤了职。在他的小茅屋里，只剩下一枚军功章和十箱种籽。这十箱种籽也被判了死刑，在苏区的土地上，岂能让“修正主义”的种子发芽！

在其后的十四年中，曾昭科守着这十箱种子艰难度日。火松种子是可以吃的。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吃掉这些种子有谁责怪他呢？然而，即使在曾昭科靠稀粥菜汤果腹时，他也没有

动过一粒。一九六一年的春节，他的小儿子偷偷地打开箱子，装了一帽子种子下山换麦芽糖，曾昭科追下了山，从孩子手里夺回种子。他抬起了手，但看到孩子瘦黄的小脸，却打不下去。他抱着孩子一步一步地到小摊子上，脱下身的毛背心，换来半斤麦芽糖……

这十箱种子是将军的希望。

一九七五年夏天，曾昭科同志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九岁，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但他给故乡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献礼。如今，天台山林场，曾昭科留下的火松种，已经变成了大片的速生林，长成了几万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在曾昭科同志的坟前，我们看见了四棵高大的火松。四棵树的树冠连成一片，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将忠魂笼罩在浓荫下。

我们抚摸着火松的躯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莫将心事和泪说

在红安县统计局，我见到这样一组数据：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三年，红安共上交公粮十八亿九千五百四十六万斤。

这是一个苏区县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县是可免交公粮的。就这个问题，我们曾向县委领导、一般干部和普通农民提出“为什么”，回答几乎是相同的：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国家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从他肩上减轻些压力！

红安人做到了这一点！

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史上沉重的一页。在那三年里，连遭干旱和水涝袭击的红安土地上，从县

长到每个百姓都勒紧裤带，为祖国度过难关提供了他们可能提供的最大热能——一亿六千万斤粮食。六零年冬，省长张体学去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副总理紧咬嘴唇，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当红安人听说这件事后，红安县委庄重地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重灾区。这一千万斤大米，是当时四十二万红安人留给自己的口粮啊！当这个决议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时，三百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投了赞同票。而他们自己却在忍饥挨饿！

一九八一年冬的一天……

大西河畔的新集镇头，纷扬的大雪中，韩先楚的座车被人拦住了。久候多时的公社干部们抖落着一身雪片，把将军请进了生着炭火的公社办公室，他们请将军提出想见哪位乡亲，他们把接到这里来。

盛情难却，韩先楚同意了。他望望窗外的大雪，说："这不是出门的天气，莫叫多人了，就叫海洲来吧。"大概是韩先楚又记起了那笔旧帐：将军至今还欠着农民吴海洲四斗谷子，那是他五十年前当红军时借下的军粮。四九年大军南下，当时任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重返故乡，他来到吴海洲家里，从皮包里取出三支钢笔："听说，你有三个机灵的伢子？"吴海洲点点头。"这三支钢笔你收下吧，叫伢子好好念书。"吴海洲顿时连声道谢。这倒不是他贪图几支钢笔，而是韩军长还记得他这一家。接着，韩先楚提起了那四斗谷子的陈年宿债。吴海洲冒火了！他认为这是太小瞧他了。他告诉韩先楚，家乡土改了，有了牛也有了地，这地只要舍得花力气，种啥长啥，而力气他有的是。最后，吴海洲得意地对韩先楚说：那张借条我保存好，那上头有你韩军长的签名，日后要留着作个"想头"。当时的吴

海洲是那样认真地相信，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

吴海洲被接到公社，他已是七十八岁的人了，着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喜气。他同将军的交谈是不拘礼节的：

“你家还烧闷烟灶吗？你老婆的眼是熏瞎的吧？”

“那是害病害的，么子熏瞎的。”

“你怕烧不（火葬）？不怕，就到我屋里去住。”

“眼下乡里富起来罗，你莫操心。”

“你冷不？只穿这点衣服。”

韩先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富起来”的农民，军装里面的肩胛骨在打哆嗦，一双冻得开裂的大手上结着血痂，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不冷，山里人就是经冷，你安心在京城做官吧。”

韩先楚完全明白了，“走，海洲，我到你家瞄瞄去。”将军这次是下命令了。

韩先楚的故乡吴家嘴村，三十来间房屋拥挤在大山的一道沟壑里。吴海洲领着将军走下山坡，用大得出奇的嗓门通知屋里的人：“昌荣，韩司令来啦！”

屋里的人们忙着收拾起来。然而。炕上那床破渔网式的棉絮，再怎么“收拾”也不会让人顺眼，韩先楚走进屋里，向女主人问好。吴海洲的女人缓缓转过身来，将双手盖在衣襟的补丁上，仿佛要用这双干枯的手遮住贫寒，抵挡将军的目光。

……

这天晚上，韩先楚回到县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要通兰州军区的电话，传达了他的命令：立即往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四天后，将军得到回声：五万件军大衣已经发出。当然，乡亲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一个雪后放晴的上午，韩先楚悄悄离开了红安，当车子路过新集镇时，吴家嘴的乡亲们早已闻讯守候在路旁，将军走下车子，乡亲们围拢来了，密密麻麻一大片灼热的目光。

“韩司令，乡亲们让我说两句，你事忙，难得回家一趟，却为我们费这大的神，乡亲们过意不去呵！我们感谢解放军、感激你的好心……”吴海洲老人说着说着啜泣起来。

这仅是五万件旧军大衣，况且还在运输途中，况且还要在五十五万人中分配……多么好的乡亲呵，为了他们我应该回来！一阵苦闷刺痛了韩先楚，他突然忐忑不安起来，心在撕扯，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这个上将司令员知道自己需要吞服一片硝酸甘油了，但当着众乡亲的面，吞药片太不象样了。他应该永远是健康的，是强壮的，因为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出于良心的义务还没有尽！他忍住疼痛，鼻子出着粗气，闷声闷气地说：

“乡亲们，不要谢我，哪个都不要谢，一件旧军大衣算得个么事？你们早就有权得到它——包括比它更好的衣、食、住。早在你们刚知道红军的时候你们就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小的儿子，都奉献给革命。早在那时候，你们就有权得到它……然而，你们到现在……现在还没得到它，我愧对父老乡亲！……”

韩先楚哽咽了。将军的责任感同老苏区人民的责任感，在泪水中溶在一起了。

及时雨

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红安代表李家宏向李先念主席报告了家乡的喜讯：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产量突破了五亿斤。

李主席问：“莫光讲粮，还有票子呢？”

李家宏汇报说："去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四元。"

"可怜啊！有粮吃了，可还买不起收音机，看不上电视。"李主席的目光向与会者扫了一周，缓缓地说："一个人下田干了一天，晚上回屋，把肚皮填得鼓鼓的，然后喘一口气，就侧着身子倒在床上。这种生活不变，哪个鬼才想去种田！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提高粮食产量——因为土地有限，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扩大了！"

当李家宏带着国家主席的忧虑回到红安时，县委已提出了向五亿五千万斤粮食突进的目标。

李主席的告诫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县农科所算了一笔帐：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每增产一斤粮食，就要倒贴两角壹分钱，五千万斤就要赔上一千零五十万元！

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财政局纷纷算起了帐，这些数字综合在一起，使县委震惊了。

当全县农业产值每年以百分之五点八的幅度递增时，林牧业总产值却以百分之五点五的幅度递减，一加一减得出了一千二百万元的负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滥伐滥垦，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每年有近百万方沃土被冲走，河床增高，几条主要河流已经淤塞，被迫封航……

这是怎么回事？三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搞粮，却搞了个山穷水尽！

县委的疑问也是将军们的疑问。北京军区罗应怀副政委在对家乡作了调查分析后，和县委的同志交换了认识，他认为：红安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这在革命战争中是个优势，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则是个劣势。而毁林开荒，破坏生态平衡，人为地扩大了劣势。老苏区人民觉悟高，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本来是个优势，但是，那些"左"的东西在这里也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就使红安成为"左"的重灾区，优势又变成了劣势。

罗应怀将军认为，这是红安的悲剧，县委应该下决心结束这个悲剧。

红安就象它境内的倒水河，平时缓缓地流着，而一场大雨过后，它便会陡然改变了平静，十分壮观地奔腾起来。

红安需要一场及时雨。

民声就是天声。在北京，李先念、韩先楚、陈再道、秦基伟、程子华、陈锡联、罗应怀等同志，分别向中央汇报了家乡红安的情况，提出了建议。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里面的每一条、每一款，都是红安县委的同志们所盼望的。有了这场及时雨，红安的山山水水将会注入多少勃勃生气啊！

月是故乡明

一九八四十月一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军乐齐奏，礼炮轰鸣，铁阵如云……

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车驰过来了，一位虎气生生的将军驱车上前："军委主席，阅兵部队准备完毕请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多么威严的虎将，多么熟悉的乡音！拔山盖世，豪气纵横！

虎将，虎气，虎威，这是今天的秦司令。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十六年前吧——

在武汉，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家里，秦基伟发开的牢骚："狗娘养的，受这份窝囊气，还不如回家种田！"

一阵沉默。

"行！"张体学省长顿了顿，"你坐我的车去。"

"莫惹麻烦呃。我是死老虎了，长途车站打张票就行了

……”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当时身为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在几次断然拒绝支持“左派”之后，被“打倒在地了”，被打发到江西某农场劳动改造，途经武汉时，突然动念想回红安看看。

开往七里坪的班车载着将军、颠簸着钻进了群山的怀抱。秋风送爽，乌斛叶红似火，景致仿佛同五十年前的一样，一点没变。秦基伟记得，这山上有一个“红军洞”，洞里天然形成的石笋，就象一把把直立在地上的尖刀。当年，红军掉队伤员总是拼着命往洞里爬，只要一进洞子，不论白匪封锁得多严，乡亲们总会从某个秘密通道摸进洞里，带来水、粮和草药……班车在山路上晃动着，象一个筛子，把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地筛了出来。

盐店河到了，将军赤足涉过河，便象当年那样把鞋垫到屁股底下，坐在一块小石头上喘息，眺望着在山凹里半露半藏的秦罗庄。秦基伟在想：也许，这戎马一生的句号就要打在这里了，一块山田，一把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老死！

凭着门前的那棵老檀树，将军认出了自己的家门，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铜锁。他不抱任何希望，把手伸进门框后一根原木的凹槽里。啊，钥匙仍然放在这儿！他高兴得几乎喊起来，五十年前他在家时，钥匙就是藏在这个地方的。

将军环顾着久别的家。这里一切都和以前差不多，灶台、家具、水缸都放在老地方。在正面墙上的镜框里，陈列着许多亲人的相片，其中，秦基伟穿将军服的相片十分醒目。

“我回来了……”寂静中，门响了一下，走进一个年轻人：“你找准咯？”

将军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嗫嚅道：“我是秦基伟……”“哎呀！您是秦司令啊！您回来咋不打声招呼？”小伙子跑出去

了，不一会，队干部赶来了，老哥老嫂子们赶来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乡亲们都来了，秦罗庄喧闹起来。

晚饭摆开了，有蒸肉糕、烩鱼卷、炒地菜干，还有绿豆粑、泥鳅汤，都是将军喜欢吃的家乡菜。秦基伟和乡亲们一起喝了两罐子米酒，吃了好多美味的豆粑卷，变得对世界上一切都十分满意了。

这时，门外有人唤起将军的小名："秦伢子回来了?"一位老妈妈拄着拐杖进了屋。秦基伟连忙扶她坐下，问候道："刘太婆，您老好啊!"老妈妈喊道，"告诉我，我的柱子还在队伍上吗?""您说什么?!"秦基伟惊诧了。他记得，柱子牺牲在长征路上了。队干部连忙拉了秦基伟一把，低声说："柱子牺牲后，她就疯了。""秦伢子，我的柱子还跟你在队伍上吗?"太婆追问道。"太婆，"秦基伟贴在她的耳边回答道，"您的柱子还跟我在一个队伍上。"

"替我照看他，他肠肚不好，莫让他沾生瓜枣。"老妈妈叮嘱道。

秦基伟赶紧转过脸去，强忍着泪水。

他推开窗扇，背对众人伫立着。窗外，松林低啸，一阵微凉的秋风吹来，使人精神一振，在朦胧的月光下，秦基伟猛地看到屋后松林边有个背枪的民兵!

队干部连忙解释道："秦司令，您这次回来没带保卫，眼下乡里也搞'战斗队'、'造反队'的，我们要对首长的安全负责!"

秦基伟不由感慨起来，他已是无须保卫，也不必看守的"死老虎"了。然而，在这里，他依然是个将军……

夜深了，乡亲们散光了。一位大婶将一个金黄的大柿子塞给秦基伟。他捧着柿子送走了大婶。就在这秋夜的宁静中，将军忽然听到了在记忆中十分久远但又十分耳熟的声音：叮铃，

叮铃……

秦基伟循声走近一棵老檀树，树上吊着的一对铁环正在风中叮铃作响。将军猛地扑到树下，抓住铁环，紧紧贴在自己身上，在那远逝的岁月里，这对铁环曾吊着将军的摇篮，母亲的催眠曲，大别山的风，轻轻摇晃着婴儿……秦基伟坐在树下的条石上，这铁环还在叮铃作响，它要告诉将军什么呢？莫非母亲对儿子有什么嘱咐吗……

秦基伟是秦罗庄出去当红军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当年带走的一百多弟兄，都相继倒在异乡的土地上，只有他活着，只有他当上了司令，成了将军。“这是一百个战士换来的将军！”秦罗庄乡亲们一直以他为全村的骄傲。

在故乡这宁静的秋夜里，在老檀树下，秦基伟将军一直坐到三更天，那铁环声、那秋虫鸣叫声，伴着将军苦苦地咀嚼着过去的往事……

翌日晨，秦基伟突然决定要走了，他的侄子秦钜昌送他上路。

他们来到山坡上，红军将士的墓碑在这里排列着，整齐得跟阅兵方队一样。将军在墓群间走着，突然在杂草丛中，他看到了一株望魂花——叶片上寒露欲滴，花瓣殷红殷红。这鲜血滋润的望魂花哟。秦基伟弯下腰，伸手去触摸花朵，将军滚烫的泪，落在花瓣上，和那露珠溶在一起……

秦基伟直起腰来，深深地呼吸着乳汁般的雾气，好象要把大地的安宁、山花的芳香、山风的清爽，都吸进胸间。

忽然秦基伟对侄子说：“钜昌，你喜欢山谷里的回声吗？”

“喜欢。”

说罢，秦基伟向前跨出两步，昂起头颅，象一只吟风的猛虎：

“啊！啊霍！啊霍！”山谷中撞击着将军雄浑的呐喊，一声

接一声，如山崩，如海啸，此起彼伏，久久激荡。

秦基伟感到自己的心在颤动。他离开故乡，但没有去江西，他上了北京，找到徐向前元帅，见面第一句话："我人还在，心不死，我还要干……"

国家主席的感慨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上午，在县城通往高桥的公路上，奔驰着一辆面包车。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陪同人员在车座上摇晃着。他们天南地北地闲说着。谈稻谷的收成，谈荒山造林，谈花生会不会歉收。李先念嘴上议论这些事情，心里却象几只猫在乱抓一样难受——他对家乡的生活曾经有过多少美好的设想啊！然而，今天……

车到占店镇，李主席下了车，他坚持步行回老家李家大屋。他走的是一条田间小道，这条小道叫李王氏小道，它的名字来源于李先念母亲的名字。当年，母亲踏着这条小道给在山上打游击的儿子送饭，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乡亲们说，没有一个人能象她一样在这小道上走这么多的路。

李先念默默地走着，看着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小道，找寻着母亲的足迹。

儿子在母亲的小道上走着。就是在这条路上，五十多年前，他常常天不亮匆匆去赶部队，晚上悄悄回家……一声带着惊喜的呼唤、一碟飘着桂花蜜的米酒和那闪闪的泪花……这就是母亲所表示出的一切。那时母亲总是问他："累了吧，伢子？"临走时，乡亲们总是把从嘴里抠出来的谷米、盐巴装满他的粮袋。以后，他走远了，但故乡始终没有离开他，在反围剿的拼杀中，在西路军的征途上，在中原突围的血战里，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故乡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头。

这位昔日的小木匠，今天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知不觉走完了八里乡道来到村口，他放慢了脚步，往事的潮水在他的心头奔腾，而这里就是他生命之河的源头。

他走向村边的一块小田，对陪同人员说："那是我种过的田，走，过去看目的地。"

田里的中稻苗烯叶黄。一个后生正在田里除草。

李先念问道："这田怕是没晒过，也没下草木灰吧？

后生没抬头，"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不晒田，不下草木灰，把田都种板了，哪里收得上谷来？"

李先念思索着离开了田埂。李先念边走边说："这田盘得过细，一年收十担谷是轻飘飘的事。那时，我交了田租，还落得五担谷呢！"

在家门口，他停住了脚步。不一会儿，全村的人都来了。

李先念看着这些人，似乎认识，又似乎不认识。这就是五十年前，一起淘气的小伙伴们？这就是那些往山洞里给他送饭的大嫂子、小媳妇们？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他们，他最亲的亲人们，现在他们围坐他身边，还象当年打听战况一样，问个没完。

"听说安徽乡里把田分了，都搞发富了呢。"

"你们也分啊，哪个不让你们分呢？"

"你上头不发话，下头心悬着哩。"

"你把那个心宽宽地放到肚子里去，该分就分了拉倒。"

"先念，中时到我屋吃鸡去。"

"你那个鸡留给鬼吃去，六三年在你屋里喝了一碗茶，你硬是敲了我一台拖拉机，你是要捉我放血咧！"

"先念，分田这话可做数？"

"要是我扯白，你就到中南海门口去丢我的人，就说我说的话不如屁！"

“你几时再回呢?”

“你们不撤那个纪念室，我是不回屋的。你们是咒我死哟，死人才搞这个名堂！你们把心事生到发家上，把乡里搞发富了，我就引几个外国佬回来看看，你们脸上有光，我李先念也有光罗！”

李先念说着，走到屋外，兴致勃勃地和乡亲们合了个影。

他别了乡亲们，心旷神怡地走在归途上，清风送爽，一曲山歌从远处隐隐约约地飘来。

“麻窝草鞋亲手编哟，送给我哥红军穿哟……”李先念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

无情的真情人

在红安县纪委书记林惠基上任的第一天接到一个来自成都军区的电话，话筒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我是谢正荣。”

“您好，谢副司令。”林惠基答道。他马上猜到了这位成都军区副司令将要谈的内容，就在他身后的档案柜里，放着谢正荣侄子的卷宗——贪污党费二十元。

果然不出他所料，谢正荣开门见山就问到他的侄子：“请问，你们准备怎样处理谢XX?”林惠基以提问的方式回答了对方的问题：“我们给他严重警告，首长有什么意见吗?”

“有意见!”谢正荣大声说。

林惠基没有吭声。于是，话筒里又传出谢正荣严厉的声音：“应该开除他的党籍!”

林惠基震惊了。他讷讷道：“首长，他毕竟只搞了二十块钱，开除党籍太重了……”

“重？在战争年代搞这种名堂，老子就要杀他的头！为了二十块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人。”

放下电话，这位县纪委书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将军的告诫使他意识到：今天他们捍卫的，不仅是当代，而且还有老一代的事业。

在红安人的生活中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摆在良心的天平上称一称。如果谁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党和红军的利益，他的父母会诅咒他，妻子会忘记他，儿女会改名换姓，这样的人在红安人心中是没有地位的。

这就是红安的骨气，这就是红安的乡风。从谢正荣将军口中，林惠基感受到了这种凛然正气，感受到了无情中的真情。

这一年，县纪委在林惠基的带领下，查处了一百零六起违纪案件，使全县的党风有了初步的好转。

他与故乡同在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年近八旬的董必武副主席偕夫人回到红安。

大病初愈的董老，踏上故乡的土地，就活了起来，看亲、访友、作客、谈天，大碗的米酒，放声的说笑，在这里，他不是国家领导人，只是一个归来的游子，人们和他称兄道弟，叙旧忆往。直到深更半夜，在秘书和夫人何莲芝的再三催促下，董老才回到卧室入睡。

凌晨，何莲芝一觉醒来，发现董老不在屋内。她找到平台上，看见董老正伫立在这里，对远方的群山沉思。董老心潮起伏。他在倾听着，倾听着大自然那赤子般纯洁心灵的搏动。

时间在前进。东方，山岗起伏的脊峰上泛出一片玫瑰色，山谷的上空飘荡着轻薄、透明的晨雾。突然，董老以极其低微的声音告诉何莲芝：

“儿时，不晓得为什么事我总觉得，喏，在那儿，在山顶上

有一个仙境，在这仙境上有个奇妙的湾子，在那地方，人快活得象神仙。”

回到屋里，董老对何莲芝讲着自己的童年时代，讲着那时候的一切和今天的不同。那时候，河和塘都深些，鱼也大些，味道也美些。山上的蘑菇采都采不完！而树林也密些！可如今呢？那时候，山高一些，河要宽一些，霜露呀，大水呀，还有沟沟渠渠坑坑洼洼，常年不消。如今呢？一转眼就干掉了……“还有那些秧鸡。从前，它们一叫就是一整夜。可如今呢？就象要咽气似的……”

孩子的楚是最甜的，孩子的想象是最美的，孩子眼中的世界是最神奇的。它是一股欢快的清泉，它是一束温暖的光线，它是一座神奇的宫殿，它珍藏在我们敬爱的董老心中。孩子的故乡，永远是纯洁无假的。

翌日，一辆轿车载着董老前往天台山。他要去看看童年的“仙境”。

细雨蒙蒙的山路上，汽车转了一个弯开始爬坡了。

“停一停！”董老对司机说：“在这儿停一停。”他下了车，往回走去，迎上了一位挎着竹蓝子、弯腰曲背的老婆婆。他搀扶着她，说了几句话，就把她请上了车。

车内，董老与老妈妈拉开了家常。

“太婆，请问高寿啊？”

“八十挂零了。”

“您老有福啊！是去看儿了，还是看孙子啊？”

“看幺儿子。”

“老幺有多大了？”

“要是活到今日，也该有四十了……”

“是红军烈士？”

老妈妈点点头，叹道：“这几时，我日里想他夜里梦他，

想揪心了，就去给他烧烧纸，祭祭坟。”

老妈妈说着，揭开了竹蓝上的盖布，蓝子里放着鸡蛋、绿豆粑和一叠纸钱。

看着这些祭品，陪同的县干部紧张了，当场批评道：“大娘这搞不得呢！这可是封建残余啊！”

老妈妈惊慌了，她默默地盖上竹蓝子，不安地看着车内的人。

一向和蔼的董老板起了脸，严肃地说：“我看缺乏礼貌也是封建残余，这个老人不也忍了嘛！”

车内沉默了。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跳动着，老妈妈摇摇晃晃地靠在车后座上睡着了。

董老见状忙摇上了车窗，轻声叮嘱司机：“开慢一点，稳一点。”

汽车开到烈士陵园，缓缓地停下了。老妈妈该下车了。随员欲叫醒她，被董老阻止了。

董老走下车来，轻轻地关上车门，对随行人员说：“都下来晒晒太阳吧，让老妈妈睡一会儿，她太累了。”

雨过天晴，风儿吹落了树上的雨滴，就象儿子在为慈母拂去脸上的泪珠。

一位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这里守候一位历尽沧桑的老母亲。他站在山坡上，眼神忧郁疲惫，风衣的领子被风撩起，贴在脸上。

在他身后的汽车内，老妈妈睡得正香，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了甜甜的笑纹。

她象谁？她让董老想到了什么？

母亲！那个也是穿着一样的粗布褂子，也是一样干瘦的母亲。正是母亲把他董必武一下子带到了大千世界上，给他送来

了兄弟姐妹，田园村舍，飞鸟游鱼，草木鲜果；正是这些瘦小的母亲，养育出一代巨人，给他们山的巍峨，海的辽阔，雪的雅洁，风的吟哦，一切的一切都是母亲的赐予！应该热爱母亲，体恤她，报答她的恩赐。

在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筹备处，我们听到了董必武主席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床前录音。

在沉重的呼吸和喘息声中，传出了董老冥冥中的絮语："……红安……家……家乡好……"

多么深沉的爱，多么纯洁的赤子之心！

家乡好啊，家乡亲！

历史告诉人们：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两百多个将军。他们是飘飞于大千世界的一片片绿叶，但和红安这株生命之树，却永远根茎相连……

（原载《解放军文艺》，本文有删节。）

陈锡联夜袭阳明堡

陈晓东

1937年9月，陈锡联所在的部队接受了改编，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129师。刘伯承任该师师长。陈锡联任769团团长。他们东渡黄河，向晋北挺进。

在从太原到东冶的火车上，刘伯承对陈锡联说："虽然国民党提出了保卫太原的口号，但看形势，太原一定要丢掉的。阎锡山已准备向河西搬家了，大批国民党部队没怎么打就溃退下来。现在要保卫太原，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

"我们团的具体任务呢?"陈锡联问。

"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寇。我下车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动灵活，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遇到什么不测的情况，可以随时发报来。"

1937年10月中旬的一天，769团来到了代县以南苏郎口村一带，这里便是著名的滹沱河的东岸，顺河南下便是忻口。

刚住下，便有敌机在陈锡联的部队头上掠过。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离苏郎口村不远。陈锡联一打听，果然在隔河十来里外的阳明堡有敌人的一个飞机场。得知这一消息，

指战员们摩拳擦掌向陈锡联请求：

“下命令吧，干掉它！”

打，还是不打？陈锡联想起刘伯承师长临走时对他的交待，部队可以灵活作战；但又想，部队刚刚进入敌后，没有同日军作战的经验，更何况要去打飞机，一旦闪失……想到这里，陈锡联提醒自己：慎重、一定要慎重！他忘不了刘伯承多次这样讲：八路军是由红军的战斗骨干组成的，别看国民党军队多，他们几十个人，几百人，也顶不上我们一个。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陈锡联决定摸清敌情后，再下决心。

他首先拜望了驻附近的一个国民党晋绥军的团长。当他说明来意后，那团长说：“你们吃豹子胆了，日本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火炮，我们刚到这里不久就挨炸。所以我劝你们别充好汉。”陈锡联一看这小子是孬种，就转身要走，此人又说：“老弟，为兄的说句实话，如今打抗战，抗来抗去别把自己抗掉了，不如放明白点，该溜边就溜边……”

“十足的怕死鬼！”陈锡联在心里骂了一句，他愤愤地走了。

第二天，陈锡联领着几个营长察看地形，他们顺着一条山沟边走边谈，很快就来到了滹沱河边。

登高眺望，他们立时为眼前的景色所吸收：东面是峰峦叠嶂的五台山；北面古长城像是一条巨龙蜿蜒在雁门关的群山怀抱；极目而望，管涔山在岚气氤氲中飘飘渺渺……如此的大好河山，如今被日寇的铁蹄践踏。陈锡联在感慨中拿定主意：这一仗要打，而且还要打好；要打个样儿给国民党看看，要让日寇尝尝八路军的厉害。

他们在返回的路上，又恰巧碰见从机场逃出来的一个老乡，那人一听他们是八路军，就是原先的红军时，便一五一十向他们讲了机场的情况。说：“机场里共有24架飞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个机场。机场内只有小股守卫

部队……”以后，陈锡联又派人侦察，侦察的情况大体和老乡谈的一样。

抓住战机、出其不意，陈锡联决定马上下手。他把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3营，并布置1、2营打增援之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则在滹沱河东岸待命，准备随时增援3营。

入夜，滹沱河边静悄悄。

3营的战士一律轻装，棉衣脱下了，背包也摘下来了，刺刀、铁铲、手榴弹等凡是容易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绑得紧紧的。战士们顺着漆黑的山谷行进，又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边。

机场里十分沉寂，此时的敌人正酣然入梦。

战士们铰断铁丝网，一个个猫着腰，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终于看到了眼前的庞然大物，战士们又惊又喜，不知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耍威风，现在该老子来收拾你了。”话音刚落，突然，西北角有个敌军哇啦哇拉地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了一串枪声。不好！敌人哨兵发现了。顷刻间战士们一齐开火，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冲天的火光把个夜空映成了白昼。敌人从梦中惊醒，他们胡乱开枪，一些枪弹竟打在了自己的飞机上。战士们似乎打疯了，他们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那一架我包了！有的干脆往机身上爬，端起机枪猛扫，……最后，在机群中间，双方展开了白刃战，直杀得血肉横飞。此时，很不幸的是一颗子弹击中了营长赵崇德的前胸，他倒在了血泊中。战士们在“为营长报仇”的喊杀声中拼得更加勇猛，直到后来敌军的装甲车隆隆开来，他们才迅速撤出了战斗。

第二天，敌机场一片哑然，所有的飞机都死了，未燃尽的余烟还在袅袅升腾。

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大获全胜的消息不胫而走。那些见

日寇就望风而逃的国民党部队，根本不相信八路军去拿下机场，他们说：“就凭他们手中那些破烂家伙，还能打日本的飞机?”为了印证事实，国民党飞机从太原飞到了阳明堡上空侦察，发现敌机场果真一片狼藉时，才相信传出的消息是真的。

重庆的国民党报纸是出于嫉妒还是无奈，反正他们低调处理了这个消息：

南京20日电，我军在晋北突袭阳明堡敌空军侵略者的临时根据地，并炸毁敌机24架之消息，此间关系方面得知报告，业经证实云。

不过，时任忻口会战的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倒还心悦诚服，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将士对贵军表示敬意”。

秦基伟鏖战上甘岭

陈晓东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这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每当唱起这支歌，我们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志愿军战士坚守坑道，饥渴难捱，向生命极限挑战的动人一幕。《上甘岭》和这支歌融在一起，歌是《上甘岭》飞出的翅膀，是一曲淡淡的乡愁，又是英雄柔情的流淌，更是儿女们对母亲的眷恋和情殇。但谁能想到这支歌和一个人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就是指挥上甘岭战役的秦基伟。

让我们再回到昨天。在中部战线的15军指挥所里，38岁的军长秦基伟好不容易得以战争的喘息，这几天正在考虑与38军配合，将其两军的主力放在西方山，共同迎接一场恶战。哪知军情突变，敌人把主攻方向选在了五圣山以南的上甘岭。

在志愿军总部的掩蔽棚里，志愿军代司令邓华和新任副司令杨得志正在一起吃饭，机要处送来了一份电报。电报是15军

军长秦基伟和政治委员谷景生联合签发的。

……是日，敌人对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以一个排至一个营的兵力采取多路、多波方式冲击，共发射炮弹30余万发，飞机投弹5000余次……

总部首长一扫电文，他们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597.9，537.7，那不是上甘岭吗？对这两个小小的山头，敌人竟如此的花本钱，他们到底要干什么？15军的仗下一步怎么打？几个人丢下饭碗，匆匆来到了作战室。

王近山将军，他在上甘岭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时他是志愿军3兵团的代司令。这天，他在西霞洞3兵团的指挥部驻地，不停地踱步，忧心忡忡，他在等待15军军长秦基伟的到来，他也在等待上甘岭阵地上的15军到底能不能顶得住的回答。15军已经进行了7个昼夜的鏖战，那是怎样的七天七夜啊！15军的战士们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我一出一进，敌一攻一守，战斗是残酷和惨烈的，15军每天至少要打掉几个连，连军预备队都用上了。这个秦基伟还吃得消吗？傍晚时刻，秦基伟赶到了3兵团驻地。王近山一见秦基伟，他不觉愣了一下，啊，好个秦基伟，几天不见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仿佛老了十年，胡子拉碴的，憔悴得让人心疼。哎，也难怪，他的一个师快打光了，作为军长的他，能不这样吗？

王近山握住了秦基伟的手，又拍拍秦基伟的肩，说："老伙计，你瘦多了。"

"你不也一样吗？"

"你给我一个实话，能不能顶住？"

听到询问，秦基伟百感交集。他像是汇报、又像是自语："我一个师——45师搞得差不多喽，29师也拿上去一个团……"

"我问你能不能顶住？"王近山期待的目光凝视着秦基伟说："要是不行，你就下来，我叫12军顶上去！"

一听到12军，秦基伟好像被什么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他满身的血都膨胀了，禁不住吼起来："我不下，不下！我要死在上甘岭！我死也不下！"

秦基伟的冲动是有原因的。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从来不服输。再则，他很清楚，12军是王近山带出来的部队。解放战争时，王近山就是12军军长，在这之前还担任过6纵（12军前身）的司令员。谁不知道你司令员是一个"王疯子"，你的6纵是中野的"拳头"，够风光的了。秦基伟和他的部队视荣誉为生命，所以他一下子在王近山面前"炸"了。此时，他倔强地说："别看12军是你的老部队，他们打仗呱呱叫，但我15军也不是吃素的！"

"好，就等你这句话！"王近山猛地一拍桌子，又欣慰道："一言为定，15军不下来。不过，12军也要上，我把12军交给你指挥，怎么样？我再给你配些重武器，还有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

"王司令……"秦基伟回到自己的部队后就对内部作了调整。他动员所有的力量参战，连军直医院、文工团的人员也派上了前沿。甚至他的警卫员也上去了。

艰苦卓越的坑道战开始了。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后，就在两个高地布置了重兵防守，一面修筑工事，一面对驻守在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采用断绝水源，烟熏火烧，施放毒气等种种手段，妄图将战士们憋死在坑道里。尽管部队多次派人往坑道里送水，送蔬菜和粮食，但那种代价太大了，送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就丢掉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坑道里的战士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伤员得不到救治，烈士的遗体就放在坑道里发臭，硝烟、血腥、屎尿和汗臭使空气浑浊不堪，更要命的是没有水，最后不得不用尿解渴。于是，我们在电影《上甘岭》中看到了如下的镜头：

战士们渴慌了在舔牙膏，有的人在吮坑道壁上渗出的一点点水珠。

一个苹果送到了连长的手上，连长交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又将它交给了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了连长手里。连长含泪带头咬了一小口，再往下传，每个人只咬一点点，这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吃完。

一个年轻的女战士在坑道里护理重伤员，她给他们喂饭、换药、洗绷带，还背他们出洞大小便。有个伤员嘴里化脓，不能咀嚼，她就先把饭嚼烂，像母亲喂小孩一样一口一口地喂到战士嘴里。还有一个重伤员不能动弹，他的大小便排出全靠她帮忙……

秦基伟后来说："电影和教科书上反映的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那个连长叫张计法，是135团7连的。那个女战士叫王清珍，是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只有17岁。"

电影《上甘岭》中"一条大河"的歌就是这个17岁的女战士唱的，她深情委婉的歌声唱出了志愿军的豪情和一片丹心。

从激战的第一天开始，到长达43个昼夜的攻防争夺战中，敌人向上甘岭两个高地上，共投入兵力步兵为11个团又2个营计6万余人，后补充新兵约1万余人。动用大炮30余门，坦克170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掷炸弹5000余枚，最多时一昼夜发射炮弹30万余发，投炸弹500余枚。几个山头几乎削低了两米，山上的石头被炸成了一米厚的粉末，走在高地上就像踩在松软的棉花上。山上的树打光了，连草根也找不到。志愿军先后参战的有15军的45师、29师；12军的31师及34师的1个团共4万余人。使用山炮、野炮、榴弹炮共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共打退敌人营以上兵力进攻25次，营以下兵力进攻650余次，并进行数十次反击。志愿军以伤亡1.1万人的代价，共毙伤俘敌军2.5万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坦克14

辆，大炮60余门。我军恢复了全部阵地。

1953年夏，正是朝鲜金达莱花盛开的季节。秦基伟这时就要回国了，他将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

那一年的6月上旬，秦基伟到了北京。在彭老总的建议下，毛泽东接见了秦基伟。

是军委办公厅的车把秦基伟接到了中南海。

第一次见毛泽东，秦基伟既兴奋又紧张。他刚刚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就从内房出来了，他握着秦基伟的手说："啊，欢迎你呵，秦基伟同志。"

他们一起落座。毛泽东拿出香烟递一支给秦基伟，秦基伟本来烟瘾很大，但考虑在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太合适，就推说不会抽烟。毛泽东有点意外，说："噢，当军长的还不会抽烟啊！"

其实，那时候秦基伟一天没有两包烟下不来。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他的烟一支接一支，几乎昼夜不断。

毛泽东见秦基伟推辞，以为他真的不会抽烟，便自己点烟抽了起来。那香烟喷喷的烟味在屋子里萦绕，也直往秦基伟鼻孔里钻，把他心里勾得直痒痒，但话已说出去，他只好忍着不抽。

谈话中毛泽东问了秦基伟很多志愿军的情况，然后毛泽东说："你们在朝鲜作战是很苦的哟。"

秦基伟说："苦是苦一点，但大家的情绪很高，打仗都很勇敢"。

谈到对敌斗争时，毛泽东问："美国佬好对付吗?"

"刚和他们打，摸不着规律，后来交了几次手，就感到他们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他们的长处是机动快，有制空权，后勤保障及时。但他们也有3个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所以我们能打败他们。"

毛泽东笑了，说：“张牙舞爪到处要吃人的老虎被志愿军制服了，可见确实是一个纸老虎。”

“通过和美帝作战，更证实了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英明正确的。我们根据主席的思想，‘敲牛皮糖’的威力很大，把美国佬打得胆战心惊。”

毛泽东听了秦基伟的话很满意，他最后说：“你们打的是铁老虎，钢老虎，他们貌似强大，凭钢铁多、凭武器装备优良，我们是凭指挥员的智慧、凭战士的勇敢，凭正义战胜他们。”

王近山智取襄阳

陈晓东

这是一个最有性格的将军，他的名字叫王近山。以敢打恶仗而被称为“王疯子”。连毛泽东也知道了这个“王疯子”，说“这个‘王疯子’，疯得有水平呢！”

淮海战役之前，邓小平、刘伯承等中原军区的首长正在研究配合“华野”作战的问题。会议决定埋伏一支奇兵在鄂西，钳制住武汉的白崇禧集团，然后准备打襄阳。

“那么，哪个纵队留下呢？”李达参谋长问。

刘伯承司令员说，“我看，就留6纵队吧！邓小平你看呢？

“行！王近山再合适不过了，就把这块硬骨头留给他啃！”邓小平政委的口气很坚决。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两位首长的用意。谈到王近山率领的6纵，谁心里都清楚：这是一支以敢打硬仗、恶仗而著称的队伍。自从解放战争打响后，王近山指挥的6纵出陇海、战兰封、激战大杨湖、强攻上官村……关键时刻顶得住，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使敌人闻风丧胆。这一点从以后缴获的敌方档案中得到了证实，蒋介石的国防部对第6纵队是这样评价的：“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之为主力纵队。

数日后，豫东战场捷报频传，“华野”外线兵团攻克开封

后，继续发起瞧杞战役，把敌军区寿年兵团5万多人装进了口袋。蒋介石、白崇禧慌了手脚，急调大批人马北上增援，而南面汉水流域的守敌此时势单力薄。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这一战机，打响襄阳之战。

当王近山接到作战命令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快把人憋死了，我可以松松筋骨了！"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与樊城隔水相望。它北通关中、洛阳，南接沙市、宜昌，西制川陕大道，东临武汉三镇，是鄂豫川陕四省的要冲，自古为兵家要地。蒋介石更把它看作是他"汉水防线"的枢纽，并以这里为中心设立了第15绥靖区，特派他的忠实信徒康泽到襄阳任15缓靖区司令，并把川军三个旅交给他指挥。

康泽，四川安岳县人。黄埔三期生，国民党中央委员，领中将军衔。此人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组织过"复兴社"、"别动队"和"三青团"等反动组织。死心踏地地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原本打算让他出任热河省政府主席，无奈战事紧迫，只好委以重要军职。

王近山指挥部队向南山高地发起进攻，正当战斗节节胜利时，敌人施放了毒气弹。为防部队伤亡过大，王近山果断下令暂缓攻山。他召集几位旅长研究对策，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襄阳城东、西南面守敌薄弱，我们何不避实就虚，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西门，变不利为有利，这就叫掏心战术。为什么就不能打破自古兵家攻打襄阳必先攻南山的老套子呢？你们看怎么样？"各旅长异口同声地答道："好，听司令员的。"

一个新的攻城计划形成了，6纵由西面担任主攻，沿琵琶山、真武山脚下的走廊直逼西门，其他几支兄弟部队有的配合6纵，有的佯攻南山。王近山的这一作战方案，很快就得到刘、邓首长的批准。

战斗打响以后，担任尖刀任务的17旅旅长李德生不负众望，前后只用15分钟就拿下了琵琶山。王近山在电话里听完了李德生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你们打得好，我要给你们请功！下一步切莫马虎，防敌后扑。""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话筒里传来了李德生坚定的回答。过了片刻，李德生又报告："49团团长苟在合同志牺牲了！"王近山拿话筒的手在颤抖，他好半天没说话，就那么呆呆地出神。然后喃喃地念道："多好的同志啊，可惜了！"他的眼眶一片湿润。后来，部队在安徽蒙城召开庆功会，在念到英烈苟在合的名字时，王近山竟泣不成声，可见苟在合在王近山心中的分量。

不久，王近山的部队以旋风般的行动将襄阳外围全部扫清，人民解放军就像一把巨大的铁钳，从东西两面紧紧夹住了襄阳，康泽已成为瓮中之鳖。

总攻的时候到了。只见两颗红色信号弹高高升起，紧接着6纵的20多门不同口径的大炮和100多挺轻机枪一齐愤怒地吼叫起来。刹那间，山摇地动，襄阳城一片火海，敌人的碉堡一个个飞上了天。在炮火的掩护下，6纵的工兵又连续进行爆破，外壕炸断了，鹿砦、铁丝网炸飞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冲锋的时刻到了！

王近山的"疯劲"又上来了。他带领两名参谋，在枪林弹雨中飞一般地穿行，他要到最前沿指挥战斗。面对子弹"嗖嗖"地响，炮弹就在身边炸，参谋不禁为他捏了把汗，说："司令员，咱还是回去吧，太危险了！"王近山说："什么？死不了的，跟我走！"就这样，他们径直来到了城下。这时54团已攻上城头，正与反扑的敌人搏斗，团长卢彦山听说司令来了，大吃一惊，急忙从城头跑下："司令员，你怎么来了，多危险哪！"王近山不以然地说："快说说城上的情况！"听完汇报，王近山指示："抓住战机，扩大战果，最重要的一条是活捉康泽，不

要让他跑了!”战士们看司令员不顾个人安危冲在了最前线，无人不受到鼓舞，整个部队气势高涨。顷刻间，敌人的城防体系土崩瓦解。

各路攻城大军，像无数支离弦的利箭，射进了襄阳的大街小巷。敌人纷纷举手投降。战士们如呼啸的狂风，又直向康泽的司令部卷去。清点俘虏时，却找不到康泽了。战士们谁都知道，这个康泽是一座微型情报库，国民党的高层机密和特务组织的重要情报全装在他那个脑子里。而且王近山司令员攻城时一再强调“不但攻下襄阳，还要活捉康泽；如果把他放跑了，打死了，那战役只算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搜，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是死是活也要人。

后来，经过做工作，康泽的随从泄露了天机：“康司令官——可能钻地道了。”

果然，康泽躲进了地道，他一见有人进来，就躺下装死。这哪能逃过战士们的眼睛，他们将康泽从死人堆里拉起来时，只见这个堂堂的中将司令一副狼狈相：他上身穿一件士兵服，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脚下也只有一只袜子，半个面颊沾满了血污……

一代枭雄，如此收场。

襄阳战役结束后，王近山的6纵得到了党中央和刘、邓等首长的高度赞扬，邓小平说：“襄阳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价值。”

刘伯承说：“襄阳战役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空投篮。”

陈毅说：“这个‘王疯子’，还是下险棋的高手嘛!”

“旋风司令”韩先楚扬威海南岛

佚 名

1949年下半年广东省各地相继解放。12月退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把败退到海南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总兵力10万余人重组、构筑成“立体防线”，企图固守海南。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争取在1950年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以第40军、第43军及炮兵，工兵一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指挥，进驻雷州半岛，准备渡海作战。

1950年4月16日黄昏，12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二万五千名将士登上了350多艘木帆船扯起风帆。

此次渡海作战，40军出动的兵力为18700人，共261艘木帆船，其中有22艘机帆船和16艘“土炮艇”。所谓机帆船，就是把拉炮的10轮大卡车的发动机卸下来，安装在渔船上，有风使帆，无风则开动机器。而“土炮艇”则是将步兵用的战防炮、高射机枪、重机枪和迫击炮安装在木帆船上。

韩先楚是这次渡海级别最高的指挥员，当时，他还兼任着第12兵团的副司令。

43军由副军长龙书金带队，共出动7000余人，乘坐帆船96

艘，其中机帆船10艘，炮艇8艘。

40军在东北令敌闻风丧胆，被称为“旋风纵队”。短短三个月的海上训练和思想教育，这只“陆上猛虎”变成了“海上蛟龙”。

夜晚10时，船队进至海峡主流，突然两声闷响，照明弹像天灯一样悬挂在空中，将海面照得雪亮。7艘敌舰袭来，韩先楚立即向炮兵主任黄宇下令：“9艘护航队立即迎战，掩护主力船队通过”。

一时间，海面炮声隆隆，弹道如织。敌舰吸取前几次海战的教训，不敢近战，见“土炮艇”纷纷扑来，吓得连忙规避。有一艘军舰企图摆脱护航队，去冲击主力船队。黄宇发现后，立即令自己的指挥船迎了上去，在100米距离用炮击中敌舰中部。敌舰中弹起火。

韩先楚率主力船队远离战区后，黄宇的护舰队横亘在敌舰队与主力船队之间，继续用步兵炮与敌舰缠斗。

天亮时，北返的大批空船行至海峡中流，黄宇的5艘“土炮艇”再次驱逐敌舰。用57毫米口径的小炮击中蒋军第3舰队司令王恩华中将，成为国民党军在海战中阵亡级别最高的将领。

3时30分，韩先楚率第40军主力船队开始在博铺港一线海岸抢滩登陆，守军拼命抵抗，用密集炮火向海上射击，许多帆船中弹起火。韩先楚的指挥船亦受重创，桅杆被炸断，帆布哗啦一声坠落到海里。此时海岸防阵地被炮火覆盖，首批偷渡上岛的第40军加强营，他们在夜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峰顶，全歼一个营，然后掉转炮口向海边敌防御阵地猛烈轰击。敌核心工事被相继摧毁，守军腹背受敌顿时军心动摇，纷纷弃阵而逃。

清晨5时，主力船队全部登陆，薛岳苦心经营的所谓“伯陵防线”被撕得七零八落。薛岳急调5个师的机动兵力疯狂反扑，双方在黄竹、美亭地区展开决战。国民党军败北，旋即全线溃逃。解放军乘胜追击。23日解放海口，30日解放榆林、三亚，5月1日解放海南全境。

圣地寻踪

千里跃进　将军故乡

——方兴未艾的红色旅游

李琅环

红安是湖北省红色旅游资源最丰富、红色旅游景点最集中、红色旅游主题特色最鲜明的一个景区。200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红安考察工作时指示，要把红安建成全省最重要的、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将红安红色旅游的主题命名为“千里跃进　将军故乡”。红安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发展红色旅游是一项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是关系老区建设的富民工程，是关系发展先进文化的文化工程，抢抓这一历史性机遇，把旅游业作为红安第三产业的突破口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抓，先后在扩大宣传、完善规划、景点建设、连点成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红色旅游线路。

景区红色旅游资源分布

红安县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境内遍布革命历史遗址遗

迹和纪念场馆。据统计，除“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外，全县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坪长胜街革命旧址群”等37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董必武旧居”、“李先念旧居”等8处，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3处。红安的红色资源无论数量还是价值在大别山地区都是数一数二的。以黄麻起义为轴线的红色景点大致沿三镇（七里坪——城关——高桥）呈线性分布。

是以县城为中心的城关镇地区。该地区革命历史的突出特点是：黄麻起义发生地、黄安战役主攻地。主要革命遗迹及红色旅游景点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黄安战役中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郭受九村、湖北第一支人民军队鄂东军的诞生地——教场岗、红安县苏维埃政府旧址、董必武故居、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等。

二是以七里坪镇为中心的七里坪地区。该地区革命历史的突出特点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和中心、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重建地和改编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一站、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组建地和国共合作谈判所在地。主要革命遗迹有：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一条街——长胜街、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中共鄂豫皖省委旧址、红二十八军军部、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抗日军政学校旧址、列宁小学旧址等37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坪“革命法庭”已被法学专家确认为全国现存最早的我党创建的基层革命法庭。

三是以庙咀湾村为中心的高桥镇地区。该地区革命历史的突出特点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组建的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李先念、刘华清等革命先辈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李先念及陈锡联等20多位将军的故乡。主要革命遗迹有：李先念故居、

陈锡联故居、陂安南县苏维埃革命旧址群等。

红安红色旅游线路的形成

红安景区红色旅游线路结合绿色旅游、人文旅游分三路：

第一路：武汉——李先念故居——董必武故居——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黄麻起义策源地七里坪——天台山风景区——河南新县或大悟县宣化店或武汉。

第二路：麻城——董必武故居——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黄麻起义策源地七里坪——天台山风景区——河南新县或武汉。

第三路：河南新县——黄麻起义策源地七里坪——天台山风景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董必武故居——李先念故居——武汉或麻城。

红安红色旅游景区的特点

红安县红色旅游景区已建和规划项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景点群体化。景区以“一心三点”为空间环境架构。以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为中心，以黄麻起义策源地七里坪、董必武故居、李先念故居为三点，实现景点群体化。作为中心景点的烈士陵园按功能划分为5个区：缅怀区、纪念区、墓园区、大地景观区、休闲活动区。每个区内的景点都不孤立地存在。步行道、纪念碑、下沉广场、飞瀑构成了缅怀区；五个纪念馆（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馆、将军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围合成中心纪念区；墓园区除原有的将军墓群外，西侧还有烈士墓、纪功坊、林地和草坪、

浩气烽火台、英雄阶、将军林、拥军坡等，丰富了大地景观区；休闲活动区则充分体现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各项内容。

第二，功能多样化。红安各景区正在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向着园林化、艺术化、立体化、个性化、产业化的方面迈进。因而，其功能也在随着进一步地发展而逐步完善。一是陵园的基本功能——埋葬逝者及其“标志物”；二是陵园的衍生功能——追思、缅怀、纪念功能；三是陵园的新派生功能——传承功能；四是陵园的现代功能——生态功能；五是陵园的“休闲功能”。

第三，环境园林化。各纪念场所除具有自身的性格特征，如运用轴线、对称、空间序列等手法，表达庄重、肃穆、素雅的纪念性气氛之外，同时又具有园林之美，通过大面积的草坪、树木、花卉、院落、廊道、亭台、小径、流水等造园要素和手法来表达亲切、宁静的情感，为前来参观浏览的人们创造休闲、冥想的环境。

第四，陈列艺术化。红色旅游景点内的各种广场、建筑、浮雕、塑像、小品等都以独特的建筑形象、空间格局为载体，传递独特的文化气息。这里艺术的陈列布局寓意着先烈们为追求理想，面对牺牲时的从容大度。这些艺术品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斗争纪念，是一首首悲怆的史诗，也是人民心中不朽的丰碑。

红安红色旅游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

红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首都”；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红二十五军的重建地、红二十八军的整编地；是董必武、李先念二位国家主席和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的故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周

恩来、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郭述申、郑位三、方毅等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光辉的足迹。

红安红色旅游资源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这里先后被中宣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基地”等。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友人来这里考察研究，被外宾称之为“山地游击战圣地”。目前有260多个省内外机关团体及大专院校、部队院校在县烈士陵园、七里坪长胜街、红安革命历史博物馆、董必武旧居、李先念旧居等地挂牌建立了“传统教育基地”。每年约有80万人次来此参观游览，接受教育。如海军工程大学已连续19年先后组织学员前来红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他们称红安是“一所没围墙的大学”。2004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直播节目“国家行动——2004送书下乡”、《经典中国》等节目和栏目对红安的红色资源和革命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并给予高度评价。

红安景区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红安为新中国的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同时，为打造红色文化精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以大别山革命斗争史为基本素材的影视剧有《风雪大别山》、《挺进中原》、《大进攻序曲》、《中原突围》、《黄麻惊雷》、《黄安战役》、《天台山情话》、《青年董必武》，电视片有《血沃中原》、《北上先锋》、《将魂》、《董必武》、《李先念》等，长篇报告文学有《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有各类传记100余部，歌曲《再见大别山》、《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安红》等100余首，戏曲《风雨情缘》等10余台。

红安这块红色的土地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的场所；是广大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课堂；是广大人民群众缅怀先烈、感受历史、陶冶情操的圣地。

巍巍丰碑耀千秋

——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黄解林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位于红安县城郊东北的稟子山，主要纪念建筑物有入园大门牌坊、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烈士祠、骨灰堂、烈士将军墓地、红安县革命博物馆、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等部分组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宣部定点的“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占地面积303亩，依山傍势、优雅雄浑。

走进绿瓦石墙的高大牌坊式门楼，径直穿过林荫大道，再举目仰望，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眼前，纪念碑座北朝南，宫殿式的塔顶为钢筋水泥结构，碑身高25.7米，在正面的汉白玉碑石上镌刻着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于1978年4月26日题写的碑名：“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身两侧还镌刻着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不同时期的题词，碑座正面塑有五星碑徽，台座正中为汉白玉塑成的花环，左右分别嵌有再现黄麻起义和苏区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浮雕，碑座前刻有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撰写的碑文。碑身两旁竖立两座大型塑像，雕塑形象逼真，气势

磅薄，左边塑的是一位身背大刀、高举铜锣的武装农民，象征黄麻起义，右边塑的是高擎钢枪、奋勇前进的英俊红军战士，象征着根据地军民坚持武装斗争。纪念碑于1977年破土动工，1979年11月13日落成。2004年维修重建。

绕过纪念碑继续径直向北前行约百米，迎面就是烈士祠。烈士祠为仿古建筑，宫殿式样，飞檐斗拱、结构繁复、错落有致，四周的正檐下立有28根圆柱，显得异常气派，给人一种宏伟与庄严肃穆的气氛。祠内设有烈士灵堂，陈列有红安县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英名录，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团体敬献的花圈、花蓝。由董老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灵碑位于正中央，烈士祠的修建，是根据董必武1956年4月14日第一次回故乡时提议而建的，并由董老题写“烈士祠”祠名，是烈士陵园内最早的建筑物。

从烈士祠后面沿台阶拾级而上至山顶，分别是骨灰堂和烈士将军墓地。骨灰堂是专门存放建国后病逝的红安籍老红军的骨灰及遗像，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牺牲的战士骨灰，骨灰堂共安放骨灰有200百多个。烈士、将军墓地在骨灰堂的后山顶上，分别有序的安葬着在战争年代牺牲的著名将领吴焕先、蔡升熙、沈泽民三位烈士。由董必武、李先念题写的墓碑碑名。在山顶上还安葬有建国后病故的老红军将领郑位三、韩先楚、秦基伟、罗厚福、夏世厚、程儒珍等。

如果说从大门牌坊至稞子山顶，由北向南是一条笔直的轴线，那么在条轴线上的烈士祠则是陵园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的两则分别建有四个大型综合和专题陈列馆。右侧是红安县革命博物馆和董必武纪念馆。

红安县革命博物馆是1958年筹建，迄今已40余年，陈列室为“U”型建筑，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馆较早的县级博物馆之一，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里面陈列着红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员的

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举行黄麻起义，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等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532件、歌颂了红安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该馆的馆名是董必武亲自命名并题写。

董必武纪念馆紧靠革命博物馆后山上，依山势而建，由中共中央批准用于专门展出董必武生平业绩的专题纪念馆，该馆于1986年3月5日开馆，建筑面积1370平方，为中国庭院式结构、古朴庄重、馆名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正门院内安放着董必武半身铜像，花岗岩基座刻有邓小平手迹“董必武纪念碑”。在基座的后面底下，安葬着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的骨灰，骨灰的墓穴是用粉红色的花岗岩砌成的，在长方形的墓座盖板上分别镌刻着“董必武”和“何莲芝”的名字，在紧靠基座的背面，是用红黑两色花岗岩石垒起的屏风墙，墙面刻着由著名书法家启功书写的、由红安县委、县政府撰文的董必武同志生平一文。整个馆有三个陈列室共十一个开间，展线全长208米，分十六个单元，通过740余件珍贵实物、照片、字画等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董必武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以及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除了陈列展览外，还专辟有董老在北京办公时复原陈列，陈列董老生前使用过后原始物品50多件。

在烈士祠的西边与革命博物馆平齐的，是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1987年动工兴建，建筑面积2460平方米，馆舍为古典庭院结构、长廊环绕、古色古香，馆名是徐向前元帅生前题写的，江泽民、李先念、李鹏分别为该馆题词，整个陈列的内容分五个单元，11个陈列室，展出的著名烈士有230名，其中军事家三名，省、军级27名、地师级78名、县团级71名，展出各种物品800余件，着重展现了在长达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中，在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创建和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精神风貌和光辉业绩。此外，还馆藏有全国著名的书画家为该馆所作的书画作品100多

件。除陈列烈士事迹外，还专辟有建国后病故的老红军事迹辅助陈列室。

李先念纪念馆座落在烈士纪念馆右上方，与烈士祠右侧的董必武纪念馆呈左右对称，是经中央批准修建的用于展出李先念生平和业绩的专门性纪念馆。1994年4月5日破土动工，占地面积5500平方米，纪念馆依山而建、设计鸟瞰成“9”字型，建筑外形为古今结合，给人们典雅庄重之感，馆名由陈云题写，陈列分序厅和四个单元展出，以500余件实物展品，展示了李先念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的精神风采和丰功伟业，在序厅的中央安放着李先念半身铜像，基座为孔雀绿大理石砌成，基座里面安放着李先念的部分骨灰。在铜像的背面屏墙上绘制有巨幅壁画《情满群山》，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分别为该馆题词。除了主体陈列外，还专设了李先念在中南海办公的复原陈列，展出了李先念生前用过的办公及生活物品40余件。

陵园除了纪念性建筑物外，东侧辟有花卉苗圃30余亩，种植多种树苗20余万株，培植花草130余种，西侧兴建有少年儿童游乐园，这里陈放着由部队捐赠的退役战斗机、坦克等，它为庄严肃穆的陵园增添了勃勃生机，让少儿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尽情地享受娱乐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建园四十余年来，充分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精神资源，坚持以陈列阵地为主、以陵园环境建设为辅，认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陵园之一。

现在年接待游客达几十万人，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都来此参观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乔石、李鹏、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等先后来此视察，敬献花蓝，

1996年9月1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园视察时说，“烈士陵园有规模、有气势、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场所，要好好利用。”这是江泽民同志对陵园的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是对陵园的社会教育作用寄予了殷切的希望。我们相信，陵园的建设规模与它独具魅力的革命资源，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将发挥它的特殊作用与贡献。

董必武故居

黄　文



董必武故居位于城关镇正南街文化馆大院内。整个故居包括院子、走廊、堂屋、卧室、灶房以及陈列室等，显得清幽、古朴、雅静、大方。在青砖院墙的圆门上方，缀有一块长方形的汉白玉，镌刻着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法委书记任建新题写的“董必武同志故居”七个金色大字。一棵枝繁叶茂的石榴树，从院墙上伸出手来，向前来瞻仰的人们致意。在窄小的院子内铺满了光溜溜的鹅卵石。据说用这种石头铺地除雨天防滑外，还有另一种作用，就是当城外有敌人来侵犯时，可立即将它挖出送到城墙上作枪弹阻击敌人。所以，在那时的黄安城内家家的院里都铺有这种石头。

跨过院门，沿着走廊，来到故居的堂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董必武母亲当年用过的纺车，董必武母亲蔡氏，勤劳贤

良，操持家务，靠纺露水棉纱赚钱。什么叫露水棉纱？据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就是当天纺的棉纱，第二天清早就挑到城里去，那些露在外边的棉纱就会沾上露水。”董必武的母亲，一生就靠这纺线织布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看着这架纺线车，使我仿佛又看到了一个勤劳贤良的母亲借着淡淡的月光，在嗡嗡地纺线。

在堂屋的右边是一间小卧室，是董必武当年出生的地方，也是1910年董必武与黄俊贞同志结婚的房间。房间内很简朴，只有一张床和两口木箱。在这间卧室，董必武的母亲生下了他们姐弟四个，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董觉生。

看完了卧室从堂室出来，靠右边是一个灶房。当时董必武家是一个近30人的大家。祖父董其元有子女九人，除长女出嫁外，其余八子均在身边。董必武是三子董基文的长子。这样一个大家庭是田无一亩，地无一升。全家生活主要靠董必武的父亲和四叔怀素教书、大伯和五叔向外借贷认息经营小商，贩卖茶叶、纸、香烛之类的生意维持。二伯早年去逝，六叔、七叔当店员，八叔未成婚早殁。那时，每天吃两顿饭，还要掺杂白菜、萝卜、红苕、野菜等，只有过节的时候，才可以吃一顿象样的干饭。每餐是由奶奶掌勺，每人一勺，当然不足充饥。

靠堂屋左边有两间陈列室，展出了董必武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革命的部分照片和文物。

现在的故居，是1977年经上级批准修复的，在陈列室内有一个故居全貌的模型。实际的故居，有前后三排。第一排是做生意的，第二排是正堂屋，专门接待外来宾客。当时，董老在这个客厅里接待了许多进步青年。第三排是自家的堂屋和妇女劳动的房间。三排房屋均相连接，形成前后两个院子，一个天井，现在修复的故居是第三排的房子，是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考证才修建成的。

李先念故居

黄　文



位于红安县占店镇西南15公里处的红马寨下，有一幢极其普通的两间土砖瓦房，房子不高，座北朝南，非常简朴，它就是前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诞生的地方，李先念故居所在地。进门的第一间为正厅，摆设有香案、方桌、椅子、纺线车等，靠右边的一间是卧室兼厨房，放置有床，储柜，还有柴灶等，李先念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诞生的。旧居在解放前为石家田的佃屋，分住陈姓、李姓两家兄弟，前后两排八间破屋，是吴姓地主专为陈、李两家种他家的佃田而做的栖身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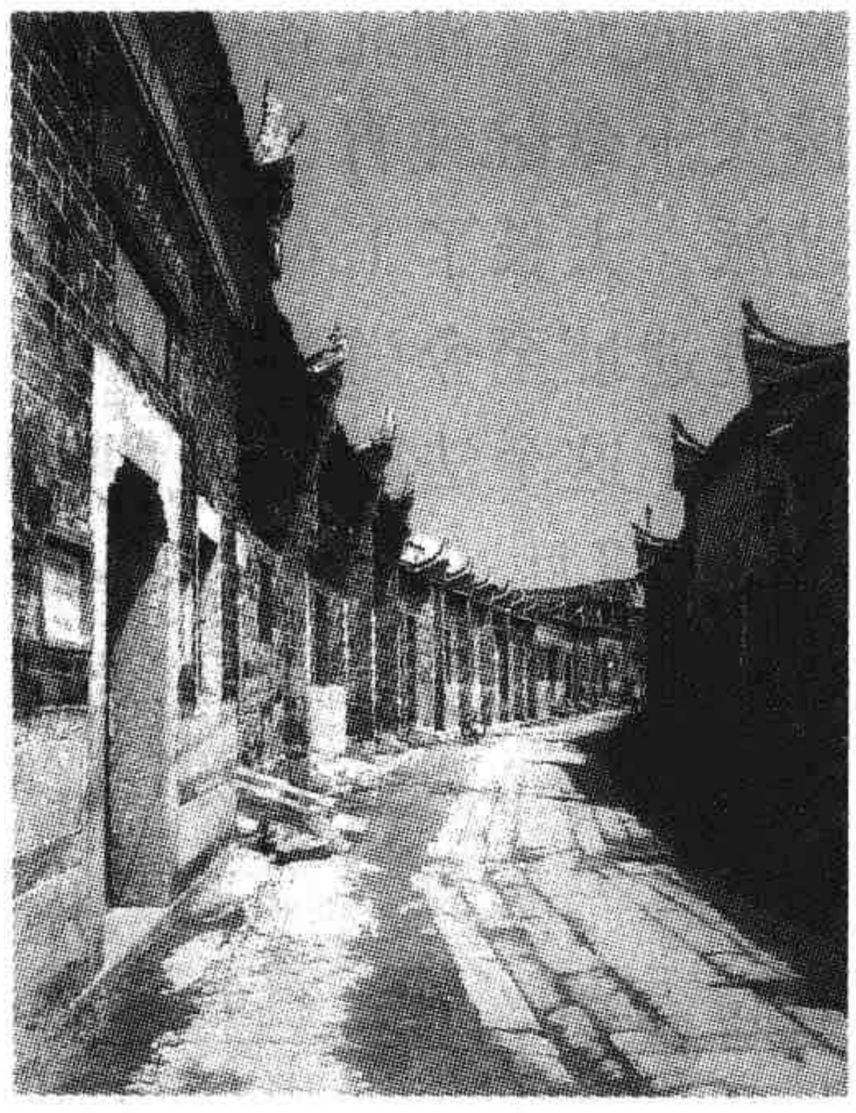
李先念的家乡李家大屋，是一个山青水秀，田园如画的地方，在故居的前面，有一座山叫红马寨，相传于太平天国战乱时是百姓躲兵避难之处。一次，山寨被敌围困将被攻破时，忽然有一红马从天而降，敌兵以为天上神兵来助战，吓得连连逃

窜，使得四邻八乡的百姓转危为安，于是这座山就被人们称为红马寨。小时候的李先念曾在山上砍过柴、放过牛，参加革命后，又在这座山上打过仗，躲过灾，至今在山顶下仍可看到有一天然岩石山洞，在极其艰苦的革命年代里为了躲避敌人，李先念曾在这个山洞居住和召集过会议。1927年的寒冬，李先念在这个洞住了三个多月，未出此山一步，经常是她的二婶和姐姐送饭给他吃。登上山顶远眺，木兰山近在眼底，好一派风景如画。想当年仿佛还看得到在黄安城遭到敌人疯狂进攻后，转移到木兰山72勇士的矫健身影，使人浮想联翩。再看李先念的故居，依山傍水，青山环绕其中，绿树常青，左边波光鳞鳞的田畈冲顺山而下，婉如一块块相连的绿宝石围系着山腰。旧居前不远处是李家大屋水库，库水碧波荡漾、水上湖心亭由花饰栏杆相连坝堤，山水秀色有亭阁，浑然一体美不胜收。因此，常有人感叹道，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在李先念旧居右旁，是高桥地区革命传统教育展览馆，在这里面陈列有李先念及高桥地区早期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其中可详细地看到，李先念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经历和贡献。这是一九七八年，由当时高桥公社所建，县革命博物馆负责陈列内容与设计制作的工作。在这个陈列室还陈列有高桥地区的主要将领陈锡联、胡奇才、詹才芳、王近山、罗应怀等，陈锡联与李先念故居仅有一冲之隔的距离。

七里坪长胜街

蔡兴忠



在革命战争年代，七里坪是“黄麻起义”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鄂豫皖苏区早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七里坪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址、遗迹资源，长胜街就是其中之一。

长胜街是七里坪的一条主街，原名正街，1930年曾命名为杨殷街，全长400米（解放后又续建了290米）南北有城门楼，花岗石条砌成。街道两边房屋清一色的青砖黑瓦、木格窗户、木板门扇，每间房屋山墙或隔火墙有龙蛇鸟兽造型装饰，街道宽约7米，地面用花岗石条铺成，由于七里坪地处鄂豫交界，长胜街上商贸十分兴隆，街道两边居民都从事工商贸易。据红安县志记载“1927年长胜街从南到北仅经营粮油的漕行就有30多家”，居民们每天把收来的粮油山货特产等，用竹排从倒河运向阳逻，销往武汉，再从武汉把当地群众

需要的工业品、生活用品运载回来，销往各地，当时人称七里坪为“小汉口”，称长胜街为“六渡桥”。土地革命时期，七里地区在郑位三、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发动和领导下，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农协会、农民自卫队纷纷成立，打土豪、惩恶霸等革命活动如火如荼。七里坪的长胜街成了革命中心，1926年在长胜街“柯义生”杂货店的店员郑行瑞为了配合农民运动，在潘氏祠堂成立了“七里坪工会”，并任工会主席，成立了工人纠察队，随后又成立了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劳动保障机构，黄安县及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劳工委员会。工农运动开展以后，为了惩治土豪恶霸，1927年4月初，在长胜街的南庙成立革命法庭，依照《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依法惩治了七里地区大土豪阮纯青、李介仁，镇压了七里坪商会会长李业阶等反动派，大长了工农协会的志气，有效打击了反革命的反动气焰，法庭遗址至今尚存。2002年5月14日董必武法学研究会与会专家参观了这个法庭后都赞叹不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第一庭。1927年7月，中共黄安县委在长胜街南门外文昌宫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拟定《中共黄安县关于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的报告》和《中共黄安县委关于武装暴动的计划》同年11月13日中共黄麻特委在文昌宫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了黄麻起义指挥部，七里坪也因此成为起义队伍的重要集结点。轰轰烈烈的黄麻暴动在七里坪掀开了序幕，成为中国革命最早武装暴动之一，载入中国革命史册。1930年党中央鉴于鄂豫皖地区革命运动不断高涨，为了指导革命顺利发展，委派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鄂豫皖苏区，在七里坪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原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平汉特区行动委员会、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经鄂豫皖特委研究决定，把革命的大本营建在七里坪命名为“列宁市”，把长胜街命名为“杨殷街”。并

在长胜街48号建设“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发行纸币壹元、伍角、贰串3种，铜币面值伍拾文1种，油布凭票（经济公社流通券）有壹串文、贰串文两种。在长胜街49号设立中西药局，为红军医院供应药品，保障了伤病员的治疗，在长胜街52—54号创办了鄂豫皖特区第一个苏维埃经济公社，为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用品。长胜街29号设立饭堂合作社，相当于招待所，持苏区政府或红军介绍信的可免费就餐，并在河街创办了鄂豫皖苏维埃小学，当时命名为“列宁小学”。

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西门外河滩上召开成立大会，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有3万多人，指挥部驻在长胜街，后来，这支部队成为中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七里坪是中国革命的著名老区，革命遗址遗迹极为丰富。1988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92年载入全国历史名镇史册，而长胜街又是革命文物最为集中的一条街。解放初，由于建设需要，南北城门楼已拆除，街道石条已撬走，居民建房有的改变原样，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长胜街的文物保护，并成立了“七里坪文物管理所”，加强了文物保护，特别是2002年红安县委、县政府决定对长胜街进行重点修复，同年3月，县政府决定投资100万元修复南北城门楼，恢复石条路面，扩宽下水道，修复街道立面，规范管线，充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的复原陈列及辅助展览等。

长胜街既是革命文物一条街，又是传统教育、旅游观光好景点，每年前来旅游观点接受教育达数万多人，同时也是革命题材、影视剧拍摄的好场所，近几年在长胜街上先后拍摄了《五更寒》、《大别山上红旗飘》、《黄麻惊雷》、《大进攻序曲》等10多部影视剧目。

中国最早的革命法庭

钟 天

2002年5月15日七里坪迎来了一批中国法学界高层权威人士，他们是专程考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的，专家们在仔细观看复原陈列和图片展览后非常激动，认为这个法庭是中国革命早期农民基层政权现存最早的革命法庭，实乃全国第一。负责组织本次活动的全国法学会副会长孙琬踵感叹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吴家友表示：我们要把这里办成全省法院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七里坪革命法庭，诞生于1927年4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农民运动时产生的。当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我党领导下的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其斗争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因此，那些被打倒或将要被打倒的地主豪绅，勾结土匪反动民团，千方百计找机会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诽谤和咒骂刚刚成立的农民协会，暗杀和残害农民协会干部、家属。黄安北乡大土豪吴惠存竟将农民运动领导人吴焕先一家五口全都杀害。1927年3月2日，董必武召集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拟定处理省内各地发生惨案的紧急办法，派兵镇压土豪劣绅的暴乱，与此同时，董必武以省党部

的名义对黄安所发生的惨案发出“依法惩处吴惠存”的指令，派党员王鉴、吴焕先为省党部特派员前往处理，他们领导农民武装逮捕了吴惠存，将其公开审判示众，于3月17日在王锡九村就地正法，同时，董必武还根据各地农民组织纷纷指控土豪劣绅的种种罪恶，要求立即制定法律予以严惩，决定组织起草《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3月18日省委党部十八次执委会公布了这两个条例，他是农民运动高潮中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刑事法规，其主要内容是确定了土豪劣绅的定义，列举了土豪劣绅的主要罪行，规定了具体的量刑办法。在我国刑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4月24日正式成立了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紧接着，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也成立了，为了保证惩治条例的实施，成立了黄安县临时革命法庭，法庭设在今县城孔庙内，同时，七里坪革命法庭也宣告成立。

七里坪革命法庭在七里坪小和平街内，法庭原址为当地人供奉的寺庙，旧称南庙，为清代建筑，显得古朴庄重，内设审判厅、合议厅、警备室三个部分，由七里区农民协会委员会负责审判工作，首任法庭主席张南一。张南一为七里区农协会委员，七里坪柳林河村人，因常年身着蓝色长衣而谐音“南一”，他以打鼓说书为名，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发展农协组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法庭主席审理的第一案就是判决他的亲舅舅，给当地反动势力当头一击，受到百姓拥护与称快。当时七里革命法庭管辖范围包括县城以北几个区，抓捕任务由农民协会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完成，由革命法庭进行公开审理，依照《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作出判决，对于罪大恶极需要处决的土豪劣绅，要报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核准后方可执行。5月13日，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在县城校场岗举行公审大会，判处李介仁、阮纯青、李仕显等四个土豪劣绅和两个

土匪地痞，到会群众六万多人，县审判委员会公布六名罪犯的罪状后，宣布执行枪决。至6月底，全县经过审判惩处了反动派、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等罪大恶极者40多人，有力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空前高涨。

七里坪革命法庭在开展审判斗争的同时，又配合党组织通过农民协会，领导全县农民逐步有组织地向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开展全面的经济清算斗争。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推翻了乡村中土豪劣绅的统治地位和他们的组织，使乡村政权全归农协所有，而且没收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剥削财产，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给土豪劣绅予以沉重的打击。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悍然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肆屠杀，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失败了。1928年3月，首任法庭主席张南一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凌迟处死，英勇牺牲，七里坪革命法庭也因此停止活动。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诞生，黄安战役首战告捷，为了纪念这次伟大胜利，将黄安县更名为红安县，成立了中共红安中心县和中心县苏维埃政府，红安中心县下辖红安县、陂安南县、河口县、陂孝北县和红安市，各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了革命法庭，红安县革命法庭就设在七里坪原革命法庭内，法庭主席由闵丹桂担任。闵丹桂，女，生于1890年，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并参加黄麻起义，在担任法庭主席一职时又是红安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她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法官，她处事沉着、果断，不徇私情，坚持原则，凡遇重大案件都亲自办理，从不顾全个人安危，至今还留有1932年7月由她亲自签发的处决反革命罪犯的“革命法庭布告”原件，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时的法庭机构较为健全，司法程序更完善，法庭内设秘书股、审讯股、事务股、登记股等，街上到处设有检举箱，据查，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机构最全、人员最多、程序

最规范的革命法庭之一。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红安革命斗争转入极端困难时期，革命法庭也因此随军撤出七里坪镇，1933年9月，闵丹桂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立了黄安县人民政府法庭，由时任县长马友才兼任庭长，直至全国解放。

碧血丹心

血染的土地

余永第

红安是一块用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在26年的革命斗争中，红安牺牲了14万英雄儿女。这14万烈士或是战死在疆场上，或是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迄今已查清登记在册的烈士22552人，其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牺牲了9名县委书记、7名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头是我爹娘给的，命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这是敌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时，共产党员程昭续代表千千万万革命英烈所作出的回答。“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这是革命处于最艰难的关头，便衣队战士代表千千万万革命群众所发出的誓言。妇联主任程训宣受尽酷刑，至死也不出卖自己的丈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医务主任戴醒群被敌人砍断四肢，仍拒绝与担任抗日游击大队长的丈夫张体学脱离夫妻关系，从这两位巾帼英雄身上，人们看到了女性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更看到了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不移。

红安的英雄儿女，他们在战场上能纵横驰骋、洒尽热血，在敌人的刑场上能从容赴死、慷慨就义，在后方的岗位上能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

红安14万英烈，是14万部不朽的丛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在生与死的抉择上，他们作出了很好的回答，他们用自己的光辉实践，谱写了一曲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夫妻烈士王鉴、夏国仪

阙和荣

王鉴，詹店镇王兴禄村人。1920年入武汉中学读书，1921年经陈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冬参加组建中共黄安工作组。1924年，黄安青年协进会成立后，是负责人之一，后回县工作。历任黄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特派员，高桥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等职。他是黄安农民运动的先驱。1927年6月调到湘鄂西工作，因积劳成疾，1928年不幸病逝于唐王镇。

夏国仪，女，詹店镇夏家湾人。1917年与王鉴结婚，在王鉴影响下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黄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国民党黄安县第三届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黄安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常委、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是黄安妇女运动的先驱。1927年在武汉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镇压恶霸地主吴芾村

大革命时期，黄安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全县十个区二百一十个乡均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向直接压在他

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1927年3月16日，在省农运特派员王鉴率领下，捉拿并镇压了土豪劣绅吴芾村。

吴芾村是紫云区郑家边村的大土豪，长水会会首。平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拦路抢劫，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恨之入骨。1926年10月，各地的革命活动公开后，吴芾村竭力破坏革命，摧残本地农协会员，还勾引土匪军队袭扰七里、紫云两区，先将七里坪街市烧杀抢掠一空，后将吴焕先一家大小五人杀害，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群众忍无可忍，要求党部和县农协对他予以惩办。1927年3月16日，担任省农运特派员、省农协执委的王鉴亲赴紫云区调查，确认群众控诉吴芾村的罪行确凿后，会同吴焕先一起召开长水等会群众和农协会员开会。会上，王鉴问："大家敢不敢去捉拿吴芾村？"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敢！"

狡猾的吴芾村日藏夜躲，一天三易其地：一会儿住箭厂河，一会儿住郑家边，一会儿又住别的地方。经过做工作，从吴家一长工口中探知了吴芾村的住址。

3月17日，王鉴、戴季伦、吴焕先带领革命红学直奔箭厂河，将吴家药店团团围住，王鉴以商谈公事为名进入店内，没谈几句，王鉴猛扑过去，将吴芾村紧紧抱住，喊道："大家快来打土豪！"守在门外的戴季伦、吴焕先等带着学员一拥而上，将吴芾村捆绑起来。当学员们押着吴芾村走出箭厂河时，太阳刚出来，附近各村的男女老少蜂拥而至，找吴芾村算帐。为了警告吴芾村组织的流氓团伙不得取闹，王鉴在会上宣布：捉拿吴芾村是奉县党部和县农协的命令，谁要截拦就杀谁的头。群众听了领导的讲话，抑制住自己的复仇情绪，带着余愤离开了会场。平日不可一世的吴芾村一见这阵势，吓得面色如土，瘫倒在地，任凭押解者怎样喊叫也不起来。学员们只得将其手脚

捆住，用一根长杠抬着走，行至四角槽门时，吴芾村的亲信及流氓团伙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赶来，要将吴芾村抢走。王鉴、吴焕先警告他们："捉拿吴芾村是县党部和农协命令，谁敢截拦，小心杀头！"又对受蒙蔽的群众说："吴芾村坏事做尽，难道你们没有受他的欺压吗？你们不要上当受骗！"流氓打手不敢动手，群众散去。王鉴他们押着吴芾村前呼后拥一齐向县城进发。

到了七里坪附近的王锡九村，忽又接到情报说吴芾村在七里的亲信纠集了一批流氓打手准备再次拦截。王鉴立即与戴季伦、吴焕先一道研究决定将吴芾村就地处决，以平民愤。并派人到附近村子里写出吴芾村的罪状，当众宣读后，将吴芾村就地处死。

处决了土豪劣绅，人民群众大快人心。从此，农运工作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西砦会战斗

高桥区的西砦会与黄陂毗连。这里山峦重叠，地处偏僻，素为匪患避罪之地。1927年3月，这里的农民运动在王鉴的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以陈幼海为首的土劣分子迅速组成一支三百余人的反动武装，并联络二程区大程会的仁义会和黄陂河口地区的土匪，反对和破坏农民运动。

4月30日，王鉴组织数千农友到西砦会游行示威。一些大土豪逃往黄陂，示威的群众抓住一些中小土豪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并警告他们不要与革命为敌。游行后，被抓的土豪全部释放。

5月30日，陈幼海带领三百余人的反动武装和被胁迫的近万名群众攻打高桥区农民协会。王鉴闻讯，当即召集区农民自卫队和数千农协会员前往抵御。不料人太少，抵敌不住。土劣武装攻进王兴禄村，将区农协会办公处捣毁一空，并将王鉴家的

房屋付之一炬，将区协委员王积全打伤，捉去会员三十余人。

6月10日，王鉴召集区乡农协和自卫队负责人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打击西砦会的反革命气焰。6月3日，王鉴率领区、乡自卫队和农协会员五千余人，在程挟超带领的县农民自卫军配合下，向西砦会发起进攻。仙居区自卫队亦同时南下助战，狡猾的陈幼海一面指使反动武装埋伏于桐柏集四周，并在桐柏庙的上空树起红旗，又一方面派人北上拦住仙居区自卫队，诡称战事已和平解决。王鉴率队进至桐柏集附近时，望见桐柏庙上的红旗，以为仙居区自卫队已先行到达，便放松了警戒，当大队人马进入西砦会的伏击圈后，土劣武装一齐开火，打死五人，高桥自卫队被打乱了阵脚，当即散去大半。县农民自卫军立即投入战斗。战斗十分激烈，给反动武装以很大杀伤，俘敌十余人，终因弹药不济，只得撤退。土劣武装紧追不舍打死打伤和俘去县、区农民武装八十余人，县农民武装失去长枪七支，县党部王文煜、区农协委员王积宽等被俘。反动武装复攻入高桥农协所在地一带村庄，将黄家岗、新田铺二村捣毁一空，将王鉴家所剩房屋再次烧毁。

这次战斗虽然失利，但仍给气焰嚣张的反动武装以致命打击。王鉴他们虽败而不馁，继续战斗在农民运动的前列。

大闹龙潭寺

龙潭寺是一座大寺庙，四周筑有一丈多高围墙，装有九节雷、劈山炮。庙内有数十名和尚，占有良田九百亩，雇工一百多人，和尚们终日花天酒地，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们名为和尚，实为土豪劣绅，群众愤恨至极。

1927年3月，王鉴、夏国仪到牌坊店巡视农民运动。这一天，群众听说省里来了人，都纷纷来到农民协会。有一老农问：

“王先生，龙潭寺的和尚算不算劣绅?”王鉴回答：“算，当然要算。”接着，群众一个个地控诉起来。和尚欠下的血债，更加激怒了到会的农协会员，大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穿和尚衣服的土豪!”群众一再要求，惩办龙潭寺的和尚。王鉴、夏国仪同意群众的要求，率领农协会员和群众，手执锄头、扁担向龙潭寺冲去。龙潭寺的主持见势不妙，带领和尚从西面过河逃去了。几日后，牌坊店村农协又组织农民再闹龙潭寺，擒住外号“鲤壳”的恶棍，打开庙里所有仓库，将粮食、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四乡贫苦农民。

通过这次斗争，打倒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土豪劣绅，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鼓舞了革命斗志。

破礼教，求妇女解放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劳动妇女，被压在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象一条条粗大的绳索，捆绑着妇女的手脚。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了反封建、礼教的妇女解放运动。夏国仪在高桥一带开展剪发、放足宣传活动，发动妇女同封建礼教作坚决的斗争。

那是1925年下半年的一天，夏国仪把自己的发髻散开，剪成齐刷刷的短发，解下缠脚的包布，和王鉴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在高桥区詹店街，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这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行为。人们都赶着看“稀奇”，议论纷纷，有的人赞扬这一对年轻人敢作敢为，投以敬佩的目光；有的人惊呼：“伤风败俗，天理不容!”一会儿，围观的人将街面挤得水泄不通。夏国仪趁此机会，登上土台，从容地理理头发，然后作起演讲来。她说：“女人天生一双好脚，为什么要缠得又细又尖，走路都站不稳。女人不能上学读书，不能同男人一起走路，婚

姻不能自己作主，这哪里是把女人当人看？我们妇女要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封建军阀，铲除封建礼教，自己解放自己。”她的演说道出了广大妇女的心声，启发了妇女的觉悟，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此后，在党的领导下，夏国仪奔走全县，演讲宣传，全县妇女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视死如归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黄麻两县成为敌人血洗的重点，一些党员干部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夏国仪到其汉口亲戚家隐蔽。同年冬，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知道她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就转交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直接审讯。敌人逼她交待黄安县委活动地点和名单。夏国仪临危不惧，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就是不交待敌人要的情报。黔驴技穷的敌人恼羞成怒，将她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剥光她的上衣，用铁丝穿着她的乳房游街。夏国仪强忍着钻心般的疼痛和百般的侮辱，昂首阔步，大义凛然。敌人将她带到阅马场，再次逼问。最后，敌人得到的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气急败坏的敌人将夏国仪的手脚钉在门板上，凌迟处死。

戴克敏全家满门忠烈

熊邦国

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全家两代人中，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有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唯一幸存的是他的胞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戴觉敏。戴克敏全家是红安千万革命家庭的典型代表。

戴克敏一家可谓真正的革命家庭。戴克敏的十叔戴先诚在1927年12月5日黄安城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于1928年同一天被敌人押到紫云程芳村凌迟处死；三伯父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黄安城落入敌手，也于1928年遇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在反“会剿”中被敌机炸死，装殓时已体无完尸。堂弟戴道高曾任黄安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和根据地反“会剿”斗争，1930年在麻城乘马岗作战牺牲；大弟戴道深1930年11月在攻打黄陂姚家集战斗中身负重伤，疗伤时不幸被捕，同年底在檀术岗英勇就义；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父亲戴雪舫于同年九月在新集为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八叔戴叔先亦于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堂妹戴醒群于1939年9月在夏家山被捕，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用分尸酷刑残忍杀害。

戴克敏（1905–1932），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人。从小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23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两年后升入省一师。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6月，被党派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职务，和吴光浩、曹学楷等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开辟柴山保，粉碎国民党“会剿”。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一师转战鄂豫地区。1931年至1932年，先后担任红四军直属警卫团团长、红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于河南新集被张国焘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支持革命不惜倾家荡产

为了革命得以继续，戴克敏常常作出巨大的家庭牺牲，不惜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革命以最大的支持。

首先是为革命倾尽了全家劳动力。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农民自卫军有少数战士经不起考验，思想动摇，想扔枪回家。作为自卫军负责人之一的戴克敏说，光靠嘴皮做思想工作还不够，党员要带头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自卫军，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那些不安心的战士。干部开会研究，都表示赞成。但大家考虑到戴克敏家已有好几个人做革命工作，家里总少不了男人呀，劝他以后再说，他硬是不听，回去一个晚上，开了个家庭会，第二天就把四伯、十叔和堂兄堂弟共5人带来参加自卫军。战士们见戴克敏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思想波动

好多了。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戴克敏家除了年幼的弟弟外，几乎成了妇人之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其次，为自卫军捐衣捐粮。自卫军缺吃的，戴克敏瞒着大伙，私下同父亲商量，把家里好用的东西拿去当了，买了七八担米，发动全家人把米炒熟，磨成米粉，并缝制了一百多个布袋，将米粉装进袋里，献给自卫军。而他母亲无法，跑到娘家去借粮度日，小弟弟戴新香在饥饿病魔中夭折了。1927年9月的一天，自卫军因遭光山反动民团和红枪会匪突袭，有40多名战士因转移时来不及穿上衣服，都光着臂膀，挤在山上的一座破庙里。这么多衣服，上哪儿去弄呢？买吧，自卫军穷得连个子儿也没有。戴克敏踯躅着、寻思着，把目光再次移向自己家里。主意一定，他不顾自卫军其他领导人的反对，带着几名战士，急急忙忙朝上戴家奔去。他母亲知道来意后，喊醒伯母、婶娘和嫂子们，分头清理了一番，什么长袍、长衫、短衣、夹褂，只要是男人们穿的，全部搜出来。点点数，尚差十来件，他的母亲又搜出些旧棉袄，把里面的棉絮端掉，缝一缝，变成了夹褂七拼八凑，衣服总算解决了。

再次，为革命尽心竭力提供服务。自卫军参加北界河战斗下来的两名重伤员，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养伤场所，戴克敏提出把伤员安顿到他家里。伤员来后，在外行医的八叔日夜守护在伤员跟前，为伤员洗伤口、换药；母亲丢下家中的活计，为伤员洗衣做饭，忙个不停，还把家里仅有的几只老母鸡杀给伤员吃。

黄麻二次暴动后，第七军打回黄麻老区，军部又临时迁到戴克敏家，母亲石兰英忙着为大家烧火做饭，提水泡茶。有一天，军长吴光浩拉肚子，裤子弄脏了。吴光浩把脏衣服装进脚盆，准备去洗。石兰英见了，生气地说："你病了，沾不得水的，快回房里躺下！"说着，连忙夺过脚盆，去水塘洗涮。打这

以后，她索性发动家中妯娌几人，包洗所有来开会办事的人的衣服。谁要是瞒着她拿去洗，非挨她批评不可。

在省一师学习期间，有一天戴克敏与同学赵世当和车夫周大伯一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去汉口英租界散发传单。为了掩护接应戴克敏散完传单后逃脱，周大伯把车丢了。戴克敏想：周大伯丢了车子，等于丢了饭碗，父女俩今后的生活怎能维护？再说，目前，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周大伯帮助，有辆车毕竟方便得多。对，应帮他买一辆。钱怎么办呢？自己没钱，眼下革命经费紧张，不能给组织上添麻烦。他思来想去，决定做通家人的工作，解除“摇篮亲”，将家里积攒给自己结婚用的钱拿出来，给周大伯买了一辆新车。

1929年10月6日夜里，红三十一师驻扎在离上戴家村不过十多里的烟宝地。戴克敏和徐向前正在研究破敌对策，忽然，师部通信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戴克敏的妻子生了个千金，家里来人要他回去看看。徐向前也催他快回去看看。戴克敏在高兴之余，仍然想着如何破敌，他谢绝了徐向前的好意，对通信员说：“你去传我的话，现在没功夫，打完仗后再说！”

黄麻暴动后，鄂东军转移至木兰山一带打游击。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清乡团”等武装疯狂反扑。上戴家成为敌人“清乡”重点。戴克敏家更是重中之重。民团团长郑淮席带领一帮团丁驻在这里，烧毁了戴克敏家的房子，扬言凡戴克敏近房、远房所有成员，一律斩尽杀绝。他们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戴克敏、戴雪舫和全家人，赏金不断上升，戴克敏的人头由500块升到2000块大洋，戴雪舫也升到1000块大洋，就连觉敏、醒群、道距这些小孩子也上了布告，赏金少则二、三十块，多则一百块。戴雪舫提前打发家里的男人外出隐蔽，母亲石兰英带着觉敏、道矩在舅舅染房的夹墙里躲着，白天黑夜不能出来，成天提心吊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一次，11岁的觉敏和5

岁的道矩跑到外面玩，被“清乡团”发觉而遭追捕，姐弟俩吓得钻进一位农民家中的半截阁楼，偎在稻草里躲了两天两夜，直到母亲找来为止。

“大家努力革命到底”

戴克敏不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也不论个人受到怎样的冤屈、诬陷，对党的信念、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黄安，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与省委也失去了联系，一大批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还有一批同志被敌人逼得走投无路，离开县境，也有极少数党员经受不住考验，成为可耻的叛徒。县委只剩下郑位三等两三个委员，还要东躲西藏。戴克敏在愤恨的同时，很快冷静下来分析当时的形势，提出一手抓组织，一手抓武装，重组黄安县委。他和郑位三秘密串连，很快将分散于县中、县北十几个村子里的20多名党员找到一块，举行了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党的会议，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明解释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了重组中共黄安县委的决定，并推举了县委书记和十名委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决定对坚持黄安革命斗争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28年秋，木兰山周围敌情严重，第七军又不能在此久驻。戴克敏和吴光浩商定召开党务委员会扩大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上，有个别同志流露出悲观情绪，极力主张解散部队，分头隐蔽。戴克敏、吴光浩坚决反对。戴克敏火气更大，拍着桌子对那人说：“你要怕死就别干了，砍脑袋，我也不同意解散部队！”那位同志也不示弱，冲着戴克敏直骂：“你狠么！我是提出来讨论嘛！”“这件事没有讨论的余地！谁再提解散部队，别怪我戴人不认人！”戴克敏边说边摸盒子枪。经过反

复研究，最后决定：部队暂时离开木兰山，到黄冈、罗田打游击。

1930年，正当徐向前、戴克敏带领红一军出击平汉路南段，三战三捷三扩编之际，8月上旬的一天，军部下达一道命令，免去了戴克敏红一师政治委员职务，留任该师一团政治委员。命令来得突然，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在红一师，论资格，他的确算老，并一直处在最高领导层，论战功，正如战士们所说，他打仗带头冲，又会用兵，论年龄，这时才25岁，还年轻得很。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也弄不明白，心里纳闷，一个劲地抽着旱烟。“报告！”戴克敏走进师部，向徐副军长行礼，立正讲道：“新来的师政委李荣桂同志不知在哪里，我想把手续交给他。”不一会，李荣桂政委来了，戴克敏起身行礼，随后拿记事本，将师部直属单位和各团有多少支部、多少党员、哪些党员在何时何地立过何功、以及由他收存的文件，向新来的这位师政委交待得一清二楚。一团团长王树声，过去是戴克敏的部下，这时他俩成了搭档，总是放不开手脚，团里的大事小事都请戴克敏作主。有天下午，师政治部要一团马上选派5名班排长到随营干部学校学习，戴克敏去地方联系工作未回。王树声派人去找，非要等戴政委回来作主。戴克敏知道情况后，有意不赶回，还把派去找他的两位同志也留下来。王树声见实在不能再等，便挑选了5名干部，随师政治部的那位同志一块走了。夜里10点多钟，戴克敏回到团部，王树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末了说：“我看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就定了”。戴克敏也把自己有意不回说出来，接着说：“我就看出来了，自从我到一团后，你办事总有顾虑。是的，我过去是你的上级，但现在不是呀！从今天起，我们约法三章，作战共同商量，其他的事，该你管的，你作主，该我管的，我不在，你当家，彼此一样，行吗？”王树声见话已挑明，连连点头说：“行，行！”从此以后，他们合作共

事，都感到愉快。戴克敏就是这样，不在乎职务的升降，只要是革命，叫干什么都行。

1932年7月初，张国焘诬陷戴克敏通敌，将其逮捕入狱。当他在牢狱里关押了三天四夜，才渐渐意识到张国焘要置他于死地。他感到来日无多，对看守吴大说：“我走后，请告诉我父亲，我是清白的，是革命的，希望他和全家不要为我难过，大家努力革命到底!”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话语。五天后，戴克敏在新集西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被杀害。

戴醒群视死如归

熊邦国

戴醒群，女，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人。幼年读私塾，后辍学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9年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进入鄂豫皖红军总医院工作。曾任总医院看护班长、看护长、医务主任等职。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被国民党顽固派残忍杀害。

组织儿童团

戴醒群小的时候，家庭景况还算好，生活自给自足，略有些节余。她本人也聪明机灵，深得全家人的喜爱。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送到了当地一个私塾学堂念书。十五岁那年，党在她的家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她辍学回乡，组织学生和当地的青少年，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配合农民协会，破除封建迷信，组织青年学生到处捣庙宇，打菩萨，捉土豪，分田地。大革命失败后，她随父亲“跑反”，离开了家乡。

红色女医官

1929年，被迫在外隐蔽的戴醒群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院

任看护。1930年，从地方转入红军部队，被分配到鄂豫皖红军总医院工作。在总医院，她勤奋好学，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每到一地，都注意收集医务书籍，认真阅读，反复钻研。因此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在较短的时间里，便成为小有名气的“女医官”。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西进川陕，留下了大批伤病员，作为医官的戴醒群被留下照顾伤病员。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和医院的同志们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医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使这些伤病员得以重返部队，参加到红二十五军的战斗行列。有段时间，医院没吃的，戴醒群饿着肚子为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几次晕倒在手术台上。

1934年，红二十五军离开苏区时，设在天台山地区的红军总医院里还收容了200多名伤病员，为了他们的安全，戴醒群又主动留下，继续坚持后方医院工作。那时，总医院不仅缺少医伤治病的药品器材及生活用品，而且没有供伤员休养的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有病房，没有固定地点，医务人员都是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伤病员在山上到处打游击。作为医务主任和当时医院里医术高明的医官，戴醒群的工作任务更重更忙，有时女扮男装，住在群众家里，为伤病员治疗，有时装作到地里干活，从这山头到那山头，为伤病员换药送吃的。

为了克服医疗用品匮乏的困难，戴醒群想出了许多办法。自己动手，用山上的竹子削制镊子，用洋伞骨子制作探针。有时弄不到棉花敷料，就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撕下来，清洗消毒代用，或把破被单拿到山沟洗一洗，放在脸盆里煮一煮，用来作敷料。绷带也是用旧被单、旧衣服代替。治疗外伤的药品极少，硼酸、灰锰氧一类的药品很难弄到。她带领看护攀悬崖，爬峭壁，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药，用中草药为伤员消炎治伤。

一有机会，她就把留在医院工作的青年集中起来，讲授有关医务学、药物学、绷带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教他们战场救护和简易外科操作。

戴醒群十分爱护伤病员，把伤病员看作亲人。有一次战斗结束后，有一百多名伤员被送到后方医院，戴醒群见状，立即把医务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救治护理，她负责给一些重伤员做手术，那时，能做手术的医官很少，她一天要给十几个人手术，顾不得吃饭、睡觉，实在疲劳了，就地躺一躺，或用凉水冲冲头，又坚持继续做。红军战士张经发在一次战斗中，大腿骨被打断，弹头卡在骨头里，伤口化脓，经常病得死去活来，戴醒群得知，连夜翻山越岭，赶十多里山路，在简陋的条件下，细心地给张经发做手术，取出了碎骨和弹头。建国后，张经发每谈及此事，总是感激地说，我这条腿，要不是戴医生救治，恐怕早就完了，我也活不到现在。

戴醒群不但认真给伤员治病，而且千方百计照顾他们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敌人实行严密封锁，医院没有办法同山下的群众和便衣队联系，粮食匮乏，她就组织大家挖野菜、采树叶、摘野果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省下来煮粥分给伤员吃。在后方医院转移的时候，不管多么困难，多么紧急，她总是亲自参加担架队，抬着重伤员转移，想尽一切办法不丢下一个伤员。有时伤病员心情不好，脾气大，有时还骂人，甚至打人。戴醒群总是体谅他们，劝慰他们，精心给他们治疗。对一些重伤员，她亲自喂药、喂饭，还同看护一起拆洗绷带，给伤病员倒屎倒尿。

戴醒群就是这样以她高度的责任心，娴熟的医疗技术和周到细致、任劳任怨的医德医风克服重重困难，给伤病员以温暖和希望，使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康复，重返前线。

坚贞不出　　视死如归

1937年3月，在一次战斗中，国民党军搜山清剿，戴醒群不幸负伤被俘，被关进河南经扶（今新县）监狱。在狱中，她鼓励难友们坚定政治立场，采取各种办法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七七”事变后，经党营救戴醒群被释放，旋即被分配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方医院任医务主任。1938年底，她和当时任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队长的张体学结婚。1939年1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简称“五大队”），她奉调到五大队任医务主任。

1939年9月1日，国民党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率两个团配合鄂东土顽程汝怀的第十八游击纵队及黄冈、麻城县自卫队，在夏家山、芦泗坳、龙王山、回龙山等地围攻“五大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夏家山事件”。“五大队”坚决抵抗后，分路突围，戴醒群在突围中不幸被捕。

戴醒群被捕以后，敌人知道她是张体学的妻子，对她严加看守。程汝怀令就地审讯，要她发表与张体学脱离关系的声明。戴醒群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并冲着审问的保安团长痛斥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不打日冠，专门残害抗日的新四军，你们良心何在？你们还是中国人吗？”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加酷刑。他们用尽了各种刑罚，但戴醒群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极端残忍的敌人对戴醒群采用了最野蛮、最无耻的分尸酷刑。他们把戴醒群绑在大崎山贾庙的一棵大树上，当着所有被俘人员的面，先用小刀子一刀一刀地割掉她的两个乳房，然后用大刀把她的四脚剁掉，最后割下了她的首级。其情景惨不忍睹，连在场的保安团人员都闭上眼睛，不愿目睹杀人魔王的暴行。戴醒群英勇牺牲时，年仅22岁。

张行静大智大勇

孟晓慧

张行静，出生于七里坪镇张必贵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参加革命，同年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担任县农协执行委员，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随后在天津、湖南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经河口返乡参加武装斗争时被捕入狱，英勇牺牲。狱中留有铿锵遗诗："人生一世万千差，继承光荣革命家，死不投降当叛逆，愿随先烈葬黄花"。

《共产党宣言》传黄安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由陈望道将日文版翻译为中文，1920年9月由上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印刷发行。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种马列经典著作。黄安青年党员张行静从董必武那里获得这本宝贵文献，并将它带回了黄安，传递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这本《共产党宣言》历经沧桑，见证了中国革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壮志豪情，书的主人革命意志坚定，临死不屈。该书被国家文物专家确定为一级革命文物，红安博物馆

将其作为革命文物的镇馆之宝。许多地方前来复制展出，以教育后代。

张行静1923年进入董必武、陈谭秋创办的武汉中学读书。该校是湖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活动的重要基地。由于他聪明好学，如饥似渴的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一天，他从董必武那里获得一本《共产党宣言》，如获至宝，立即盖上自己的印章。从此他手不释卷，阅读起来总是废寝忘食。他带着浓厚的兴趣，精心研读了一遍又一遍，书中留有很多他阅读时做的圈圈点点的着重记号，他还边研读边思考，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

在马列主义的熏陶和董必武的教育与培养下，张行静在入校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信徒，成为学生中党的主要活动分子之一。1926年张行静从武汉中学毕业，带着《共产党宣言》，带着董老期望，带着理想回到了家乡。

教书办学闹革命

1925年张行静回乡后，在黄安第二国民小学任教。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七里区杨山、柳林、福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他首先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他自编教材，组织农民学习，用深入浅出的道理，讲解《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农民革命的基本内容，在教育人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时，他举例说："中国象块肥肉，帝国主义总想瓜分，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马列主义犹如春风吹进了闭塞的山村。

为了使农民进一步的觉醒，张行静搜集了当地豪绅地主欺压农民的典型材料，编写、导演了两台"文明戏"，以形象、具体、生动的事例，揭露反动统治的狰狞面目，倾诉劳动人民的

痛苦。这种形式对于宣传发动农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6年冬，在张行静的宣传和领导下，河汉乡建立了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1927年春，张行静调动到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参加了黄安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不久，升任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他率领农民自卫军执行多次重要任务，一是捉拿了黄安县议会会长李介仁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二是赴县北杨山、周七家、阮家店一带抗击河南光山南下的反动“红枪会”匪，三是参加抗击西寨会反动武装斗争。他还作为县农协代表，参加了鄂豫边界之黄安、麻城、光山联合召开的“三县和平会议”与到会人员一道起草了以“三县共同拿办土豪劣绅”为主要内容的十一条协议，为发展当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八七会议传到黄安后，张行静负责组织河汉乡防务委员会，率领乡亲举行了武装暴动，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钢铁意志永流芳

1927年12月，国民党十二军向黄麻起义地区发起疯狂进攻，张行静被列为悬赏通缉的共产党员之一，敌人称“有人捉到张行静，一两骨头一两金；有人密报张行静，管他一生不受贫。”此时，党决定一批干部转入地下，以保存党的力量，张行静遵照上级指示，先后转移到天津、湖南等地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转移前他将《共产党宣言》交给党员张行旺保管。

1929年3月，张行静根据指示，回乡参加武装斗争，不料，经河口曾家湾时被“清乡团”逮捕，敌人将他押送黄安县城监狱。

在狱中，敌人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首先备以丰盛酒席，并许以高官厚禄，企图动摇张行静的革命意志。张行静以一身

正气，怒斥国民党罪行。一招不成，敌人又改用重刑拷打，威逼他退出共产党，写下“辟共论”，张行静犹如一尊铁骨豪不畏惧，他挺着胸，慷慨激昂地说：“老子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怕死不革命，要我退党，痴心妄想。”一遍一遍的审讯，一次又一次的酷刑，张行静丝毫没有屈服。

5月18日清晨，剑子手还要作最后一次审讯，令他在赴刑场前作最后一次回答。张行静拖着沉重的脚镣，举起紧铐的双手，振了振伤痕累累的身躯，大声说：“我回答了多次，今天仍然是：‘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但今天老子要你们也答复几条：第一，给我备上三斤酒，我要死得风光满面；第二，我要家书一封，让家中明白，张行静死得光明正大；第三，革命者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迫害他人；第四，我是革命者，死前要高呼口号，你们在场都要随之附和”。张行静的英雄气慨使在场之敌无不为之变色。

1929年5月18日正中午，黄安城东门外，张行静英勇就义，城区革命群众垂首落泪，悲痛万分。然而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在他们耳旁回荡，张行静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在他们心中永存。

晏春山舍身跳崖

樊丽玲

晏春山，女，湖北省黄陂县人，原在武汉纱厂做工。一九二七年随丈夫回到鄂豫边的光山县（今新县）潘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潘湾一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参加白沙关暴动，任光山县弦南区第四乡妇女会主席，为扩大红军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主力转移后，任村党支部书记，为了配合游击队的斗争，她经常化装成小贩，为游击队筹粮购药，搜集情报。1933年5月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后敌人逼她带路找游击队，她把敌人带到远离游击队的鸡公寨大花石岩顶高喊着口号，纵身跳下万丈悬崖。

革命堡垒里的女共产党人

一九三二年秋，红军主力先后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敌人乘机向根据地人民疯狂反扑，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情况复杂，斗争更加艰苦，这时，担任潘湾党支部副书记的晏春山按照上级的指示，一面隐蔽主力，保存实力，一面积极组织群众，配合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当时，早已参加红军的丈夫潘家年已随部队转移，家中上有八十多岁的婆母，下有三个幼下的

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但是，身为共产党人的晏春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顾不了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千方百计地为革命工作。她经常化装成卖油条、卖香烟的小贩，来往奔走于七里坪、郭家河一带，散发传单、搜集情报，帮助游击队照看伤病员和购买医药粮食。

一次，驻在郭家河的白匪军阴谋偷袭仰天窝一带的红军游击队，晏春山获得这个情报后，心急如焚，顾不上浑身的疲劳，立即翻山越岭，绕过敌人的封锁线，迅速找到了游击队，及时地组织转移，使敌人的偷袭落了空。

在白色恐怖下，游击队的给养非常困难，伤病员更是缺乏营养。为了使这些伤病员早日重返战场，晏春山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伤病员加强营养。在她的说服下，村里的屠夫杀了两头猪，并协助她悄悄地把猪肉送到山洞里的伤病员手中，当敌人查问时，屠夫拿出早就编好的假帐单当众对证，群众也配合他们认了帐。敌人没有找到点破绽，只好作罢。

血染鸡公寨，青丝诉忠魂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由于坏人的告密，晏春山不幸被捕。敌人把她押解到郭家河匪军团部进行严刑拷打和审问，逼她说出红军游击队的去向，她毫不畏惧地一字不发，敌人对她奈何不得，接着施行更加残暴的手段：灌辣椒水、上压杠、钉竹签、烙铁烙，然而，这位坚强的女性忍受着极度的痛苦，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但是，敌人并不死心，想以死来威胁她。“今天，你要是想活，就带着我们去找游击队，找到了，立刻放你，想死，很容易，就在山上用石头把你砸死！”

晏春山轻蔑地看着这群吃人的恶魔，一字一顿地说：“走，

跟我去找游击队!”她从容地站起来，强忍着身上的巨痛，把敌人带到了远离游击队的鸡公寨大花台，当她走到大花台崖顶时，转身面向群敌，怒目而视，大声说：“狗强盗，红军游击队就在这里，跟我找去吧!”接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便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

英雄牺牲不久，丈夫潘家年在收拾她的遗体时，发现了一绺被树枝挂掉的头发，便把它珍藏起来，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捐献给湖北省博物馆。

程训宣至死不渝

熊邦国

程训宣，女，红安县七里坪镇程维德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后编入红四军。1932年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

大脚姑娘

程训宣从小胆大泼辣，聪明好学，7岁就和哥哥一起上私塾读书。1925年参加童子团，在村里带头放足，是个大脚姑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村妇联主任，带领妇女剪发放足，争取婚姻自主。黄麻起义时，他在后方组织妇女参加义勇队做服务工作，做军装、运军粮，积极支援前线。

红旗下的婚礼

一天，徐向前和苏区主席曹学楷策马来到檀树岗乡检查扩红工作。在红军招募处门前的稻场上，一阵悦耳的歌声传来，徐向前不禁勒马驻足倾听：“檀树岗、七里坪，扯起红旗扩红军……”原来是妇女会的同志在这里表演节目，宣传扩红。随

着锣鼓的点子，只见一位头剪短发，面容俊俏的姑娘，大胆走向稻场正中，唱起了苏区流行的革命歌曲《送郎当红军》：“送郎送到大门前，一轮明月挂蓝天，白区乡亲受摧残，小郎哥啊，你当红军上前线，莫忘翻身日子甜，消灭敌人要勇敢，才能保卫新政权……”

“这个妹子的歌唱得真好，她是谁啊！”徐向前问曹学楷。“她叫程训宣，是程维德村的妇女干部。”曹学楷接着介绍了程训宣的情况。徐向前静静地听着，思绪万千，心潮翻滚。曹学楷也看出了徐向前的心事，为了徐向前能集中精力指挥红军作战，他决定撮合这桩婚事。

一天，程训宣带领妇女会的同志给部队送来了急需的大米和军鞋，徐向前、曹学楷热情接待了她们。谈笑间曹学楷有意安排程训宣去清洗徐向前的衣服，程训宣来到徐向前的住处说：“徐主席，我们妇女会来给你们打扫卫生啦！”徐向前操着刚学会的红安口音说：“要得，你们妇女会的同志吃苦了。”程训宣想，这徐主席是一个外乡人，到我们大别山来领导红军打了那么多胜仗，真是不简单。

妇女会的同志要走了，曹学楷喊住了程训宣：“训宣，我找你有事哩！”“有么事？”程训宣问道。“徐向前是我们的军事领导人，生活却没有人照料，老哥想给你做个媒呀！”程训宣听罢低下了头，她想到徐向前英俊的身躯和在边区传播的美名，脸象秋天的枫叶一样红，转身从送来的军鞋里挑出了一双自己做的千层底青布鞋，递给了曹学楷说：“你把这双鞋送给徐主席吧！”一溜跑了。

1929年冬，一个格外晴朗的日子，程维德村热闹非凡。妇女会的同志忙里忙外，一个个兴高采烈，她们换下了程训宣平时的旧军装，穿上母亲为她准备的花棉袄，把个本来就端庄俊俏的姑娘，打扮得更加明媚俊秀楚楚动人。

徐向前举止潇洒地和曹学楷、戴克敏、倪志亮等边区军政领导人一起，来到程维德村，在曹学楷、倪志亮的主持下，徐向前与程训宣举行了简朴的结婚典礼。

血溅红土地

1931年5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在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中，发动了一场“肃反”运动，把许多忠诚于革命事业，为创建鄂豫皖苏区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红军将领和地方干部，打成“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予以逮捕、审讯以致杀害。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未能幸免。

1932年6月间，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打响了。徐向前带领部队在七里坪镇雾仙山一带阻击敌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徐向前在战斗的间隙命警卫员代他回家看看妻子，并把随身的袜子带回去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返回部队后，偷偷对徐向前说：“程主任被保卫局抓走了，正接受审查。”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相信组织，听候“审查”。

程训宣被关押后，保卫局的人员对她用尽酷刑，威逼她承认是“改组派”，要她承认徐向前也是“改组派”，可程训宣至死也没有出卖自己的丈夫。张国焘没有得到她的口供，下令将程训宣处死。行刑之前，程训宣脱下了身上的棉袄，交给同室的难友说：“这是我和向前结婚时穿过的，你留下暖暖身子吧！”

黑洼，红色土地一个黑色的地方，徐向前正在它的前方七里坪镇雾仙山指挥阻击敌人，可哪里曾想到自己身后，他心爱的妻子正走向刑场。

建国后，程训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徐向前元

帅一往情深怀念程训宣，并为当年无力保护她而抱恨终生。他在1984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用一段文字记述了自己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并说以此作为对她的悼念。接着慨叹道：“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多么重要。”

“蓝衣先生”张南一

周少怀

张南一，原名张香奎，红安县七里坪镇柳林河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时，任七里区防务会宣传股长，以鼓书艺人身份宣传革命，1927年12月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蓝衣先生”

张南一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在他幼年的时候，父亲和弟弟因贫困和疾病相继死去，只剩他母子俩相依为命。张南一自幼聪明好学，口才好，逗人喜爱，因家境贫困无钱上学，私塾老师十分同情，便让他免费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十多岁时因生活所迫只好随母乞讨度日。后来想多挣点钱便学着打鼓说书，深得七里八乡农民的喜爱。参加革命后，他经常身穿蓝色长衫，游乡串户，以鼓书艺人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蓝衣先生”。

“老子就是张南一”

大革命开始后，张南一经常以打鼓说书的形式宣传革命。

1927年12月黄安城失陷后，他奉党的指示，继续以鼓书艺人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敌十二军一个营在营长路金川的带领下，进剿“匪区”七里坪，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张南一”（张蓝衣谐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敌通缉令上。一天，他乘夜转到七里坪河西的张家湾村，在一位亲戚家中，见有10多人围在一起正议论穷人的八字和命运。张南一主动同他们拉扯起来，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并架起小鼓，唱了一段鼓词：“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叹只叹，我穷人，无吃少穿。天地间，都是人，应该平等；为什么，富与贵，贫富不均？天地间，人都是，父母所养，为什么，他该富，我该受贫？那富人，他说是，积阴功，坟山所荫，又说是，阳宅好，风水凑成。我穷人，做苦工，日夜不睡，倒转来，衣食住，不如他人，劝大家，切不要，被人蒙哄，全都是，剥削我，一般穷人……”那些怨天怨地怨“八字”的穷人们，听了他的宣传后，心底豁然开朗。当时，由于敌人在各村都安插了一些“坐探”，不久，张南一的行踪即被敌“坐探”发现了。敌营长带着大队人马到处追捕他。这一天，张南一回到家中，准备带几件替换的衣服，转移到外地活动。谁知衣服尚未收拾好，柳林河村已被敌人包围了。张南一在群众的掩护下，藏进一间房屋的夹墙里。敌营长挨家挨户搜查，没有发现张南一，于是将全村300多名群众全部集中在禾场上，狂叫道：“今天不交出张南一，你们别想活命！”人群中有人答道：“张南一早就离开家了，他孤身一个，谁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敌营长指使几名匪徒，将答话那人抓了出来，用皮鞭抽打，并继续叫嚷着：“交不交？不交就烧房子！”人们攥紧拳头，怒目横视，没有一人吭声。不一会，村头的几间房屋起火了，敌营长狞笑着说：“你们的生命和财产掌握在我的手中，限定10分钟，如果不交出张南一，我就将全村化为灰土，把你们葬在这里！”说话间，“砰砰”几声枪响，一

位老人应声躺在血泊之中。张南一听到敌人的吼声和枪声，再也忍不住了。他挺身而出，大骂敌人：“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胆敢如此放肆，欺压百姓，老子就是张南一，要捉就捉我！”全村的群众得救了，而张南一却被敌人五花大绑起来，押到了七里坪。

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

张南一被捕后关押在敌军营部，敌营长装出一副笑脸，忙叫士兵给张南一松绑，并假惺惺地说：“只要你保证以后不闹革命，我就放你；只要你自首悔改，我就赏你；如果愿为我们办事，马上就可当官。”张南一蔑视着敌人，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血可流，不革命是办不到的！”敌营长见软的一套不行，即施以重刑，一面拷打，一面审问，得到的“供词”仍然是一无所获。敌人软硬兼施，无济于事，便把张南一关进了监狱。过了几天，敌人在七里坪西门外挖了一个沙坑，用铁丝将张南一的肩胛骨和脚跟穿起来，推到坑旁。敌营长指着沙坑对张南一说：“看你还革不革命？”张南一愤怒回答：“老子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再过20年，老子还要革命！”敌人用刀割掉了他的耳朵、鼻子，并恶狠狠地狂叫门：“还革命吗？”张南一痛得昏倒在地，当他醒来时，仍喃喃地说：“老子……还……还要……革命……”敌人又割掉了他的舌头，随后将他推进坑中，活埋至死。

张南一的英勇气慨和革命精神，永远为人民所敬仰、怀念和学习。1930年，七里坪改名为列宁市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将七里坪小南门命名为“南一门”，以纪念张南一烈士。

开肠剖肚秦绍勤

周少怀

秦绍勤，亦名业基、其元，七里坪镇福德院墙村人。1925年参加革命，是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农协会主席和七里坪工会负责人，1927年12月不幸被捕，遭敌人严刑审问，他坚贞不屈，最后敌人将其剖肚挖心，壮烈就义。

立志革命打土豪

秦绍勤，幼年家境贫寒，读3年私塾后便辍学，帮助父亲租种佃田养家度日，1922年被人介绍到七里坪“益韩康”药店当学徒，饱偿土豪劣绅的剥削与压迫，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25年，在姨父张香山的引导下，接受革命道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光荣入党，立下革命志。从此后，他组织穷苦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打土豪、杀恶霸，深得穷人的拥护。1927年2月，被选为四区农民协会主席，同年8月，七里坪工会成立，秦为负责人之一，他与郑行瑞等人组织工人、店员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并从药店借钱，请匠人锻打撇把枪、大刀、长矛等，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10月的一天，在他潘氏祠主持召开工人联合会，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资产阶级”“工人们联合

起来”等口号，并在七里坪张贴革命标语，他和郑行瑞等又带领纠察队员将七里坪反动商会会长李业阶镇压。后又在福德、柳林等地组建农民赤卫队，并多方筹集资金，组织工人制造武器，为黄麻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

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1927年12月上旬，黄安县城和七里坪相继失守，敌人向起义区开始疯狂反扑和清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淫威所吓倒。秦绍勤等共产党人遵照党的指示，留在七里坪一带坚持斗争。12月中旬的一天，他不幸被捕，敌营长路金川满以为从他口中可大捞一把，便立即报告师长闻清霖。闻亲自赶来审讯。闻问：“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秦答：“老子就是要加入共产党!”闻问：“党的组织有多少人?”秦答：“只有我一个人!”闻问：“秦辉英（共产党员区防务会总务股长）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秦答：“不知道!”闻恼羞成怒，把秦绍勤的母亲、妻子抓来“陪审”，并喝令几名打手，将秦绍勤按倒在地，拳打脚踢，以死相威胁。秦绍勤从地上挣扎起来，使尽全身力气，大声斥道：“你们这般人面兽心的家伙，杀我人民，害我百姓，纵然千刀万剐，也无法平息人们心头之恨!”“我是革命者，一不怕死，二不流泪；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怕死不革命；要我投降、招供，休想!”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无怒，便露出了恶残的本性，于1927年12月19日，把秦绍勤绑赴七里坪北门外，用两寸多长的铁钉将他的手脚钉在木板上，接着用枪扫射，还残忍将其剖腹挖心。同时，将秦母、秦妻一起杀害。秦绍勤牺牲时年仅21岁。人们为纪念他，作诗赞颂道：“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人杰地灵

一条文脉贯古今

——纵谈天台山文风对红安的影响

陈良品

古老的大别山连绵数百里，横亘于中原。雄踞鄂豫之交的天台山是其一脉，以奇特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文化蕴涵而闻名于世。古往今来，这座文化名山为所在的红安增添了不少光彩，尤其对红安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文风之盛源自天台

天台山有四座峰，连亘并立，主次有序，像学子聆听师长讲课，又像兄弟亲密无间潜心研讨学问。天台山天生与文有缘。

追溯天台山文风之源，得从一些民间传说谈起。这些传说给天台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相传春秋时期道教创始人老子曾隐居此山修炼，此后逐步形成道教圣地，青龙观香火旺盛，自唐宁延续至明代。传说隋朝佛教也在此显赫一时，创立天台宗的佛教大师智来这里传教授法，誉满中原。远古如此浓厚的宗教色彩，让人强烈感觉到天台山的高深莫测。

明代，天台山风云际会，李贽、焦竑等文化名人连袂而至，耿定向、耿定理、吴心学等本地才俊横空出世，使天台山名声鹊起。

李贽（1527–1602）是福建泉州人，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一生三次到黄安（今红安），在黄安寓居四载（1581–1584），与黄安结下了不解之缘。1572年他在南京刑部任职时，结识了黄安耿氏兄弟耿定向、耿定理。1577年李贽到云南就任姚安知府，途经黄安，与耿氏兄弟相聚，竟要弃官留住。在耿氏兄弟的劝告下才在县城以东15里的五云山筑天窝书院。李贽在天窝书院除了有时给耿家子弟和附近问学的青年讲学外，潜心读书写作。在黄安4年，李贽写了《老子解》、《解老》、《读南华》等书及《焚书》、《藏书》、《说书》的部分初稿，是其创作中一段黄金时期。此间，李贽的一些朋友纷纷来此造访，这里又就了名人聚集的场所。当时海内之著名学者何心隐、罗汝芳、焦宏、周思久在这里“朝夕相处，讲习不倦”。

李贽在给耿定向的信中说过，“仆数千里之来，直为公兄弟二人耳“。能得到李贽如此敬重，足见耿氏兄弟的不凡。

进士出身的耿定向为人正直，不依附权势，敢于进谏直言，备受朝廷器重，官至户部尚书，地位显赫。他的学问也是社会公认的。李贽在《焚书卷一答周友山》中称道：“盖今之道学，亦未有胜似楚侗老（即耿定向）者”。高中状元的南京焦宏在《澹园集卷十二耿天台现状》道：“先生（指耿定向）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作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因思想观念的差异与李贽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学术争论，影响巨大而深远。“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是同代学者周柳塘对两人分歧的概括。李贽正是在论战同时，发展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没有耿定向的反对，就没有李贽的新思想。这场论战以两位名人1595年相聚天台而告终，但李贽的新思想的影响却一发而不可收。这种超越时代的先进文化深深地浸润了红安土地，孕育了红安人敢为人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造成红安近百年来名人、将军辈出等人文奇观的重要原因。耿定向晚年归

隐天台山，办天台书院，接纳四文学者，使天台山文风盛极一时。焦竑在《天台书院记》中写道：“近世理学莫盛于宋……天台先生崛起楚之黄安，推明孔颜周陆之学，与乡人肄习之，从游者履恒满户外。”

耿定理是李贽最佩服的人。耿定理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而不应科考，一生布衣。李贽寓居黄安的第四年，51岁的耿定理病逝。李贽以血泪写出《哭子庸》诗四首，痛悼亡友。诗曰：“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

本籍还有吴心学、吴心愿兄弟和僧心如等都是才学出众的名人学士，主导了黄安的读书风气，为家乡增添光彩。其时设了众多的书院，耿氏兄弟创办的天台山书院、天窝书院和吴心学创办的洞龙书院最具影响，还有仙湖书院、云台书院、桃花书院等。书院的设立，使黄安的读书求学之风日甚，形成了私塾启其蒙，书院成其学的格局。

如此众多而杰出的文化名人云集黄安，讲学论道，研究学问，尤其是李、耿的十年论战，令天下注目，小小黄安，文风盛极一时。时社会流传“文风尤盛唯有楚，楚亦在黄（安）”之说。天台山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场所，山上众多的摩崖石刻正是他们的杰作，是黄安明代辉煌文化奇观的标志。他们留下的天台山的诗文脍炙人口，尽显天台之胜，文化精品更提升了天台山的文化品位。

志存高远读书报国

读书以明志。读书人把志向放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上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清末民初，民族灾难深重，国家危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一大批黄安读书人毅然走上救国救民之路，董必武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1年，董必武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李汉俊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与复兴的伟大事业中，董必武作为党的重要领导成员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党成立之初，他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两次统一战线的形成，他是策划和实践的重要成员。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方面，董必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共和国诞生前夕，他作为中央工委常委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协助刘少奇组织土改工作团，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参与制定《中国土地大纲》，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和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49年10月1日，董必武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天安门，参加庄严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就站在毛泽东的身旁。当年两位伟人同为"一大"代表，28年后出现在这划时代的场面的"一大"代表也仅他们两位。他后来担任共和国代主席，是20世纪中国的杰出人物之一，治国功勋卓著，修身德高望重，举世公认，把一个读书人的人生演绎得如此辉煌，为养育了他的家乡山水带来了夺目的光彩。

这一历史时期，有影响的黄安学人志士还有郑位三、陈逵九、张国恩、江迪生等。郑位三（1902~1975）原名植槐，1918年投考湖北省甲种工业学院名列第三而更名"位三"。"五四"

运动期间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后来加入中共，是策划和领导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成员，后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七届、八届中央委员。陈逵九（1857~1936）中年中举，任过清廷军机章京，礼部主事等职。捐款修建“黄安会馆”，以便乡人赴京读书、殿试，后弃职返乡从事教育。利用威望营救董必武、陈九舟等入狱的中共党员，为社会广为传颂。张国恩（1880~1940）参加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被选为国民政府代表参与谈判。后同董必武同去日本考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奉孙中山之命，与董必武一起加入谋划反袁活动。1920年与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后自动脱党）。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参与组建湖北国民党组织，参与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兼教员。江迪生（1882~1916）早年就读北京政法学堂，加入同盟会，同学称之为“爱国男子”，在天津一次集会上，他刀刺手臂血书“警告同胞”痛斥清政府将川汉铁路卖给帝国主义，遭清廷通缉。武昌首义后担任革命军司令部执法工作。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奉孙中山之命，担当武汉军区军事党务负责人，准备讨袁。1916年2月指挥炮兵营起义，谋占武昌，因力量单薄失败。同年因积劳成疾，一代革命志士英年早逝。

正是以董必武为首的革命先驱们传播革命思想，点燃了家乡不息的革命火焰，造就了将军辈出的人文奇观，使“将军县”的美誉名扬天下，写下了红安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山村走出世界名家

源自县北天台山的强劲文风，熏陶着它南面的这片土地，从古代到今天，经久不息，熏出个人杰地灵，在时代发展的大

潮中尽显风流。

20世纪是红安历史上辉煌的时期，以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两百多名将军的故乡让世人注目，而叶君健、张培刚两位从红安山村走出的世界学术大师，以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同样为故乡带来夺目的光彩。

叶君健（1914~1999），著名作家、翻译家，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并获外国文学学士学位。叶君健一生笔耕不辍，用中文、英语和世界语发表过小说、散文、译作、诗歌和戏剧评论以及儿童文学作品共计1100万字左右。40年代中期问世的长篇小说《山村》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用英文创作的小说真实地描绘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小山村走向革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一经问世便被英国笔会选为1947年“最佳小说之一”，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挪威、美国、波兰、捷克、冰岛、希腊、南斯拉夫、德国、日本、印度、印尼、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版。英国著名世界语诗人威廉·拉克斯奈斯为《山村》的冰岛文版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我过去读过的几本关于中国人的书，从来没有像这一部那样描绘出有关革命特点的清晰的图画……把这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用冰岛文介绍给冰岛公众，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山村》的另两本续集完成于80年代中期，即《寂静的群山》三部曲。曾经出版过众多现代派作品的英国最大的出版社费伯出版社在没有见到书稿，甚至连书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就与叶君健签约，出版这部中国革命小说。1988年10月，叶君健夫妇应邀出席了英国举行的首发式，英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掀起了“叶君健热”，英国评论家称他为“革命史诗型的小说家”。

作为世界著名的翻译家、语言家，叶君健通晓英、世、西、意、法、丹麦、日、葡、瑞典、挪威等多种外语，能用三种语言（汉语、世界语、英语）进行文学创作。他翻译了大量的世

界著名作品中，极大丰富和充实了我国的译作林苑，提供了许多优秀读物。他的译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丹麦人安徒生用了40年时间创作了168篇童话，叶君健也用40年时间翻译、编辑、整理、注释、评析这些童话。因为他的中译本所达到的极高的文学水平，因此，它被称为是“当今世界上的两个最好的译本”（另一本为英国珍·赫叔尔译）。它深深地打动和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叶君健因为安徒生童话翻译的贡献，在1988年荣获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

年长叶君健一岁的张培刚出生地是八里湾镇东边村陈家田，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以最优成绩被选送到北平，在陶孟和先生主持的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1940年，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选拔考试在重庆和昆明两地举行，张培刚以昆明考区第一名考取了文科工商管理。1941年9月，张培刚进入以“案例教学法”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此时，哈佛经济系名家云集，在这些大师的指导下，精通英、法、德三门外语的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经济学名家的著作，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1945年，32岁的张培刚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这篇名作中，他第一次探讨了农业与工业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这篇名作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发展途径、动力和战略的先河之作，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石。这部蜚声国际的不朽之作，让世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该论文荣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这是东方人第一次获此殊荣。1949年，《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上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该书译为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版又在美国再版。南美、

北美、西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大学都把它列为基本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

怀着报国富民的理想，张培刚于1945年8月回国，在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此后，这位本该处于经济学科最前沿的世界级大师历尽坎坷，沉寂了30多年。当西方的学者采用他的理论而登上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时，他却受冲击下放在咸宁的乡下劳动。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哺育了他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重视。直到1978年，他的名字及著作才被重新提及。1978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邀，与则行、宋承先等学者合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稍后与厉以宁教授合作，撰写和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3年，他修订了《农业与工业化》中文译稿并交付出版。这部殚精竭虑的惊世之作，历经40年沧桑得与同胞相见。1989年6月到12月，《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先后发表了他的《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和《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两文，给失衡的发展经济学加上了一个有份量的砝码。1992年，凝聚了张培刚为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智慧的《新发展经济学》面世。该书突破了以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局限，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位世界级大师赢得了世人的仰目，哺育了大师的故乡山水自然也令人肃然起敬。两位大师亦是家乡学子的楷模。看今朝，红安英才辈出，高考榜上风光不让，每年数千计的学子走进高校；社会大舞台大显身手，一大批红安人在各界担当重任。新的辉煌在续写，优秀的传统在传承、在发扬光大。

武脉传承 雄才辈出

杨　柳

九焰山位于天台山东南。它巍峨雄壮，群峰环抱，共有大小山峰九座。山上林木茂盛，杂草丛生，丹崖怪石，削壁奇峰。清晨或黄昏，登高远眺，九焰山诸峰层林尽染，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金光奕奕，紫气升腾。有人说，九焰山与天台山相辅相成，就象中国古代八卦图中的乾坤二卦。《易经》中说："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自鸿蒙初开以来，九焰山每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气。钟灵毓秀，天台山孕育出旷世文才，视为文脉；九焰山则衍生出擎天武将，被视作武脉。千百年来，风云变幻，尘埃荡涤，武脉博动，红安大地雄才辈出。

关山形胜　兵家必夺

红安东接皖西，西趋江汉，北出豫南，南迫武汉，关山形胜，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来，谁能占据此地，就可以"北控天中，东引吴会"。

相传，大唐王朝高宗皇帝驾崩之后，皇后武则天废除中宗，篡夺王位，李姓亲王被杀，忠良之臣被斩，民生涂炭，怨声载

道。灭武兴唐，众望所归。忠良薛家后代薛刚为重整大唐乾坤，来到九焰山占山为王，招兵买马。九焰山九山环抱，地域宽阔，地形险要，利于屯兵。几年过去，薛刚召集到山寨附近人马数十万。后来，唐中宗被逼，也随程咬金上了九焰山。武则天派白守云、白文豹父子统兵攻打，久攻不下。白守云、白文豹父子思忖攻不了九焰山将被处死，又被薛刚忠义感化，就带领大军归降于薛刚。九焰山不仅没有攻下，反而更加兵强将勇。武则天大发雷霆，下旨武三思亲率大兵征讨，也被打得大败。后来，薛刚兵发潼关，将武则天赶下了皇位。中宗重新登极坐殿，废除武氏大周纪元，重复大唐年号。“薛刚反唐”这段历史在民间广为传颂，评书艺人还广为传讲，人民群众百听不厌。而作为薛刚赖以屯兵蓄势的九焰山，也赋予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为了剪除异己，“北控关中”，挥师进入九焰山以南广大地区。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一举打败陈友谅、张士诚等“劲敌”，确立了北伐元军，统一全国的优势。

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率领义军六次进入黄安。清朝末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从1853年至1858年，转战黄安达6年之久。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对蒋介石实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首先考虑到的是占据大别山地区有利地势。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统率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它犹如在敌人心脏上插上一把尖刀，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冲武汉。这一战略行动，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10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进入红安七里坪，并分别夜宿于周八家、潘家岗。是夜，当地民众举头北望，九焰山一带红光映天。

推富益贫　屡起义兵

饱受压迫的黄安农民一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黄安农民的自发斗争从未间断。

宋端平年间，七里坪附近一位姓黄的农民揭竿起义。起义军在九焰山安营扎寨，占山为王。他们打击地方官僚地主，劫富济贫，影响和势力一度扩大到淮南的大片地区。

元朝末年，七里坪附近农民在铁匠出身的邹普胜和冯瑄领导下起义，组成“红巾军”，并提出了“推富益贫”的口号。这是继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又一次明确表明“均贫富”思想的农民起义，说明黄安农民反对财富不均的思想行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清朝顺治元年至八年（1644—1651），黄安全县农民起义达5次之多，最著名的是夏嗣伯组织的“朋人会”，据光绪八年重修的《黄安县志》记载，起义军“横戈过市，影响很大”。

1914年全县大旱，灾荒严重，农民向地主买粮，地主趁机将粮价抬高3倍，从中牟取暴利。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起来同地主斗争。仙居区杨家冲村的农民在杨世达和杨世运的带领下，冲进大地主杨云山的家中，先将杨云山捆起来，然后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同年夏季，紫云区笪儿会的农民罗福太、熊润生秘密组织哥老会，提出了“打富济贫”口号。

1919年夏，紫云区灾荒严重，地主有粮不买，农民饥饿难忍，纷纷拿起锄头、扁担冲进大地主方敬义和方书舟家里，逼着他们各拿出40担谷给百姓度荒。

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的反抗精神激励了全县人民，为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反帝反封　中流砥柱

二十世纪初，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封建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黄安大批仁人志士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成为反帝反封浪潮的中流砥柱。

革命先驱　董必武青年时代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为了表达革命决心，改名“必武”，董必武是最早深刻认识到走十月革命道路、用武装夺取政权、拯斯民于水火深刻道理的革命志士之一。

秀才出身的董必武深知武装斗争是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他的革命经历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次重大武装斗争密不可分。他的思想认识和革命工作也教育和影响着一大批黄安志士，并使他们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经过董必武的启迪，黄安的戴季伦、曹学楷、郑位三、江子英、陈定侯等一批进步学生，纷纷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到家乡，号召民众觉醒。在引导黄安青年知识分子上进和唤醒人民起来革命的历程中，董必武起了极为重要的先导作用。

辛亥老前辈　潘怡如（1881—1942）又名潘康时，二程人。1904年，潘怡如在新军第二十一混战协四十一标当兵。1960年任新兵总教官、下士团教官。他将新军军歌中的“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臣，无异舜与尧”等句改为“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启发士兵觉悟。

1908年，潘怡如在新军中组织了群治学社，借讲学为名宣传反清思想。到1910年，社员发展到1000多人，为辛亥首义创

造了条件。1911年武昌起义后，潘怡如召集旧部200余人组成“奋勇军”，活动于长轩岭、河口一带，打击清军。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

潘怡如坚持革命40余年。1937年，他鼎力协助中共知名人士陶铸主办汤池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并讲授军事课程。1943年3月19日《新华日报》以“辛亥革命老前辈潘怡如先生病逝”为题报道其生平事迹。董必武吟《哭潘怡如》七律四首，赞颂他“姜桂性成弥老辣，云霞交契愈轻柔”。

割臂血书　江迪生（1882—1916年），又名元吉，永河江家洼人。1911年春，正当保路运动高涨之时，他在天津的群众大会上，用利刃割开左臂，血书“敬告同胞”四个大字，然后慷慨陈词，发表了反对清政府将铁路修筑权卖给帝国主义的生动演讲。“二次革命”时，江迪生又在南京黄兴所领导的反袁军总司令部工作，参与组织讨袁。1914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奉孙中山之命回汉口，在英租界建立秘密机关。1916年2月，他到炮兵营指挥起义。起义失败后，江迪生病逝于逃亡途中。

首义“楚才”　阮复（1883—1918），又名阮楚才，八里三房垸人。1904年，阮复参加武昌新军，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当面赐名为“楚才”。不久，张之洞以官费送他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阮复以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的身份，在湖北新军和武汉社会各界中广泛活动，作辛亥革命前的组织发动工作。1911年10月10日晚，他同蔡济民等率领新军二十九标士兵起义，与其它各路起义大军配合，一举攻克了总督衙门，占领了武昌城。

阮复一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1917年，广州护法军成立时，阮复出任内政部秘书。护法运动失败后，他率众回湖北召集旧部组织革命武装。不幸在途中被捕，1918年春，阮复在武昌英勇就义。广州大元帅府为阮复举行了降重的追悼会，

孙中山、廖仲恺等都献了花圈。

救民救国　立马横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迎来了曙光。黄安人民的反抗斗争也由自发形式转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运动。1927年11月13日，我党领导的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生的农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胜利成功，为后来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数十万黄安农民积极投身入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之中。四海翻腾，风雷激荡，一大批农民出身的黄安人，在救民救国的历史进程中，成长为纵横驰聘、横刀立马的将军。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中，曾经每3个红军战士就有一个红安人；每4名英烈中，就有1名属红安籍。

从这里走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23位将军。“将军县”的美名誉满神州。

不下马的将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西征。不久西路军失败。李先念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指挥。他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天雪地中行军20天，随后又穿过“死亡地带”的戈壁，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祁连山47个日日夜夜的征程，九死一生的经历，是李先念一生中最悲壮的一页。对李先念在西路军的功绩和他英勇无畏的精神，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将军不下马”。

李先念战功卓著，他指挥的中原突围战役尤为世人传颂和称道。

解放战争前夕，为了麻痹敌人，李先念在中原突围中命令

张体学一个旅留在司令部驻地和往常一样出操、练兵、种菜、帮老百姓干活。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中原军区的部队，原地未动。但狡猾的敌人是有警惕的，为了摸清中原军区的真实情况，美方代表白罗素上校突然打电话给中原军区司令部：要见见李司令。李先念接到报告，火速赶了回来，按规定时间接见了美、蒋代表。当晚，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李先念又设宴款待了美、蒋代表和中外记者。饭毕，李先念又“暗渡陈仓”星夜赶赴前线，发出了总攻命令。当美方代表白罗素上校得知中原主力部队已从西面平汉线全部突围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李先念“中原突围”意义十分重大，史家公认它“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小山头上打大仗　秦基伟，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秦基伟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大战上甘岭，成为抗美援朝的经典之作。上甘岭战役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是“朝鲜战场上的淮海战役”。《韩国战争史》一书中把上甘岭战役称为“摊牌计划”，并承认“中共十五军防御意志坚忍不拔”。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共军全部消灭”。“联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也回忆说：“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战役是失败的”。

百战将军　王建安，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从参加黄麻起义到跨过鸭绿江指挥作战，王建安一路斩关夺隘，戎马倥偬。打完抗日战争，他就被称为“百战将军”了。1948年8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王建安，点将他协助许世友统兵攻打济南。只用了八天八夜，山东兵团就象秋风扫叶一样，一举攻克了蒋介石要其爱将王耀武“只能确保，不能放弃”的济南。

作为济南战役主要指挥员之一的王建安，多年保存着缴获王耀武的那把包白金的左轮手枪。王建安去世后，这支枪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陈钢炮　陈锡联，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段革命家、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锡联被称为敌人闻风丧胆的“陈钢炮”。那是1937年10月19日，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的陈锡联率团夜袭日寇阳明堡飞机场，炸毁全部24架敌机。此役惊破敌胆，“陈钢炮”蜚声中外。其实那时陈锡联的炮兵还很有限。解放战争时期，陈锡联和同是红安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刘昌毅共同指挥打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炮战”。1948年，郑州战役后，陈锡联和刘昌毅率三纵攻打人称“南徐州”的宿县。11月15日17时，战斗打响。30分钟的猛烈炮火，打得城墙、城门砖石横飞，天摇地动，守军阵地顿成一片火海。至23日时，各攻城部队在城中胜利会师。从此“陈钢炮”的名声更响了。

1950年10月，陈锡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7年兼任炮兵学院院长。陈锡联为我军的炮兵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旋风司令　韩先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韩先楚以骁勇善战而享誉全军。他所指挥的部队，在东北解放战场上因勇猛神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被称为“旋风部队”，他本人被称为“旋风司令”。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创造了帆船打兵舰，跨海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奇迹。抗美援朝期间，韩先楚先后任中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曾指挥3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他坐镇指挥的三十八军，被彭德怀司令誉为“万岁军”。

武将文官　王诚汉，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功勋

卓著的一代名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升上将。他是目前红安唯一健在的上将将军。

1985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任命王诚汉为军事科学院政委兼党委书记。自1986年至1996年，王诚汉军事科研硕果累累，仅完成学术专著、编著、译著、法规、条令条例就多达250本。他在总结自己的戎马生涯时说："我这一辈子是既当好武将，又要当好文官啊！"

王诚汉在《红旗》、《人民日报》、《军事学术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认清战争与和平形势，从根本上加强国防建设》、《对改革军队干部教育训练的思考》、《发扬学术民主，繁荣军事科学》等文章，在军事科技界享有盛誉。

后勤部长　周纯全，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杰出的高级将级。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周纯全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放手发动群众，大力组织生产，筹集物资支援部队，出色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周纯全任志愿军后勤部政委，他直接抓兵站运输建设，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红军战略轻骑　郭天民，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战功卓著的高级将军和军事教育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郭天民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长征途中任红九军团参谋长。在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和乌江天险后，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牵制迷惑敌人。郭天民率部单独活动两个多月，转战数千里，出色完成了牵制任务，被周恩来称为"红军战略轻骑"。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王近山、胡奇才、徐深吉、詹才芳、刘昌毅、刘飞、张仁初、李天焕、徐斌洲、张天云等10位红安人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无一不是驰骋疆场、战

功卓著的开国将领。

卫国维和　大展雄风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数万名红安籍青年应征入伍，戍边卫国。其中吴晓恒（女）、黄俊峰、胡先贵、江建曾、罗毅、秦卫江、李平、刘晓琨等人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国新一代将军。

海上蛟龙　胡先贵，199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3月初，震惊海峡两岸的解放军三军联合演习在本土近海展开。海军舰艇劈波斩浪，如出水蛟龙。三军联合演习前线副总指挥、海军总指挥胡先贵挺立船头，昂首海天。长江后浪推前浪，红安新一代将军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飒爽风姿。

蓝天雄鹰　江建曾，红安烈士的后代。1996年3月，解放军三军联合演习空军基地。一架架战舰整齐排列，昂首待命。一声警报，一位身着飞行服的中年军人率众快步跑来，迅速跨入飞机座舱。顷刻间机群呼啸，直冲云霄。把中国空军的凌云壮志书写在蓝天上的前线空军总指挥，就是红安新一代将军江建曾。

巾帼英雄　吴晓恒，女。公元1988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授衔仪式在这里举行。1000多名高级军官的肩头上扛上了金色的肩章。全军“五朵金花”，其中一朵便是红安人。吴晓恒，这位新时代的女将军，为红安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史坛巨子冯天瑜

尼　吟

冯天瑜于1942年3月生，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冯天瑜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在日本讲学三年，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目前他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冯天瑜是一个在学问上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人。他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今天在学术上的建树。现在冯教授主持的中国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重心，相继承担国家、国家教育部和省级重点项目、国际资助重大科研课题、企业委托课题等45项。自1996年以来，研究中心已正式出版学术著作58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28篇，其中国内刊物319篇，国外刊物9篇，并成功地举办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有较大反响。

他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日益增多。美国斯坦福大学墨子刻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教授、日本爱媛大学藤田胜久教授、韩国明智大学郑哲雄教授、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林安梧教授等先后来“中心”做访问研究。“中心”还接受来自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及多名国外高级访问学者。可以说，“中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的重要学术基地。

地理名胜

天台山揽胜

吴光德

在巍巍大别山南麓，滔滔倒水河西岸，有一突起的巨峰，她四周峭壁如削，峰顶似台，势若接天，这就是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钟灵毓秀的天台山。

天台山是一座神奇的山。有人说它是东周时期的道教神坛，有人说它是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明万历年间，户部尚书红安人耿定向辞官后，住上了天台山，建起了“天台书院”，写下了《黄安初乘》（红安古称黄安）、《耿子庸言》、《天台文集》等许多著作，号称“天台先生”。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曾几次来到天台山，纵行山水间，流连忘返，留下了题为《宿天台顶》的诗：“缥缈高台起暮秋，壮心无奈忽同游。水从霄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明月三更谁共醉，朔风初动不堪留。朝来云雨千峰闭，恍惚仙人在上头。”

天台山更是一座英雄的山。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瑰丽的华章。早在大革命时期，天台山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黄麻起义”组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这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徐向前、吴焕先、李先念、陈少敏、张体学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坚守在这里的游击健儿，

为接应刘邓大军南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天台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天台山有名，还在于她秀丽的风光，宜人的气候引来了大批旅游观光客。每当春天来临，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红的似火，粉的如霞，山谷幽兰，清香扑鼻。盛夏之时，前来避暑度假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炎炎的暑热中饱受煎熬的人，上山小憩几天，真是令人惬意。从红安县城驱车二十来公里，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只需三十来分钟就到了天台山脚下。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约摸二十分钟，就可到达天台山主峰下，极目四顾，一山峰如一座巨大的平台耸立在跟前，据说这山峰名伯台，海拔817米。附近还有三个较低的山峰，逐一名为仲台、叔台、小台。

伯台下西南岗下，原有一石如香几，右有一石如鼎炉，名“告天炉”。由告天炉登山，沿途石阶蜿蜒而上，绿树浓荫，凉意袭人，不一会儿到了离垢门。门左有石如座。名为“坐忘台”，又名“鸣琴处”，坐忘台右侧，有一石罅，有石隐隐如龙状，故名“卧龙洞”。洞前有泉，水从池内窃出，池水清澈见底，传说取此水归而洒之，可致雨，故此池名为“作霖池”。作霖池右，小径上横一巨石，其下有穴，由石穴俯身伏地而入，大约三米而出。再行四米，就会看见一石如盘，上可坐七八人。明隆庆三年（1569年），南京焦弱候曾率六个弟子观赏天台山奇景，坐此石上，并题绝句一首：“尽将双足压崔巍，下视青天万里开；飞腾莫讶不知险，曾踏羊肠百折来。”因此此石名为“七子台”。七子台右两米许有一窟，名为“探奇窟”。站在窟前，只见两旁峭壁如削，陡然直立，面临深谷，不见谷底，俯视山下，满目苍翠，心旌不禁为之荡漾。

伯台东偏南的仲、叔两台，联裾并立。通往两台的石阶旁边有石屹立如门状，名“了心关”。此处地势险要。四周峭壁挺

立，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杂草丛生，只有一条路可通往两台，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心关右边，有一巨岩向西面立，岩壁光滑灰黑，名“留月岩”。传说夜登此岩，无月常如有月；若当夜月之时，光辉普照，南北山峰，皆披月光，俯视群峰，晶莹透澈。“天台夜月”，便指此。可惜大白天，看不到如此奇景。留月岩顶稍左有一巨石，上覆如盖，前有古松数株，故名“抚松岩”。出了心关往左，有一石壁朝东，名“宾阳壁”，每当红日升空，远近山林，尽收眼底。宾阳壁左边的小台，山上怪石林立，古松苍劲，上与天齐，有“披云峰”之称。

在通往伯台顶的石阶两旁，有方条石堆砌成的栏杆，年长月久，布满青苔。沿石阶而上，可见两块巨石，其间纵裂一缝，仅尺许，人侧身才能前行，故名“一线天”。上得台顶，有一小庙，庙后不远处有一奇石，约两三米长，一米宽，与台顶隔开数尺许，缝深不见底，从此处往山下看，只见峰石壁立，不见谷底，不禁头晕目眩，难怪此石名叫“试心石”。从台顶放眼望去，海阔天空，远近树木，层层叠叠，郁密浓厚，不见边际，胸襟不禁开阔起来。

天台山下不仅景色秀美，而且物华天宝，由于这里长年云遮雾罩，是盛产名茶的理想之地，所产“天台翠峰”茶，乃茶中珍品，畅销海内外，天台山也是一座神奇的自然博物馆，有银杏树，还有灵芝、何首乌、安桔、天麻等名贵中药材，盛产猕猴桃、乌桕、山楂、板栗、珍珠菜等山珍特产，还有野猪、金钱豹、红毛狗等珍稀动物，以及云母石、石英石等矿藏。

难怪有人说，若要到红安，必上天台山，不上天台山，不算到红安。

初探九焰山

胡晨钟　陈红建

九焰山与天台山毗邻，位于天台山东面2公里处。史料记载，唐代薛刚反唐曾驻扎兵马于此。《湖北通志》载：“南宋端平、嘉熙年间，淮西兵扰，士人结寨于此，常活十万人，元末兵乱，有黄、杨聚众据此，曰黄杨寨，另有一说‘以寨多黄杨木，故名’”。也就是说，在宋代，九焰山上曾具有现在红安县城的规模，十万民众生活于此，可以想像当年这里是如何的热闹与繁华。民间传说李老君途经此地，在山顶一跺脚踏平山顶飞腾去见玉皇大帝，故而出现约6平方公里的山顶。薛刚反唐，招买人马靠的是一面神奇的大锣，铜锣平放可睡三人，战时只要铜锣一响，便有数千兵士迎战，攻城者一闻锣声无不魂飞魄散，因而山寨久攻不下，最后差人盗走铜锣，用火攻九次才攻下，故名“九焰山”。这面神奇的具有灵性的铜锣在清代末期还有人见过，而今踪影难觅。多年后，漫生的树木、杂草荒芜了上山的路，九焰山也因山势陡峭而人迹罕至。

5月23日，我们凌晨四时起床，邀约熟悉此地的县中药材公司经理詹学群同志一起，驱车直抵天台山脚下的刘家宜村，刘家宜村的小组长叶希斌放下手头农活，腰佩锋利的砍刀，慨然

充当我们的向导，领我们由九焰山西面开始登山。

初次踏入九焰山，只见陡峭的山岭被茂密的树木藤枝所遮掩。叶希斌带头钻入林中，我们捉迷藏般亦趋。山中草木葳蕤，色彩缤纷，草帽在这时倒成了累赘，我们便顺手丢在路边的树枝上。然后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登来到了黄杨寨的第一个城门—西门。至此，已花了近半个小时。人又闷又累，浑身几乎被汗水湿透。西城门高约2米，宽1米，城墙全用块石砌成，望台望孔保存完整。

进西门往东南方向200米处有一巨石，五米多高，岩上“司马岩”三字苍劲古朴尚可辨认，其余小字因岩石风化辨认不清，我们用作路标的粉笔依样勾描，勉强可辨认出是明代一批将领来山寨剿匪，为了纪念他们的战功而刻上官衔和姓名，官衔最大的是兵部尚书。岩上文字皆为繁体，巨石面向西南，已被树木掩映。

沿山脊向东行，地势稍稍舒缓，此时阳光透过树枝影影绰绰地泻下，叫不出名的鸟雀开始在林中追逐、嬉戏，深山鸟鸣更增添了一份岑寂。间或一只硕大的山鸡扑腾而起，又引起我们一阵惊叹。此地平缓的山势使我们有余暇欣赏平日少见的奇树异草，空气中一股甜丝丝的花木香气沁人心脾。由西门往北门方向地势稍显平缓，但仍崎岖难行，头上有树枝挡路，脚下有刺藤缠绕，偶尔想抓个树枝借力带一把，谁知“叭啦”一声断裂开多少年的参天大树。再走数十米远，可见残存的屋基，屋基均为单间设计，内宽约20平方米。不知不觉到了北门，这里距西门约3公里，此地已近河南地界，沿城墙下去可达北门，北门保存亦完整，地势也险要，以山脊为分水岭，这里已属河南地段。

沿北门退回再往东，依旧树木葱茏，地势起伏不平，我们想到这座海拔770米的高山上容纳十万余众生活，除了粮食之外

重要的是水。果然在去东门途中的山凹处遇见了黄杨寨的供水处——一座利用低洼地势而建成的大塘，塘岸也用块石砌成，塘内长满粗细不同姿态各异的树木，中间尚有芦苇和涓涓细流，这些告诉我们它当年的浩淼与存在的价值，塘边靠东处尚有残存的溢洪道。走过这座蓄水的小型水库，沿途残存的屋基更多、更密集，其中还有一间上部残留有青砖的套间，这比沿途看到的用纯块石建造的房屋较为考究，估计是寨中要人居住。在一山岗斜坡上有难得的约300平方米的石板坡，当地人叫它“晒谷石”，乃山上种田人晒谷的地方。不远处还有打凿精致的六边形石臼。离它百米处的另一石臼因长期使用而磨损更深，估计这一带是山寨人口最集中、最稠密的地方。

从西门往北再往东门，已经走了大约3个小时，东西门距离大约3公里左右，东门只残存半边城门，与之相连的城墙只剩下断壁残垣，这时我们才发现所有的城墙皆是依山造势，建在离山脚三分之一处，既便于防守，又尽量给山上留够生活的空间。

城门外是万丈深壑，近前让人有一种眩晕的感觉。东门对面便是牛头山，牛头山有一坡名“杀牛盘”，传说朱元璋年轻时在此杀一头牛充饥，将牛尾插入石缝中，随即长成树叶如牛头山，树杆如牛蹄的大树。东门险峻异常，只有一条山脊通向牛头山，东面是万丈悬崖，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东门向西300米处有一巨石突出于崖壁，约3平方米。此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眼前层峦叠障，如风拂浪，有一种“下视青天万里开”的浩瀚感觉。崖峭立如壁，山风吹来，一种凌空欲飞的感觉油然而生。

沿东门城墙向西1公里，然后折下山就是止止洞。传说此洞因当年一位名叫止止的僧人在此修炼而得名。止止洞洞口向东，洞径深10米余，高宽约4米，此洞颇怪，里面呈“凸”字形，顶部有一条0.5米的裂缝直通山顶。洞内石壁上隐约有字，仔细辨

认，方才确认，是明隆庆壬申（1572年）耿子颐题写的“止止洞”和“凝神”字样。1934年，红25军奉命北上长征，重新建立的鄂东北道委委员会设在此洞，他们就在这里指挥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斗争。现在这里已成了蝙蝠的天堂，小叶介绍说：“‘盐老鼠’（蝙蝠）屎，叫‘夜明砂’，是一味治失眠和神经官能症疗效显著的药！”

往南门的途中路越来越险，要连翻几道沟壑。一些岩缝中长满了形态各异的松树。这时同行的摄影记者彭杰在叫：“有水，这里有水。”只见山缝处出现一条涓涓细流。因为久旱无雨，小溪水流不大。沿着小溪向下走，见到几条支流汇集在一起。越往下走，水流越大。路又变得陡峭崎岖起来，涓涓细流到达这里已变成一条小溪，蜿蜒曲折，缠缠绵绵，侧耳倾听，耳畔传来不远处水击岩石的声音，时而舒缓，时而激越，如鸣佩击玉。

到达南门，时间已过下午一时。南门地势同样十分险要，还有滚木擂石的支架残骸，其间有两道小梁作屏障，叶希斌提醒我们该往回走了。回去的路一点也不比来时轻松。脚边即是万丈深崖，幸有繁杂的树木遮掩而不令人畏惧，爬坡时只能抓青藤绿枝，那些硕壮的树干往往一碰就断，稍不留神，人走过去还会被刺藤挂住。路上，小叶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吸烟，以防止起山火，因为脚下几厘米厚的松针落叶遇火易燃。这时叶希斌和詹学群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这山上有樱桃、檀树、松树、桃树、野猪、野山草、野鸡、野兔等，地下有全胡、柴、胡、天麻、桔根、南天星，还有七叶一枝花、野人参、竹荪等药材，另外还有可食用的蕨苗和香椿芽。“这里遍山是宝啊。”小叶自豪地说：“去年陪客人上山拾到半个铜钟，钟上印有‘道光’字样，价值不菲呢！”

叶希斌还遗憾地告诉我们，要是早些时来，便可嗅到满山

都是兰草花香，看到山上盛开的杜鹃，要是迟些时来，山楂、山桃等山果子可尽情品尝，遇到气温合适的雨天，这满地都是山磨菇，一捡就是一袋子。

此时太阳已经偏西，林中已有淡淡的雾蔼。经过七个小时的艰苦跋涉，我们已是疲惫不堪，打点行装准备下山。来到西门，我们竟有“曾踏羊肠百折来”之感，此时再望对面的天台，顿有平淡平常之感。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们很难相信大别山中竟有如些神奇的山水。踏遍红安名山的耿氏兄弟在对面的天台山讲学，吟诗作赋，为何不愿移步九焰山？如今想来，当时山寨被人占守，防护严密，岂能容忍外人轻易入内，故而史料缺乏详尽记载，也更显出它是红安旅游景点的一块璞玉。人们曾坐索道游过华山、黄山、泰山，九焰山虽无华山之奇、黄山之峻、泰山之高，但它是红安旅游景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带有原汁原味的大自然风光，只要舍得花一点力气，只要稍作“梳妆打扮”，适当投资开发并注意保护，九焰山将会以她独特的风韵，质朴的自然风光，神奇的历史传说赢得游人的青睐。

走进两河谷

艾国安

楚魏之交的天台山和传说中薛刚屯兵反唐的九焰山下，有一处三五户人家的小村，村子四面环山，娃娃们上学要走十几里山路。村民以耕田种药狩猎为业，吃自家种的萝卜白菜和头年腌制的腊肉，常以“老米酒，兜子火，除了皇帝就是我”抒发对生活的满足。村里的几个老人半年难得见到一个山外来客，也很少去想外面的世界，他们在意的是后山的红薯会不会被野猪糟踏，去年讲好的天麻价到时会不会行情。从天台山和九焰山的沟壑里流出的两股细流穿过茂密的原始丛林和大片大片的毛竹，九曲十八拐，汇集在村子东头，村子因些得名两河口。汇入村旁的小河缓缓穿过村前那片开满鲜花的湿地，蓦然回首向东，横亘在它面前的那道高高的山岭倏然裂开一道长长的峡谷里，小河蜿蜒而去。

这河谷便是两河谷。

从七里坪至两河谷谷口鹿儿庵，不过二十来里车程，感觉上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不用说，下车后扑面而来的那种发怵的静谧就足以叫人飘飘欲仙。静，太安静了！环顾群山仿佛是在观摩无声电影，又像是在欣赏动感油画。其实，仔细听听，还是能听出水流声、鸟叫声和风吹树叶

沙沙沙等许多声响。从鹿儿庵徒步进入两河谷，谷口处一片高大的柳树林子像一道天然门帘把两河谷藏在闺中，穿过这片林，首先看到的并不是期待中高山峡谷的壮美，跃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水草地，河水从草面上绸缎般往下平滑，露出水草外的鹅卵石像嵌在云锦的珍珠泛出银光。抓住一根根野茶树枝条，从一蔸高出人头的兰草花边擦过去；从天网一般垂下的青藤中钻过去；从圆圆的、一尘不染的鹅卵石上跳到河的这边，又跳到河的那边。不知走了多久，只见刀削斧劈的两座崖石像两扇半开的门把住河谷，门下一块巨石锁住前行的河水。从两边的崖石上攀过去，或从河底的石头边钻过去惊险而又刺激。鹿儿庵到两河口六七里路程，其间要穿三道峡转六道弯，每穿一峡转一弯，就会看见截然不同的风景，一会工笔重彩，一会儿泼墨写意，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整条河谷几乎看不到一处泥土，河床完全由高低起伏的石板和千奇百怪的石头构成。河水从高处滑落下来，翻几翻，徐徐在石面上展开又收拢，然后汇入一条弯弯曲曲、圆圆溜溜的石槽，再钻进由几块大小不等的石头架起的暗缝里，好一阵子才在十几步外的清水潭里绽开一朵白花。河谷两岸贴满青苔的崖石峭立如壁，崖石顶上的参天古木和各色花草伸向半空，本来不宽的峡谷显得更为狭窄幽深。值得一提的是河谷的蝴蝶，不知是什么物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蝴蝶落户两河谷，有人因此建议将两河谷更名为蝴蝶谷，后因云南蝴蝶泉在先而作罢，可见蝴蝶是两河谷的一道风景。

徜徉于这方空宁静寂、远离尘埃的土地，你不得不被两河谷的圣洁所折服。地处中原腹地的两河谷，古来就是兵家逐鹿的战场，如今又是商海泛舟的前沿，能留下这样的净土实在不容易。这里只有自然，没有人文，所有景点连名字都没有，山就是山，河就是河，树就是树，水就是水，不会由某块石头必然联想到某段历史或某个人物。山水树木，花鸟虫鱼看上去便

舒服合眼，似乎天生就该那个样子，探在洞口的灰兔和挂在树梢上的棕色松鼠上呼下应，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在这块盘古开天、女娲炼石以来，便未曾有人惊扰过的圣洁土地上，你可能会变得幼稚和天真，你觉得浑身软绵绵、麻酥酥、懒洋洋的，你会不由自主的摇头晃脑、跳跳蹦蹦的，啊啊啊地大喊几声。在洒满花一样阳光的石板上小憩，在清泉石上流的溪边看水中游鱼，在几枝交叉的树丫上睡觉，到两河口的农家吃顿农家饭，都随你意。

走进两河谷就是走进自然，让你反璞归真，重现自我；走进两河谷，就是走进童年，让你找回儿时的记忆；走进两河谷，就是走进梦幻，让你感觉一个真实的世外桃源。也许你还很穷，也许你很富有；也许你是平民百姓，也许你是达官贵人。你是否意识到你的心灵有些疲惫，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妨走进两河谷去放松一下心情。

革命故事

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江　河

1930年3月16日，国民党空军中校队长龙文光奉命驾机由汉口飞往河南开封，返航途中因雾大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今河南罗山县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在附近山头放哨的赤卫队员发现摇摇晃晃降落的飞机，迅速包围过来，俘虏了龙文光。徐向前亲自讯问龙文光，并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龙文光决定弃暗投明，参加红军。中央军委获悉这一消息，决定在鄂豫皖特区政府成立航空局，并任命龙文光为局长。

根据地军民热情高涨地在今新县卡房附近修建了一个占地百余亩的简易机场，可是在河滩的飞机怎么到机场呢？在根据地军民的帮助下，把飞机解体成部件，像蚂蚁搬食一样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搬到飞机场。龙文光组织技术人员重新组装飞机，装好后全部油漆一新，在机翼的两端各画一颗闪闪的红五星，在机身两旁书写了“列宁”两个红色耀眼的大字。紧接着就是解决燃油问题。军委把这个任务交给黄安县军事指挥部，独立营千方百计也只从武汉买回几桶汽油。特区军委和政府又想出一个办法：被俘的国民党34师师长岳维峻关押在黄安，这家伙很怕死了，一提出缺汽油的事他就满口答应，并且很快从国民党营垒里搞来了75桶（合1875加仑）汽油，基本满足了需求。

1931年7月10日，机场人山人海，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就要在这里起飞试航。上午8点，徐向前陪龙文光和陈昌浩来到了机场。当徐向前试飞命令一下，龙文光和陈昌浩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了飞机。随着一阵轰鸣声，“列宁”号飞机急速地在跑道上滑行。抬头，然后飞向了天空。机场内外一片欢腾。后来为了飞行更加方便，飞机从卡房机场飞到了七里坪附近的弯店临时机场。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10日，以猛烈的攻势发起了黄安战役。国民党第69师师长赵冠英率部固守待援，红军围城一月有余，久攻不克，徐向前总指挥决定让“列宁”号参战。12月22日上午九时，“列宁”号腾空而起，在黄安县城上空展翅盘旋。敌人惊喜地以为是他们的飞机救援来了，迫不及待地作接应空投物资准备。他们接应的却是一颗开花的炸弹。敌人还认为是误投，忙着打信号，直到“列宁”号又一个回身撒下雪花似的传单，敌人才如梦初醒乱作一团。红军乘机发起总攻，一举破城。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以歼敌1.5万余人，活捉赵冠英，缴枪7000余支的辉煌战果而胜利结束。这是红军飞机在我国建军史上第一次参加战斗。

1932年6月，国民党出动约3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疯狂“围剿”，红军夜以继日地行军作战，处境日趋危险。“列宁”号飞机在根据地群众的精心保护下，随红军接连转移了几个地方。随着作战频繁，红军只好又把飞机解体，专门调一支百余人的部队，抬着飞机部件，翻山越岭与敌人打游击。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徐向前下令：就地埋藏“列宁”号飞机。红军战士流着眼泪把飞机埋藏在柴山堡回龙寺的两座坟墓中间。后因坏人告密，飞机被敌人挖出毁坏。

在转移突围中，龙文光与红军部队失散，他化装潜回武汉家中，但不久被特务发现抓获。1933年8月9日，国民党当局以

“带机投匪”罪，判处龙文光死刑。同年底龙文光被我党有关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

为了使后人了解这段难忘的历史，现在空军航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按1：1比例复制的“列宁”号样机。

天台有幸埋忠骨

辛向阳

1963年4月15日，近千名干部群众聚集在红安县烈士陵园内，为沈泽民烈士的遗骸举行安放仪式。烈士墓碑上董必武的题词显得格外的醒目。

烈士的兄长、著名文字家沈雁冰特地送了花圈；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和沈泽民烈士的女儿沈玛娅也从北京赶来参加了烈士遗骸的安放。张琴秋与沈泽民为浙江桐乡人，他们从1924年结成伉俪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为止，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和生活在一起。

站在烈士墓前，张部长一定是想起了她与沈泽民战斗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望着他们的女儿沈玛娅，她不由得声泪俱下："您的女儿玛娅现就在您身边，当您离开她的时候，她仅四岁，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我和她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继承您未完成的事业……"

安放仪式后，张琴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她握着县委书记乔平的手，动情地说："泽民牺牲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为不能找到他的遗骸而感到不安，没想到你们却找到了，而且还为他举行这么隆重的追悼会。我想，泽民若九泉有知，也会感激你们的！我想问问，他的遗骸是在哪儿找到的？"

“是天台山刘家湾找到的。”乔平轻声回答道。

“天台山、天台山……”张琴秋部长喃喃自语着。思绪穿过时间的隧道，回到了1931年的秋天，那是她与沈泽民第一次来到黄安县天台山。一路旖旎风光让这位年仅27岁的红军女将领显得更加年轻动人，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也是兴致勃勃。来到天台山顶，沈泽民感慨地对站在身边的夫人道：“没想到大别山深处，有这般迷人的秀丽风光啊！琴秋，要是哪天我革命到底（当时，红军中将“牺牲”称为革命到底）了，你就把我葬在这里吧。”张琴秋一把捂住了丈夫的嘴巴，娇嗔道：“呸呸，什么乌鸦嘴呀！”没想到当年这句玩笑话，在两年后的秋天一语成谶。

“天台山是你和沈书记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应该不陌生吧？为了在那儿寻找沈书记的遗骨，几届县委都花了很大精力呀……”乔平打开了话匣子。

新中国成立后，红安县委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沈泽民烈士遗骸的寻找。1954年春，红安县委书记马友才在武汉拜访郑位三时，郑老又向马友才提出查找沈泽民烈士埋葬地点的要求。沈泽民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期间，郑位三是省委常委，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遗憾的是，沈泽民病故时，郑位三正率部在外面打游击，对沈泽民烈士埋葬的确切地点也不清楚。郑老向马友才介绍了他所掌握的情况：当时，红25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四处打游击。这时，沈泽民的肺病复发。10月间，部队从皖西北运动到黄麻地区，沈泽民又患上疟疾，为了便于游击，部队只好将沈泽民抬到天台山养病。临分手前，沈泽民对郑老说：“我们的人呢？我们的部队呢？我要看看我们的部队！”在郑老的安排下，一部分二十五军战士按长枪、短枪、机枪的次序，列成三队集合到沈泽民的面前。沈泽民吃力的抬起身子，看了看这支部队，满意地对郑老说：“我们的部队不错

啊!”话毕，就由警卫员抬走了，这也是郑老与他见的最后一面，后来听说，沈泽民被送到一个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的湾子里养病。在那儿，他抱病完成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他沉痛地检讨了红25军在发动七里坪战役以来，省委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好”，“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并且还提出了以发展便衣队，加强群众工作和采取游击方式“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对敌斗争方针。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革命高度负责和光明磊落的品质。报告写成后第十天，还是三天前喝了点南瓜汤的沈泽民对警卫员说很饿，想吃点东西。然而，在敌人残酷“清剿”下，这个湾子里，除剩下几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外，其余的人早就“跑反”（外出躲避敌人）去了，根本找不到吃的。警卫员上山找了半天，才找到3个快烂了的野柿子，沈泽民还没有吃完就断了气。当时敌情复杂，来不及找棺材，是将住户的两副门板拆下来，将烈士夹在里面，然后用野藤缠紧当棺材埋葬的。埋葬时，连门环都来不及弄下来。烈士死时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是一双黑胶底皮鞋。

马友才回来后，找到民政科长熊梦英，将郑老的嘱托转告给他。当谈到沈泽民病逝前住的湾子是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时，熊梦英回忆起天台山有个湾子叫刘家湾。解放前打游击时他在那里住过。有一次经过刘家湾时，好像听说起那里是埋着一个什么书记，是用4扇门板埋的。马友才让熊科长第二天带两个人到刘家湾走一趟，摸摸情况。同时叮嘱他，有两点重要线索必须注意，第一，沈泽民死前穿的是黑胶底皮鞋，这种黑胶底皮鞋当时只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才穿；第二，沈泽民死后是用门板下葬的，门板上的铁门环当时没弄下来。烈士已经牺牲20多年了，别的东西腐烂了，可黑胶鞋底和铁门环是不容易烂的，这次去调查，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第二天，熊梦英科长带人来到天台山，在天台高山岗找到天台支部书记秦敬安，一行4人来到对天河村刘家湾，他们在刘家湾走访了很多老人，可走访者都不清楚这件事，因为当时敌人对天台山的“清剿”很猖獗，年轻人都“跑反”去了，几位知情的老人现在大都不在人世。只是听说民国二十二年秋天，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在湾子里病死了，至于埋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就在他们一愁莫展的时候，一位老人告诉他们：“后山凹有一个土包，但是不是一棺坟就难说了。”熊梦英他们随即来到刘家湾的后山，在山坡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上果然发现一个小土包，从土包的外形看，很象一座坟。

“如果是坟，应该有墓碑的呀?”秦敬安提出质疑。

“不可能有墓碑，当时敌人搜山很严，如果让敌人知道这是共产党鄂豫皖省委书记的坟，他们会开棺毁尸的。”熊梦英解释道。“不管是不是坟，先挖开看看再说。”他们从湾里借来锄头、铁锹，挖了一会儿，果然有朽木出现。“肯定是一棺坟!”熊梦英兴奋地说。一会儿，便挖出了一根脚骨，脚骨旁赫然有一只黑胶鞋底。“好了，别挖了，这就是沈书记的坟。”熊梦英将脚骨轻轻地放回原处，用土掩埋好。然后，带着挖出的黑胶鞋底回了县城。

1959年春，红安县烈士祠建成了。县委根据红安籍老红军，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郑维孝的建议，决定将沈泽民与红25军军长蔡申熙烈士的遗骸迁入红安县烈士陵园。1962年5月，董必武三度回故乡时，应县委的请求，亲自为两位烈士题写碑名。

烈士墓建成后，民政局派专人前往天台刘家湾取回沈泽民烈士的遗骸，因为烈士的埋葬地点隐蔽，所以保存比较完好。在清理烈士遗骸时，还发现了烈士脚上的另一支黑胶鞋底，军用皮带上的铁扣，军服上的4个纽扣以及4只铁门环。取回的烈士遗骸共计22块，分别为：头颅骨1块、下颌骨、锁骨2块、脊

椎骨4块，髂骨1块，肋骨1块、肱骨1块、尺骨2块、桡骨2块、股骨2块、脚骨2块、胫骨2块、肩胛骨1块。

含着热泪听完乔平的介绍，张琴秋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说："我代表泽民再一次感谢红安县委、县政府。感谢啊！"

一个永远没有揭开的秘密

江绍革

徐向前是山西五台县永安村人，1929年6月受中央军委书记杨殷的派遣，从上海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黄安，同年底与七里区程维德村妇女干部程训宣结婚。

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正在七里一带指挥战斗，反击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却派人把程训宣抓了起来，说她是“改组派”。徐向前从警卫员那里得知消息，也不便过问，只好听凭组织处理。张国焘没有搞到徐向前是“改组派”的证据，便将这位坚强的女战士杀害了。反“围剿”失败，部队很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打听程训宣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1937年到达延安后，徐向前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

程训宣兄妹五个，四人都为革命牺牲了，只剩下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大哥程启光。1955年程启光将军把母亲从红安接到了北京。徐向前元帅知道后，连忙驱车去看望岳母。他的心情矛盾极了，一方面急于想见老人，另一方面又怕见到老人。26年了，程训宣早已不在人世，但这噩耗始终没敢告诉老人，他和程启光都对老人保密。程训宣是五兄妹中唯一的姑娘，也是老人的掌上明珠。徐帅拿定主意，对老人还是不能讲。

徐帅走进程启光家，一家人正在吃饭。他一眼就认出了穿着粗布褂子的母亲，走上前，亲切地叫了声："娘，您老人家身体可好?"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惊喜地说："是向前？来来来。"老人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身边。她一边叫人给他倒酒，一边嗔怪地说："向前训宣哪去了？娘来了也不来看我!"

"娘，训宣到陕西学习去了，一时回不来，你别怪她。"徐帅解释时声音有些发颤。

"这孩子，咋不想娘呢？一走几十年，娘想死她了!"老人眼里噙着泪花。她用衣角擦了擦眼，竭力地控制住自己，又说："来，向前，你喝娘带来的红安老米酒。"

徐帅接过酒一饮而尽，又让程启光给他倒满一杯，说："这一杯我代训宣喝了，向娘陪罪。"老人却不吃也不喝，满眼慈爱地看着徐帅。

徐帅望着老人满头的银丝和那双期盼的眼神，他的心在发涩，喉咙里也像堵了什么。多少年了，老人被蒙在鼓里，她会想些什么呢？是女儿的不孝，还是她预感到了什么？他真想把一切都告诉老人，但他又说不出口。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帅，在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上就这么折磨自己，这可比打仗还难啊!

老人一直沉浸在思念女儿的心绪中，她好半天又说："向前，跟你商量个事。训宣回不来娘去看她，你给娘打张车票。"说着就去收拾东西。

徐帅一把挽住老人的手，说："娘，你别急。你真想去我派车送你。最好是等段时间，训宣正复习功课，要考试。您去了她能安心吗?"老人仍不满地说："训宣不要我这个娘了，我明天就回去!"

"你老人家要是等不得，我马上发电报叫她回来，学也干脆不上了!"

“向前，算了！”老人看徐帅的认真样，心又软了，叮咛说：“娘就是想她。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一时半会儿地见不着也没啥，让她安心学习吧。你们都是做大事的，耽误不得。娘老啦，听你们的！”

就这样，老人在儿子程启光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就回红安老家了。徐帅为了使老人晚年幸福，一直在编织着善良的谎言。老人三天两头就请人给女儿女婿写信，问这问那。徐帅也不断地回信，有时以个人名义，有时是和训宣联名回信，还常给老人寄些吃的用的东西。为了摆脱老人对女儿的“追踪”，徐帅不断地给程训宣“调动”工作，从陕西调到青海，从青海调到新疆，最后调到了国外……

程训宣的母亲一直活到94岁，这个始终没有揭开的秘密使老人安逸地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奉献不止

军长不当　回家种地

陈晓东

他有一个灿烂的名字——杨锦华。杨锦华是红安高桥区人，他一介平民，且去世多年，然而，为什么总有人会提到他？是他给官不要官的惊人之举，还是他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且不说他当初如何踏上革命之路，在血泊中摸爬滚打，单讲他在长征路上给朱德总司令当警卫员和马夫，并和中央领导生活在一起，他就有足够的老本可吃了。据说，长征路上，他曾挑着百十斤重的机要文件，冲破敌人的重兵围追，差点将命丢了也在所不辞。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知道这件事表扬了他。朱老总更是满意和信赖他。他跟随朱老总鞍前马后从黑暗走向黎明，他为保卫朱老总立下了汗马功劳。像所有的中央首长一样，他们的警卫员不能当一辈子，要考虑警卫员的前途。那是1955年军队授衔前夕，杨锦华被任命为某军副军长。命令下达后，谁人不替他高兴？可杨锦华却犯难了。他心里这么想：军长要指挥千军万马呀，那是发号施令的事情，也是一门大学问，可自己只能干杂务干实事，要挑这么重的担子恐怕不行。……于是，他找到了朱老总，说：“老总，我副军长的命令还是收回去吧！”朱老总不解地问：“为什么？副军长的职务还低了吗？”

“不是，我文化不高，怕是干不了副军长。”

“那你想干什么？说说你的想法。”

“我是这么想，现在全国解放了，大家不能都挤在部队，农村建设需要人，我本来就是泥腿子出身，还是放我回红安当农民吧。”

朱老总面对自己这位心爱的部下提出的问题，也有些犹豫，说：“这是个大事情，你要想好啊！”

“我不想好就不来找你了，你放心，我不后悔……”

朱老总看杨锦华去意已定，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不过，老总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别离依依，叮嘱道：“你回乡也是军长，是个‘名誉军长‘嘛！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来找我，没有人敢把你挡在门外……”

就这样，杨锦华回到了红安，回到了他日盼夜梦的红土地。他说话算话，回乡后谢绝了一切职务安排，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农民。

然而，想象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也并不都是鲜花美酒，它多半是风风雨雨，是生命的抗争，是痛苦的煎熬，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人啊，谁能摆脱社会属性的桎梏呢？谁又能完完全全超脱自己而不被生活所累？杨锦华回乡短短几年就风云突变，红安和全国一样天灾人祸，饥饿和愁闷的日子不得不使杨锦华想到了朱老总。

“给我接朱德总司令！”

“什么，你是谁？你好大的口气！”总机接线员以为有人捣乱，她不相信一个边远的小县里有人要通天。

“叫你接你就接，你管我是谁！北京，朱德司令的家，听懂了吗？”

这唐突的电话当然没有接通，杨锦华气鼓鼓上了北京。

果然，他转弯抹角地见到了朱老总，人家一听说他过去是

朱老总的警卫员，谁敢把他拒之门外。

老总说：“锦华，你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你有事才来找我，你有啥子事，说吧。”

杨锦华心事重重，他见了老首长一吐为快：“老总，我憋了很久，你莫怪我讲话直来直去，我给中央提点意见，大食堂不能办了，再办下去要饿死人的。还有大炼钢铁，这是蛮干，农民都能炼钢铁，还要工人干什么？……

朱老总一脸阴云，他认真地听着老部下的诉说，他知道杨锦华在掏心窝子话，可他能向杨锦华解释清楚吗？庐山风波过去不到一年，我们就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悲剧。虽说也有天灾，也有“老大哥”的背叛，但人为的过失不能低估啊！朱老总还是朱老总，临危时他从容不迫，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在所有的战友和部下面前，他既是一个跺脚也地动山摇的掌兵人，但他又是宽厚的长者，是一个和风细雨的慈父。此时的朱老总心事浩茫，他能对杨锦华说什么呢？他只能安慰他：“锦华，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你的意见我赞成，但不能急，要慢慢解决。”

“中央不知道下边的情况吗？人要吃饭啊！”

“知道的，知道的，很快就会纠正的……”朱老总对杨锦华了如指掌，他喜欢他的快人快语，但作为他朱老总，他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把中央的事向他抖落个干净，他只能从另一个方面关怀他：“锦华，这些年你受苦了，看你穿得破衣烂衫的，我心疼——回来你换换装吧，顺便带点吃的回去……”

老总的话像寒夜里的把火，它温暖了杨锦华的心。

在一个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杨锦华被引到了一个大仓库里。里面的东西堆积如山，里面有吃的穿的，还有许多军需品。工作人员说：“老总交待了，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尽量满足你。”说着，工作人员顺手抄起一件军呢大衣递给他说：“喏，

这件不错，你穿试试，我看符合你的个头。”杨锦华接过军呢大衣，他仔细地摩挲着，却有些爱不释手，但终于还是将它放下了，他喃喃地说：“东西是好东西，可我穿不出去，还是留给需要的人穿吧！”他在仓库里转悠了半天，什么好东西也没拿，他只是看中了一件旧棉衣，说：“这件可以给我吗？它暖和，晚上农村冷，我穿着它好守夜。”

不久，杨锦华回到了红安。半路上乡亲们就把他围上了，问这问那。孩子们直勾勾地看着他的包，那是一双双企盼的眼光。杨锦华知道他们想什么，他索性把所带的包全打开，一个包里装的是馒头，孩子们蜂拥而上，大人们看着流泪了。

一天晚上，他穿着北京带回来的棉大衣在野外护场。无意中他将手插进衣兜里摸着有东西，掏出来一看他傻眼了。那一张张的票子数起来竟有五百元，一个信封里还装了二百斤粮票。临走时老总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啊！什么时候偷偷放进去的呢？是怕我不收吗？他心里像一锅滚开的水直翻腾。他双手捧着钱和粮票，望着深邃的夜空，望着遥远的星斗，思绪翩翩。啊，戎马倥偬，高歌大风！你牵着马，你挑着担，随老总血染沙场，斩关夺隘。延河畔老总替你补鞋袜，太行山老总教你学文化；同吃一锅饭，举怀碰肝胆，兵不兵，官不官，你是老总心头娃。别离了，长相思，恨太远，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平民和高官，谁说人阔脸就变？老总还是井冈山的官，老总还是穿草鞋的官……

杨锦华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无悔无怨，而生活对他的回报又似乎太苛刻了。他无儿无女，是否娶妻，不得而知。他收留了一个养子叫杨传录，如今已是人到中年了。杨传录谈到杨锦华时这样说：“苦啊！是他把我从两岁时开始带大，我和父亲相依为命，他每天总是省下……”说到这里他哽咽了。他怎能说尽父亲对他的养育之情呢？那不尽的

辛酸能一下子道完吗？一个摄制组拍下了杨锦华的家。镜头中，青山依旧在，一头水牛在门前咀嚼青草，还有那棵弯弯的树苍劲挺拔……然而，杨锦华悄悄地走了。杨传录和当年的老区委书记耿协楠又来到了红安的骨灰堂，把一束金色的秋菊献在他的遗像前。他的骨灰在一个不起眼的高处，要搭板凳才够得着。他的遗照很抓人，让人想起一幅名画《父亲》。

杨锦华就这么走了，只留下这唯一的一张遗照和一捧骨灰，还有他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

做个好人！

解甲归田的红军团长方和明

阙成良

方和明，曾任红军团长。革命胜利后，他决心把革命的大旗扛到底，主动申请回乡务农。

1908年，方和明出生于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柳林陈家岗一个农民家庭。幼时父母双亡，以讨饭为生，后给富农放牛、当长工8年。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次年编入黄安独立第三营，192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在红军中历任通讯员、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县指挥长等职，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连长、旅后勤科科长、营长等职。20余年，经历大小战斗200多次，7次负伤，15次立功受奖。

1949年底，方和明谢绝组织上让他去延安休养的安排，解甲归田，回到家乡。乡亲们在看望方和明的同时，对他参加红军20多年突然回乡很不理解。有位老大爷说：“哎，革命成功了不去享福，回来种田值得吗?”

看着朴实、热情的乡亲，方和明联想起同他一起参加红军为革命壮烈牺牲的71个同乡，他拉着大爷的手说：“大爷，我们去参加红军的72人中只活了我一个，我不回来把家乡建设好

对得起烈士们吗？刚解放，党和政府决定我到延安休养，我是说了好多好话才让我回来的。”

乡亲们听了方和明的一席话，悟出了他解甲归田的原因：他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土地，没有忘记革命先烈，没有忘记继续革命。

方和明在乡亲们的协助下，将组织上发给他的一百斤大米券兑换了人民币，盖起了两间简陋的瓦房，添置了部分农具就开始了农家生活。

柳林大队有很多小山岗，都像“骨头架”，有水存不住，无水裂大口。方和明同志决定把它变个样。在一次党支部会上，他提出了“利用地形，逐步兴修小型水利”的方案，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接着，他带领十几个党员和200多个民兵，到李家洼安营扎寨，干了起来，决心要修一座蓄水30多万立方的水库，解决大队西半部用水问题。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学着做，口粮少瓜菜代。曾经在战场上负过7次重伤的方和明日夜战斗在工地上，百把斤重的担子不离肩，粗大的苦楝子树扁担压断了无数根。锄头一分分短下去，大坝一层层高起来。经过一冬的苦战，柳林第一座水库胜利竣工了。

紧接着，方和明又和大队党支部成员一道，带领全队群众开山拦水。冬天风霜不歇脚，夏日酷暑不下阵，与“骨头架”斗了十个冬春，终于造起了19座小水库，修成了9条水渠、3道拦河坝，完成80多万土石方，使大队80%的农田实现了自流灌溉。今天大家提起方和明大战“骨头架”的事，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老方真是块过硬的不锈钢！”

方和明对集体的一草一木十分爱惜。冬天下大雪，他怕牛受冻，牵到自己堂屋里喂养，烧温水给牛喝；夏天，他晚上给牛熏烟驱蚊。而他却从不乱花集体一分钱。领导见他的房子窄小，决定给他修几间房子，他却把部分材料送给集体，自己的

房子内壁还是用土坯砌成。

在方和明同志带领下，柳林大队群众经过几年奋斗，使原来穷山村变了样：梯田平展，稻谷堆仓；茶树遍山岗，果园绕村庄；公路通南北，渠道盘山梁。1955年，他带领4户贫农组成全乡第一个互助组，带头组建初级合作社，被选为社长；1956年任高级社党分支书记兼社主任。1957年他光荣出席了红安县劳模大会，同年又光荣出席了湖北省劳模大会。他的名字刊登在《湖北日报》光荣榜上。1959年秋，他随中国复员军人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当时，在武汉军区任职的陈再道将军从报纸上发现了方和明，心想："这个方和明是不是和我一起过雪山草地的红军团长?"将军思忖着："按理他不应该在这里出现，全国解放那年不是叫他去延安休养了吗?"出自对战友的思念和关怀，将军还是派人去打听。经过查实，方和明正是将军的战友。陈再道将军立即驱车前往，亲切会见了他，并拍着方和明的肩膀说："还是好样的!"

回乡多年，方和明同志一直以普通劳动群众的身份出现，有功不骄，位尊不傲。1951年，县民政局干部办残废证时，问其在部队任何职，他只说自己是红军战士。1960年出席全国民兵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他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民兵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方和明常向青年们回忆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教育青年发扬光荣传统。他4次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先后任中共红安县委委员、红安县革委会副主任、红安县贫协主任、湖北省贫协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11月，方和明病逝于红安。

将军与山村小学四十五年不了情

周晓东

10月5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

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湖北红安县檀树岗乡观音阁村小学旁，从车上走下一位白发苍苍、满脸老人斑的长者，随行人员从车上抬下一台54厘米海尔牌彩色电视机。在教师和同学们的簇拥下，长者亲手将彩电交给校长。这位年长者就是85岁高龄的原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秦光远将军。这是将军自1953年以来的45年里第四十五次向这所学校捐赠钱物。

秦光远是檀树岗乡观音阁村人。1931年秋，18岁的秦光远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待到新中国成立时，当年一同参军的51名战友，已先后牺牲，仅留下秦光远一人。

1953年，秦光远听说家乡——观音阁村筹建小学，就派车送来了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就连开学用的吊钟、口哨、粉笔等也送来了。他又与夫人商量，今后要每年资助村办小学，以此安慰长眠地下的51名同乡战友。自此到50年代末期，秦光远每年都给学校寄去200元人民币，或送去价值200元的教学用品。60年代，秦光远主要是为学校捐书。武汉市新华书店每到一批新书，将军都一样买一两本，寄给学校。当年学生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烈火金钢》等书，都是他

寄来的。1964年，秦光远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工资也相应增加。他的捐款也增到每年500元。“文化大革命”中，秦将军也像许多将军一样受到冲击，遭受迫害。1969年至1971年将军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农场劳动。临行前，他叮嘱夫人，一定要代他继续每年一次的捐赠。到了80年代，秦将军的工资又上调，他每年向学校的捐赠增加到1000元。进入90年代，将军每年的捐款又增加到2000元。去年，当他听说学校开展“普九”验收，一次就捐款5000元。

自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开始到今年，每次教师节来临之际，学校的8名教师都会收到将军送给他们的礼物——100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都是秦老专程来学校亲自颁发。今年的9月10日，将军正生病住院，他委托公务员送来了800元钱。将军谈到这些时，平静地说：“为老区教育尽点义务，我心里愉快。”

我从秦老的公务员那里了解到，将军家中至今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对从50年代开始用的沙发，补了又补。解放后一直居住在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市的将军家，还是去年才买了一台空调。

45年来，观音阁小学学生毕业了一批又一批，校长换了一任又一任，然而将军对这所学校深深的情和爱始终没有改变。

1994年，将军年仅24岁的孙女大学刚毕业就患了白血病。为了治好孙女的病，将军及其家人共用去了20多万元，耗尽了家中多年的积蓄。在病床上躺了4年多的孙女于今年9月24日去世。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将军办完孙女的丧事，又想到了学校那台黑白电视机已使用多年，每次使用时都要用手拍几下才能出图像，于是他筹足了3000元钱，选购了一台最新式样的彩电，在孙女去世后的第十一天，将彩电送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学校。秦将军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每年对学校的捐赠将继续下去……

将军之子程平东扎根老区

江作苏 陈新民 张小燕 任 浩 张发喜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吉鸿昌

将门之子、军校之才，他的人生轨迹本可从这里开始华彩书写。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脱离“光环”，一头扎进大别山下的故乡红安，在青山环抱的山区小县一干就是38年。如今，皓首之年的他，仍是一身虎劲，义务带领革命老区农民架桥修路，开山凿石，兴办企业，打开通向全面小康的致富之门。

满身正气，平实人生，信仰不移。他就是被乡亲们亲热地称为“平东哥”的红安县公安局退休副局长、65岁的共产党员程平东。

在黄麻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将军之子义无反顾地挑起脱贫领头人的重担。

2003年4月3日，红安县七里坪镇谢家咀垸，薄雾蒙蒙，村民们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他们尊贵的客人—已故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程启文的儿女们。

绕村的倒水河静静流淌，新建的石拱桥跨河而过。程平东捧着父亲的遗像伫立桥头，往事就像清澈的河水在心头荡漾。

上世纪20年代，在黄麻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大别山深处的红安县谢家垸，少年程启文赤脚趟过倒水河，参加红军闹革命。革命成功后，他成为共和国的将军。

1993年，将军暮年，返乡心切，然而没想到，回乡之路仍被那条倒水河阻隔，年迈的将军仍是由老乡背着趟水进垸的。老将军嘱托大儿子——时任红安县公安局副局长的程平东："战争年代垸里就出了5个烈士，可是革命成功几十年了，乡亲们盼穿眼的一座桥都修不起，我们愧对烈士！你一定要代我了这个心愿！造座桥，造福父老乡亲。"

谢家咀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闭塞的交通，使谢家咀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孤岛"，生产不便，连孩子们上学都要趟河，一遇大雨，河水陡涨，娃儿们只好含泪辍学。

红军父亲的遗愿，深深埋在儿子的心里。

程平东1939年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1965年，他告别母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怀着对革命老区的深深向往，一头扎到故乡红安，在县公安局当了一名普通民警，历任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退休。

"人退休了，有了空闲时间，就到垸里办点实事吧！"经过一番筹备，他就在当年父亲走出的茅草屋旁，一间6平方米的土坯房里开始指挥着一场新的战斗。

身患心血管瘤的程平东开始为建桥奔波。曾任县医院副院长已退休的妻子梅毓芳经常从城里来到乡下帮忙。渴望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村民，把希望寄托在这位红军后代身上。垸里的100多位农民兄弟，像当年先辈上前线一样加入义务劳动行列。

县里来人一勘测，若建平桥预算需50多万元。这个数字把程平东吓了一跳。他运用在哈军工学到的知识，又找来桥梁建

筑书籍，边学习边设计，在县交通局工程师指导下，经过4次修改，决定改为石拱桥，这样可以节省大量资金。

建桥资金从哪里来？远在北京的亲弟弟、总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了解到哥哥为民建桥遇到了困难，首先捐出6万元，在祖国各地的6个弟妹也纷纷解囊相助。程平东募集到13万元资金。

程平东义务修桥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县领导和一些离退休的干部纷纷来到谢家咀，看望慰问程东平和他的乡亲们，许多部门和单位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解决物资和资金困难。县长董卫民紧握着程平东的手说："你乐于奉献、不图名利、扎实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县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是红安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2年11月，修桥进入关键时期，程平东白天与村民一起奋战在工地上，晚上就在土坯房独对孤灯，钻研建桥技术。为赶在汛期来临之前完工，程平东每天第一个来到工地，最后一个收工。有几次扭肿了脚，他仍然坚持一瘸一拐地指挥施工。

小村子修大桥，何异于蚂蚁撼大树。老区人民凭着特有的骨气和韧劲，家家献石料，人人干苦活，他们用手上的层层老茧和淌下的汗水，迎来了通车的这一天。

2003年4月15日，一座长140米、宽4米的8孔9墩石拱桥通车了。乡亲们站在大桥上，深有感触地说："平东是一个好党员，是我们的贴心人，将军的好后代。""平东圆了乡亲们的梦，也实现了一家两代共产党人的心愿。"

在浸染着烈士鲜血的这方热土上，程平东把满腔激情融入平凡人生。

桥修通后，程平东召集乡亲们开会，"光有一座桥还不行，整天在桥上走来走去扭秧歌，能致富吗?"

他对乡亲们说，谢家咀几百亩河滩，十几座山岭都是资源。

程平东为了让工业项目进山来，利用修桥留下来的闲置设备，投资3万元建一个精米加工厂，又投资15万元建起了碎石厂和预制板厂。

程平东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谢家咀的“工业化前景”：

“看了谢家咀的田、地、山林，整个山上均是石质极硬的石料，简直是取之不尽！……可办个采石场，出售石料至少十数年无问题。山的东南部储有石英石，是混凝土的上好石料，可同时办碎石厂，向外出售碎石料。我想这是谢家咀走向致富路的第一步，我自信这是对的。”

程平东还为谢家咀找到一条致富的好门路，种紫苕。

2002年5月，在桂林工作的妹妹提供了一条信息：桂林种紫苕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黑色食品一公斤可卖六七元钱。程平东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脱贫的路！”他马上寄信让妹寄来种子和技术资料，并先在谢家咀试种。

整地、施肥、浇水，程平东边干边学。几个月的心血没白费，他试种的紫苕比桂林的还大，产量也高。试种成功后，程平东一边联系销路，一边动员家家户户种紫苕。

项目有了，村里制度建设、村务管理也要适应形势变化，程平东又当起了义务政策宣讲员和村规设计员。

大家的事大家定，齐心协力奔小康。在程平东的建议和帮助下，谢家咀逐步建立起组民会议制度，集体商量决定村里的大事。

架桥修路，改田办厂，事事关系大家的利益。程平东将全村人组织起来，每家选一个代表，按村民自治模式，选举出村民小组长，每月初一、十五召开村民会议，决定村里的大事，每件事须大多数村民同意才办。

村边河滩改造，砍了一些树。怎么处理？拍卖！谢家咀的村民第一次摒弃了抓阄的老办法。结果，起价600元的树拍卖到

了900元，买的人称心，公家也没吃亏，村民赞同地说：“这办法好。”

招标、拍卖、民主决策，这些城里人讲的新名词，如今逐渐入了谢家咀村民的脑和心。

踏遍巍巍青山，程平东把不变的信念写在家乡贫脊的山岭上。

程平东为谢家咀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改田，修路，办厂，等集体经济壮大后，就着手改造村民住房，建设前院花草、后院沼气、屋顶太阳能的新农村。

站在村头望去，倒水河滩一排排新发行的沙田在阳光下格外耀眼；通往县城运送石料的山路在隆隆的开山炮中一步步向前延伸；山间滩头，倒水河两岸，铆足精神的村民肩扛背驮，挥汗如雨。

寒冬挡不住大伙决战贫困的步伐。他们要把与“平东哥”共同定下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烈士之子、78岁的郑元田老人在工地忙前忙后，逢人就说：“平东领着我们奔富路哩！”老人双手布满“铁茧”，干起活来劲头十足。

30多年来，程平东曾有许多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但他奋斗的足迹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这块红土地。

一幅题为《向往》的雕塑，时常在程平东心头浮现：一个稚气未脱的“红小鬼”，依偎在老红军身边，听老红军讲述遥想革命成功后的幸福生活，“红小鬼”双手抱枪沉入梦乡，嘴角露出甜蜜微笑。

与同学比，与战友比，程平东的人生算不上辉煌，生活也不富有。有位老乡问他：你放着清福不享，跑到咱山里来图个啥呀？

“当年那个‘红小鬼’图啥？共产党人不图自己荣华富贵，

图的是能为社会主义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程平东总是这样回答。

2003年10月12日，来自祖国各地的10多位红安籍将军后代重返故土，程平东以一个“草民”的身份，兴奋地向大家介绍发生在红土地上的山乡巨变，尽叙同窗谊、战友情。

当时也有人问，你程平东当了一辈子“草民”，你不觉得亏么？

“亏啥?！天上飞的有天上飞的好处，水里游的有水里游的自由，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就愿意脚踏实地为群众做点实事！”

在程平东的日记里，常常记着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小事，这些小事串起的是一颗党员赤诚的心。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程平东把心底的那份大爱，毫无保留地给予最需要帮助的人。年近六旬的卢老汉无儿无女，眼睛深度近视，生活十分艰难。程平东惦记在心，经过多次联系，帮助卢老汉进了县养老院。此后，他经常带衣服、水果去看望老人，有时还把卢老汉接到家里坐一坐。李某曾因偷盗入狱，服刑期间，在程平东帮助下学到了养鱼技术。刑满出狱后，李某希望承包村里的水库养鱼。有些村干部说：“不能包给一个坐过牢的人。”程平东知道后，专程来到这个村做工作，他说：“不能因他一时失足，就歧视他，要帮他树立重新生活的勇气。”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李某百感交集，扑在桌上哭了起来。

谢家咀27户人家，谁家最困难，谁家孩子上学交不上学费，程平东都数得出来。郑元田老人身上穿的大衣是程平东送的，残疾人“小头”家窗台上摆的一溜鞋是程平东从家里拿来的……

在乡亲们的眼里，挑起谢家咀脱贫致富领头人重担的程平东，就是一个群众心目中指挥千军万马的共产党的“将军”。

人世几回忆往昔，山形依旧枕寒流。程平东几十年来在故乡的山山水水之间，一路走过，无怨无悔。北京弟弟的军歌他爱听，桂林妹妹的来信他爱看，但他爱得最深的还是家乡的山和水。他希望不灭，信仰不移，他要把猪圈连着土屋，粪水和着烂泥的小山村，尽快引向文明富裕之途。这是他的终身之大愿！

物华天宝

又忆农家红苕香

吴光德

时下，辛勤耕作的人们正在地里、田间栽苕（即红薯），不由勾起了我对红苕的记忆，唇齿间似乎又弥漫着红苕的甜香。我们这代人在很大程度上靠着红苕的滋养艰难成长，自然对红苕有着特殊的情感。光阴荏苒，岁月轮回，与红苕相伴的朝朝暮暮时常浮现在眼前。儿时挨饿的漫漫长夜里对红苕的奢望、一天三顿尽是红苕加咸菜时对早日摆脱吃苕命运的企盼、放牛砍柴溜到地里扒苕时的欢乐，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幅幅永远也抹不去的图画。如今，看到孩子们在盘盘碟碟间挑肥捡瘦，或者自己茶余饭后漫步在华灯初上的林荫大道，听到卖烤苕的吆喝，出差在外看到“正宗红安苕”’的招牌，总让人产生今昔对比的联想。发出沧桑巨变的感叹。

在红安的俗语中，把不那么聪明的人戏称为“苕”，常用于朋友问事间的戏闹、夫妻间娇嗔的埋怨、长者对晚辈的训斥等等，倘若恶意把别人贬为“苕”，则是对红苕的亵渎。红苕耐贫瘠、干旱，栽种简易，只要给它一点最基本的条件，它就能茁壮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回报耕耘者。这种“不畏艰难困苦；少索取、多奉献”的精神，不正是红安人传统的美德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红安这块较为贫瘠的土地上，幸亏

有这种“苕”东西，帮人们度战乱、度饥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曾是贫苦人在最困难时的救星和希望。正因如此，红安人对红苕情有独钟。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那一筐筐辗转运到大台山红军洞中的红苕维系着革命的火种，随后，贫苦大众用他们唯一拿得出的香甜的红苕迎来了刘邓的南下大军，送过横渡长江的百万雄师，也让老百姓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儿时关于红苕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早上三碗苕，中饭苕三碗，夜晚苕当顿，明天早上还是苕”，我曾用瘦小的身躯体验着这真实的童谣。大集体时五斤苕折一斤谷分到各家当口粮，在大雪纷飞的冬季，母亲经常提着竹蓝到塘边破冰洗苕，那蒸熟的一铁罐红苕加上没有油星的于咸菜是一家人的餐餐顿顿。当我六、七岁时，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每天只能吃两顿，母亲说这是吃“扁担饭”，晚上饿得睡不着觉，就炒一点豌豆，每人分三酒盅。我总是在家里藏红苕的地窖或房角的沙堆里一遍遍寻找。盼望着能在里面再找到一点苕根。有一次，母亲到临近的小队挑塘泥，中午能有白米稀饭吃，母亲带着我去，临走时我在藏红苕的沙堆里找到了比拇指大一点的两节苕根带着，走到半路，把苕根藏在一个石缝里用石头盖好，准备等回来时再慢慢品味。上午母亲挑了六十担塘泥，吃午饭时母亲只分到一小碗箩卜稀饭，碗里除了一个大一点的萝卜切成两半外，剩下的就只是一点米汤。母亲只吃了半片萝卜，其余的都给我吃了。下午挑完六十担塘泥时，天上已露出弯弯的月牙。母亲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走到藏苕的地方，我准备拿出藏着的小苕根给她一个惊喜。当翻开石块后，发现红苕不见了。母亲那复杂的眼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的结。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红苕也渐渐从人们赖以裹腹的粗粮摇身变为高档宾馆餐桌上的珍品。红安的气候、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红苕生长，所产出的红苕有着独特的内质，内

薄肉红、少粉多糖，生吃甜而脆，熟食则温软而醇香。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对红苕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据专家学者对蔬菜果类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各类防癌食品中，生红苕防癌指数高达97%，居第一位；熟红苕防癌指数达96%，占第二位，红苕作为一种保健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精明的商人要大中城市打着“正宗红安苕”的招牌，把红安苕的名声传播得很远很远。

红苕全身是宝，一亩地的苕藤可以供一头猪一年的饲料，苕叶茎用青椒爆炒也是一道红菜，将苕洗净磨细做出的苕粉丝或切成粉块是可口的美味佳肴，近些年业兴起烤红苕更是令人百吃不厌。红安人有做苕片的习俗，用水煮熟或晒干收藏，到冬季伴着煮稀饭，过年时炒苕片作点心，一家人在慢慢咀嚼中品尝一年辛劳汗水换来的甘甜。

红安花生成名记

吴　勇

花生，是红安的传统油料作物也是优势油料作物，并以其抗病虫、品质好、大面积高产而享誉全国。红安有种植花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土质疏松，富含磷钾，适宜花生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生育特性；全年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能充分满足花生生长对阳光的要求。红安种植花生的历史较为悠久，据记载从清末起，距今已有200多年，红安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种植花生的丰富经验。

红安成为全国闻名的“花生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解放初期，刚从湖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的陈长本同志同其他一些科技人员先后来到红安，同红安农民一道，不断探索花生种植的新技术，引进培育花生新品种，首次将低产的蔓生牵藤花生发展成“直立”花生，产量明显提高。

1957年，红安花生面积已发展到7.9万亩，花生总产达到1400万公斤，成为当时全国面积最大、总产最多的花生大县。当年10月，农业部在红安召开了首次全国花生会议，总结交流各地花生高产经验，红安随之在全国小有名气。

六十年代初，全国花生产区都出现了花生“青枯病”，俗称“死棵子”，得了这种病的地块，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人

们把这种病称作“花生癌症”。

面对这种毁灭性病害，全国著名花生专家、中国油料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孙大荣同志，研究员王玉莹、段乃雄等同志心急如焚。1964年，他们毅然放弃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离开北京，一头扎进红安，同红安科技人员一道，攻克“花生癌症”。

他们从全国花生品种资源库引来1700多个花生品种，在自然病株上以人工接种进行育种试验，在“青枯病”重发地块上进行多品种种植自然淘汰试验，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高抗“青枯病”的花生单株，再繁殖成新品种，他们高兴地把新品种命名为“协抗青”、“花生癌症”终于被攻克了。

紧接着他们以红安丰岗红升农科所、典明下店花生所为育种基地，先后选育了“红梅早”、“中花四号”等一系列花生抗病丰产花生良种，及时解决了红安、湖北乃至全国花生主产区因“青枯病”而引发的品种不足问题，促进了全国花生的稳产丰产。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开展花生抗病遗传、生化遗传等抗病机理的研究，全国各地的花生抗“青枯病”品种，都来自红安的花生亲本。红安，被全国誉为“花生县”。

1979年6月，美国花生专家哈姆士博士来到红安进行了实地考察；1995年7月15日，参加世界粮农组织第二届国际花生抗“青枯病”育种会议的各国花生专家们也来到红安实地参观考察，他们对红安的花生抗病育种基地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红安花生的美誉从此传出了国门。

花生“青枯病”的彻底解决，花生良种的普及推广使红安花生生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82年起，县科技人员先后试验、示范推广了花生地膜覆盖栽培，花生钼肥拌种、“麦花双宽”栽培、花生苗期追施氮肥、叶面喷施硼钼微肥、增施磷钾、钙肥等提高花生单产的有效方法。到“八五”期间，红

安花生的平均单产已由六七十年代的亩产150多公斤提高到200多公斤；1986年红安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首批花生商品基地县，1991年红安花生总产达到300多万公斤，全县油料总产达到5000多万公斤，名列全国油料百强县第78位，湖北省第四位。

1984年，红安科技人员在水田首次应用地膜覆盖花生与晚杂配套栽培获得成功，1985年被中国油料研究所及湖北省农牧厅粮油处列为全省、全国重点农业技术推广项目。1986年，全县“花杂”配套面积达17400亩，地膜花生平均单产达到300公斤。配套晚杂平均单产450公斤，“花杂”配套亩平产值近千元，比红安其它任何一种配套种植模式亩增收200多元。水田地膜花生与杂交晚稻配套种植，实行早旱晚水、一旱一水、水旱轮作，有效地解决了粮油争地矛盾、伏秋连旱影响花生产量的矛盾，促进了粮油结合，出现了油、粮作物高、产量高、经济效益高的局面。中南五省农业领导和专家、朝鲜油料作物考察团都曾先后到红安实地参观考察“花杂”配套种植，长江流域各省市地也都先后示范推广该项目。1987年，该项目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红安水田地膜花生面积已发展到25000亩，成为一种新的水田耕种制和一优两高农业的典范。“花生县”的花生种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几十年来，由于中油所几代花生育种专家的传、帮、带，红安已涌现出一大批花生种植能手和土生土长育种专家。1986年，红安县紫云乡长辛店村原支部书记徐国栋种植的2.2亩地膜花生，首创亩平单产400公斤高产纪录，1990年再创亩产460公斤高产纪录。1995年，红安县火连畈国营茶场国营村黄土咀组徐志金再创地膜花生亩平单产475公斤高产纪录。1988年原典明乡下店花生研究所陈南方同志与县农业局科技人员一道，利用人工杂交成功地选育出特早熟花生新品种“88—415”，该品种结果整齐饱满，适应性广，除春播夏播都能获得高产外，还能

秋播，一年花生两熟，改写了红安一年一种花生的历史。该品种由于抗病高产，生育期特早，红安县农民大面积推广应用，外县外省也都争相引进示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红安花生被列为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项目，红安县委、县政府每年拿出200万元低息周转金扶持花生产业，在这些宽松的政策环境下，红安花生油脂、食品、饮品、化工饮料等五大龙头企业和加工体系已初具规模，花生生产、加工、销售成龙配套，花生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呈现产销两旺的强劲势头，花生已成为红安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十多年来，我县实施花生兴县兴农政策，成效十分显著，红安年产花生7000万公斤。形成了“百亩不断线万亩连成片”的地膜花生生产格局，产量居全省第一，花生种植、加工、销售、主副产品综合开发的产业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花生已是红安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红安著名小吃

杨　柳

红安的风味小吃品种丰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勤劳聪慧、热情好客的红安人民，在逢年过节或亲朋好友到来，或重要宾客临门的时候，喜欢拿出自制的甜酒、糕点和佳肴待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提高，形成了许多独特的具有红安地方风味的传统菜点和小吃。

珍珠花菜　珍珠花系生长于红安县北山区的一种野菜，明代《黄安初乘》（明户部尚书耿定向著）有记载。清明前后，珍珠菜含苞待放时同嫩叶一起采摘，放入开水锅里烫至黄色，捞出晒后备用。食用时用温水泡胀，再用清水漂过，随肉小炒，即可食用。如与腊肉蒸食，味更佳。具有柔和、清香的特点。

煨葫芦　以县北为多。制法是：采摘鲜嫩无籽、不苦、长有幼毛的葫芦，挂在上小下大，期间生火的圆形缸中烤熟，呈土黄色后取出。在葫芦底部向顶端钻两个对穿小孔，用木板缓缓压（勿压破）干水分，再放入缸内烘干，用木棒槌平台悬挂于干燥处备用。食用前，取葫芦浸米泔水中，3日后去粗皮，切薄片，烹法同珍珠花菜，味近玉兰片。

绿豆粑　红安绿豆粑，据说在唐朝时就开始制作。它色泽金黄，外焦内软，椒咸味美，油而不腻，为红安民间所喜食。

其制作方法为，先将熟绿豆搓烂捍成丸子，再把蒸熟的糯米捣成糕状，然后将绿豆丸子作馅加入麻油和盐，糯米作皮包好，按成扁圆形，用花生油炸成金黄色即可食用。

臭皮子　相传始于宋朝初年，臭皮子为寺庙素食。其制法为：选用优质黄豆磨浆，制成洁白、厚薄适中的皮子，用开水烫后晾干起卷，再用新鲜稻草包裹，盛于萝筐内，经自然发酵上菌，6—8天左右长出茸茸菌丝即成。可煎、炸、炒、炖。闻之有臭，食之清爽。

鸳鸯元宝　具体做法为将鸡蛋煮熟去壳，然后切开取出蛋黄，再把猪肉剁成肉茸填入蛋白内合拢，合口处涂些豆粉清浆，放入笼内蒸熟即成。

永河皮子　皮子俗称千张，属豆制品。红安永河皮子相传有两百余年的历史，闻名遐迩。永河皮子外形长七寸、宽五寸，厚度如带，虽薄而有经丝，搓能成砣，松能还原，能作捆皮。质软鲜嫩，长煮不起渣，常为下酒之佳肴。

后　记

为了落实省委关于“把红安建成全省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指示精神，更好地宣传红安、扩大红安影响，打响红色旅游品牌，我们编写了《经典红安》一书。本书简要介绍了红安革命斗争史、红安籍两位国家主席的丰功伟绩、红安籍将军的简历及部分将军的辉煌战例、红安境内著名的革命纪念场馆、地理名胜及自然景观，还介绍了部分烈士的革命事迹，是一部介绍红安革命历史、名人名事、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的综合性书籍。所选篇目均为散见于各种书籍、杂志、报刊上登载过的经典文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彭定国、耿协楠等老领导的指导，《湖北日报》社、《楚天金报》社为本书的编印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时间仓促，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作者批评指正。

编　者

小人铜四男女
人小锣十将将
好一八打送黄
万响汉奸饭仗